

论系统政治

陈建国

江西省社会科学院, 江西省作家协会会员

摘要: 作者的根本主张是确立“系统政治”。而要说清楚与“系统政治”相关联的系列问题, 所需要涉及的理论问题太多, 甚至我们不得不从人类历史和现实的诸多方面进行考察和探索; 还要跟中国共产党长期奋斗的历史和历代领袖人物的论述结合起来。这样让丰富的历史资料, 和现实的清醒头脑相互作用, 对于本书作者是很高的要求, 困难可想而知。可以说, 本书中不当之处在所难免。我这样说, 决不是为自己的不足和失误寻求开脱, 而是真诚地希望有更多的理论工作者参与讨论, 特别希望有实际政治工作经验者参与, 因为实践者更有发言权。

[陈建国. 论系统政治. *Academ Arena* 2025;17(2):6-76]. ISSN 1553-992X (print); ISSN 2158-771X (online).

<http://www.sciencepub.net/academia>. 02. doi:[10.7537/marsaaj170225.02](https://doi.org/10.7537/marsaaj170225.02)

关键词: 系统政治; 理论问题; 人类历史; 现实; 历史资料

目 录

序及作者简介

第一章, 政治不科学是人类社会灾难的根源

第二章, 系统论是当代辩证法

第三章, 政治的基本概念及其阶梯式发展演变

第四章, 系统政治的历史渊源——从《孙子兵法》

谈起

第五章, 需要重新认识马克思主义

第六章, 建国后“前三十年”的经验和教训

第七章, 改革开放以来的得与失

第八章, 政治体制改革的重重障碍

第九章, 改革是更深刻的革命

第十章, 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办?

第十一章, 关于世界政治系统化的理想

序

从 1973 年春天开始, 我成了专职“政工干部”。但对于“政治”所受到的社会待遇, 前后反差之大, 令我百思不得其解。早年, 一切要求“政治挂帅”、“突出政治”, 人们常说: “政治是统帅, 是灵魂”、“与经济相比, 政治不能不占首位”。后来, 无论开什么会议, 会议主持人总是告诫与会者: “莫谈政治, 要回避敏感话题”。共产党难道不是政党吗? 不谈政治, 还能叫共产党吗? 入党几十年, 让自己感到莫名的悲哀: 为什么一个共产党员不能理直气壮地谈论政治呢? 经过长期思考我才明白: 政治不科学, 实际上是人类社会灾难的根源。所以要真正能够让大家都来科学地谈论政治, 其实非常困难!

本来想写一部《系统政治学》, 一者书名有想充当教科书之嫌, 我以为本学科现在很不成熟, 不具备进入教科书系列的条件。再者又与前人出版过的书重名, 难免引起误会, 所以改成现书名。主要想说明此事还需要进行充分讨论, 离开成熟教科书还很遥远。作者给出的看法, 也只是供各界人士讨论时参考。

系统论是当代辩证法, 是古老辩证法的精细化和可操作化。在当今世界可以认为: **不懂系统论的人, 就是不懂辩证法。**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 是唯物辩证法应用于人类社会领域所取得的重要成果。作为理论工作者, 对马克思主义应持有科学的态度: 它不能被当作圣经或教条, 但也不能否认其最基本的科学性。

现行政治教科书指出: 马克思主义认为任何社会形态, 都是生产力发展水平决定生产关系, 即生产组织形式; 生产关系反作用于生产力, 即它可能推动生产力发展, 也可能阻碍生产力进步。一个社会生产关系的总和, 构成该社会的经济基础,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而上层建筑对于经济基础发生反作用。这两对社会矛盾相互作用, 推动人类社会不断向前发

作者简介: 陈建国, 原名侯显林, 1940 年 9 月出生, 河南省荥阳市二十里铺乡(今名: 豫龙镇)翟寨村人。生父侯志辉为八路军敌工干部, 1945 年执行策反任务时壮烈牺牲, 为烈士; 养父陈瑞先为安徽省金寨县老红军干部, 曾长期在延安担任党中央社会部特别交通科科长, 建国后任庐山疗养院总院院长等职。陈建国 1963 年从南京大学地质学系毕业, 1963 年至 1972 年底在内蒙从事野外地质工作, 1972 年率领普查组找到翁旗小营子铅锌矿(大型)。1973 年至 1985 年在江西省地质局从事理论宣传工作, 1985 年春至今在江西省社会科学院从事哲学、经济学研究, 任研究员。此前已出版《条件哲学与互补原理》等四部学术专著, 发表各类研究文章、调查报告等三百余篇。主持完成两项国家级研究课题。2010 年, 用侯显林的笔名, 在时代文化出版社出版 41 万字长篇小说《野山风》; 另有少量科普作品、散文、诗等文学作品问世, 是江西省作家协会会员。

展。这就是人类社会运动的基本轨迹，政治则是上层建筑当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

作者的根本主张是确立“系统政治”。而要说清楚与“系统政治”相关联的系列问题，所需要涉及的理论问题太多，甚至我们不得不从人类历史和现实的诸多方面进行考察和探索；还要跟中国共产党长期奋斗的历史和历代领袖人物的论述结合起来。这样让丰富的历史资料，和现实的清醒头脑相互作用，对于本书作者是很高的要求，困难可想而知。可以说，本书中不当之处在所难免。我这样说，决不是为自己的不足和失误寻求开脱，而是真诚地希望有更多的理论工作者参与讨论，特别希望有实际政治工作经验者参与，因为实践者更有发言权。

要说清楚这些问题，首先需要说明什么是系统论和什么是政治，自然也包括系统论是什么和政治是什么的问题。把这两大基本概念讲清楚，才能进行接下来的讨论。联系实际，就不可避免地要回答社会上所谓“左”和“右”两大政治派别争论的一些问题。有人说：“不要左派，不要右派，只要正派。”话是不错，但真正懂得什么是正派，却并不容易。令人不解的是：讲真话为什么会犯错误？还有，如何正确对待“前三十年”和“后四十年”的问题。似乎存在着一个悖论：在所谓“贫穷的社会主义”时期，人们之间互相帮助，助人为乐，社会风气还比较好；而在所谓“贫穷不是社会主义”、“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以后，社会风气变得越来越坏：干部贪污腐败严重，事业单位失去事业心，社会上诈骗风盛行，人们不再相互信任，诸多丑恶现象沉渣泛起。怎样认识这些问题？如何着手解决这些问题？这决不是依靠重新祭起“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大旗，就能解决得了的问题。不进行政治体制改革行吗？但是，应该如何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呢？不落实系统政治，这些问题永远解决不了。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我们在政治理论方面变化太大，以致一些最基本的概念，已经面目全非。如何说清楚这些政治概念变化的原因和历史，也是本书的着力点。例如，关于政治本身的概念就是这样：曾几何时，我们强烈主张革命者一定要“政治挂帅”。有谁能想到：在海峡对岸，选民们已经把政治当成了贬义词！那位候选人敢于“政治挂帅”，选民们就是坚决不选他！由此可见：这两处说的政治根本不是一回事！但是中国文字是统一的，截然相反的政治必然有其共性。还有些属于政治方面的名词，也有着与“政治”本身相同的尴尬状况。例如，如何认识资产阶级？《共产党宣言》明明白白地写着“资产阶级在历史上曾经起过非常革命的作用。”（中文单行本第26页）但是在过去的某个历史时期，现在也还有些人，硬要把贪污腐败分子说成是“资产阶级”，这真是替坏人涂脂抹粉啊！因为贪污腐败分子在任何时期都是社会蛀虫，根本没有资格与资产阶级相提

并论！中国国旗上的五个红星，其含义是：中间的大五星代表中国共产党，周围四个小五星代表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团结一致，心向共产党。国旗没有改，但是在那个特殊时期，资产阶级竟然被不加区分地说成是阶级敌人！遇事一定要“一分为二”的思想，怎么对资产阶级就不管用了呢？即使为了澄清这一类概念，在政治理论上提倡争论也很有必要。所谓“论”，就包括作者的论述和大家的争论在内。

应当知道，《共产党宣言》在第三大段用长长的篇幅，无情地批判了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然而革命成功后的苏联和一系列东欧国家都称自己是社会主义国家，今天，中、朝、越、古等仍称自己是社会主义国家，这怎么理解？

对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以及二者关系的认识，也存在着严重地不符合实际的情况。党的领导和生产资料公有制被当作社会主义的基本标志，可是前苏联就是苏共中央主动放弃领导权，由苏维埃中央政府宣布解体。当时民调有71%的苏联人民反对解散苏联，最后还是被强行解散。这说明：把苏联解体归罪于西方意识形态渗透，不符合事实。党的领导不是关键，党的性质才是关键。当时苏联国有企业，实际上已经成了政府官员所有制。相反，在中国改革开放过程中，有些私有制企业却做出了对国家和民族极为重要的贡献。中国有相当一部分私企已经“姓社”，这是不争的事实。这说明什么？说明生产资料所有制，对于社会性质并不起决定作用！“一国两制”在中国的成功实践告诉我们：共产党可以领导资本主义！怎样全面而准确地认识这两种社会制度的区别，以及二者的关系，是摆在中国理论工作者面前的艰巨任务。如果能用系统论的观点，科学地处理好这些问题，对于落实“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将有着极其重大的理论和战略意义。

上世纪八十年代，在中国掀起了系统热。结果是热闹有余，成果不足，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就是因为上述种种根本违背系统论原则，与辩证法相抵触的政治观念一直没有得到清理和纠正。在当时的政治背景下，这些问题也不可能得到解决。所以有人说：要历史地对待历史人物，我赞成。但是作为亲历者，我们有权充当事后评论员。这种对历史的评述，包括对历代领袖人物的评论，对于今后如何认识问题有很大帮助。这就要求我们：把对人的评价，和对事的认识，区别开来对待。在真实的历史上，诸葛亮犯过错误，个别的还很严重，但这并不妨碍后人把他当作智慧的化身。这正如我于2013年在网上发布的对联所说：自古圣贤皆有错，至今科学不成熟。从根本上说：不犯错误者永远成不了圣贤。

作者想要继承钱学森先生的遗志，为中国，也为世界政治的科学化而努力奋斗！当然，中国政治科学

化是远大目标，世界政治科学化是更远大的目标，不可能一蹴而就。但奋斗有我，成功则不必在我。在政治理论上取消禁区，在全体中国人民中间展开争论，方显中国式民主的伟大与坦诚。这样，必将给全世界做出榜样。让世界人民认识到：在中国才有真正的民主；而在西方世界，民主是用来欺骗、愚弄劳动人民的。

目 录

序及作者简介

第一章，政治不科学是人类社会灾难的根源

第二章，系统论是当代辩证法

第三章，政治的基本概念及其阶梯式发展演变

第四章，系统政治的历史渊源——从《孙子兵法》

谈起

第五章，需要重新认识马克思主义

第六章，建国后“前三十年”的经验和教训

第七章，改革开放以来的得与失

第八章，政治体制改革的重重障碍

第九章，改革是更深刻的革命

第十章，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办？

第十一章，关于世界政治系统化的理想

第一章 政治不科学是人类社会灾难的根源

为什么会是这样？这就要考察一下究竟什么是政治？什么是科学？

迄今为止，关于政治的最准确概念，就是孙中山先生的政治定义：“政治是管理众人之事”。马克思主义认为：政治属于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建立在经济基础之上，并为经济基础服务。政治是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社会管理当然是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孙中山先生的政治定义，与马克思主义相通，或者更准确地说：二者完全一致。

但是，我们关于政治争议的起因，恰恰是由于定义不科学。例如，把阶级斗争简单地就等同于政治，这在逻辑上就犯了错误。阶级斗争属于政治，决不能等同于政治。因为政治的范围广大，是共性；阶级斗争是个性，是政治的内容之一。政治的泛阶级斗争化，是产生左倾错误思潮的根源。政治还应包括与阶级斗争相对应的阶级合作，没有阶级合作就不会有阶级斗争。人类社会历史上所有的阶级斗争，都是在阶级合作的过程中发生，也都是阶级合作遭到破坏的产物。对广大人民群众的宣传和教育活动，对干部的教育、培训和组织宣传工作，都是政治的组成部分，政治部就下设有组织部和宣传部。所谓统一战线，也是政治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共中央专设有统战部。左倾思潮认为：所有这一切都是为阶级斗争服务的。这些都是现象，阶级斗争才是本质！假如这样去理解统一战线，那统一战线仅仅是阶级斗争的工具和手段，

我们跟统战对象搞好关系，与他们讲团结、交朋友，还能是真心诚意地吗？合作不是目的，斗争才是本质，人家被我们利用。请问：诚意何在？

泛阶级斗争化的政治观念，来源于对马克思主义的错误理解。

《共产党宣言》正文第一节“资产者和无产者”开头就说：“到目前为止的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单行本第23页）这句话成为左倾思潮“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理论出处。他们想当然地认为：既然一切社会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那么，除了阶级斗争以外，历史也就再也没有别的内容了。这实际上是对上述论断的一种教条式解读：因为对立阶级双方既有斗争也有合作。斗争与合作是人类社会阶级关系的两个方面，是一种辩证的客观存在：工人不去私企上班，就不受私企老板剥削，也不会跟该老板进行斗争。去他那里上班，不是合作又是什么呢？土地的租佃关系也是一种合作，地主剥削农民就是在二者合作的过程中发生。所以，对理论的理解一定要讲究辩证法。

在《共产党宣言》1872年德文版序言中，马克思和恩格斯提出“这些基本原理的实际运用，正如《宣言》中所说的，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同上，第3页）这就是理解理论所必须遵循的辩证法。例如：阶级合作，就是阶级斗争产生的必要条件。同时，阶级合作也是人类社会进步的必要条件。《宣言》的这一论述，是促使我创立《条件哲学》的原始动力。坚持条件哲学原则，是反对一切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思想武器。那么，所谓“错误的政治观念”有哪些内容呢？

原始的政治观念，可概括为“政权政治”——政治，就是围绕着夺取政权和保卫政权而进行的斗争。离开政权的政治，只能是一种欺骗。能夺取和保卫政权，就是政治正确，丢掉政权就说明你政治错误。这种观念到底对还是不对呢？不能简单地地下结论。在国民党反动派武装到牙齿的情况下，在军队、警察都是为国民党反动统治服务的情况下，你向他提出要民主要自由，他能给你吗？不可能！和平抗争，除了能引起社会大众的普遍关注和同情之外，所带来的只是血腥镇压。无产阶级、劳动人民只有组织自己的革命军队，并发展壮大，武装夺取政权，才能争得属于自己的民主和自由。所以，“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毛泽东同志的这句话是千真万确的真理。但是，和帝国主义的宣言“真理在大炮的射程之内”比较一下，我们发现：从语气到内容，二者找不到根本差别！那我们为什么说毛主席的话是真理，而帝国主义的宣言只是猖狂的叫嚣呢？

这就要看说话的条件和背景，首先是他服务的对象和所处的环境。政权政治观念是由人们所处的社会条件决定的。它直截了当地对待政治，你如果批

评他的政治观念错误，他可以回答说：“如果我不掌握政权，怎么去做‘管理众人之事’？”这样说，他并没有违反孙中山先生的政治定义。毛泽东同志对枪杆子的重视，是根据历史经验，是创造实行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治前提所必不可少的条件：没有枪杆子，反动派根本不会理你！

所以，政权政治观念虽然是原始的、落后的，从政治的本质来说是错误的，但决不等于它毫无道理。但是，条件根本改变以后，即由革命者领导全体劳动人民掌握国家政权以后，仍然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认为只有保卫政权才是政治，把政治其它方面的内容都给忽略掉了，特别是不注意加强阶级合作，不把发展生产改善人民生活放在指导地位，就是犯政治错误。推翻党的“八大”决议，修改社会主要矛盾，既是政治错误，更是组织错误。

台湾的政治闹剧，是政治概念的原始性、非科学性的必然结果。但是，这种反科学的政治观，是除社会主义国家以外，世界各大政党的根本指导思想。政治家们承诺在自己当选以后，会发展经济、改善民生，都是用来骗取选票的。他们的候选人一旦当选上台，有时也真的会作一些策略上的调整，但以不影响自己所属财团的根本利益为前提，甚或是以争取所属财团利益最大化为原则。这就是说：在本质上是资本政治，有利资本增殖就是政治正确。政府领导人妨碍资本增殖，就是政治错误，必须下台。资本政治，就是此种政权政治的本质。

世界各大帝国主义财团，是各国政治舞台幕后的总导演。已经发生过的两次世界大战，以及世界大大小小的国际战争，无一不是财团利益冲突的后果。政治冲突是产生战争的根源，战争是政治的继续，这就是世界政权政治的根本规律。除了国际战争，有些国家的国内战争也是出于财团的利益冲突，所以他们说：**不科学的政治，是人类社会灾难的总根源。**

有少数政治家认识到政权政治的片面性，提出了“民生政治”概念；而在资本政治的前提下，这种政治观念根本无法落实。而中共中央提出“科学发展观”，才真正告别了政权政治的旧观念。可以把这叫做“发展观政治”——一个掌权的政党是不是政治正确，不是看你政权是否稳固，而是看你实践什么样的发展观？发展不是硬道理，科学才是硬道理。不科学的发展终究会带来灾难。如果你的发展观不科学，那么你的政治观就是非科学的！这是可持续发展理念向我们提出来的全新政治观念。只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中国共产党，才能提出并执行这样的政治。

生态文明建设理念的提出，将新的政治观又提高了一步：符合生态文明建设所需要的政治，才是科学的政治。反生态的政治，就是反科学的政治。在这样的前提下，“政治是统帅，是灵魂”，“政治与经济相比，不能不占首位”仍然正确。例如，不能以破坏

生态的办法来发展经济，破坏生态文明就是犯政治错误。生态文明包括自然生态和社会生态两大部分，这两种生态文明的建设都必不可少；**要彻底纠正轻视社会生态文明建设的偏差，这就是我们今天所面临的最紧迫的政治任务。**政治概念的发展变化，还需要在第三章详细讨论。

第一节 社会灾难及人类对其认识过程

人类从诞生以来，灾难就从未中断过。在原始社会，由于生产力水平低，人类面对大自然造成的灾害，虽然感到恐惧，却能够团结一致，共同抵抗。最著名的就是大禹治水的传说。原始人群之间的冲突，虽然也会酿成灾难，却不占主导地位。但是到了奴隶社会，情况发生根本变化，因为战俘可以被当作奴隶使用，甚至可以被买卖。随着奴隶制国家的建立，国与国之间经常发生的战争就成了社会灾难，这一点在欧洲更为突出。中国的奴隶制社会时间比较短，封建社会形成较早。但在封建社会里，“话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也发生不少战争灾难。在阶级社会里，统治阶级加深对劳动人民的剥削，成为全社会的共同灾难。即使是在比较稳定的封建朝代，也会有少部分人啸聚山林，打家劫舍，成为另一类社会灾难。在资本主义文明产生以前的政治，就只有政权政治。不管通过什么手段，武力威胁、宫廷政变、阴谋诡计，甚至“狸猫换太子”，谁能够夺取政权，让全国文武百官、军队和老百姓都服从自己，谁就是政治正确。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就是他的政治正确。古代政治与科学从来不沾边，所谓科学，实际上停留在实用技术层面，就是为农业、手工业服务的手工技巧、工具制造之类。在古代，连天文学都要为皇帝的权威服务。水利科学和地球科学，直接为农业、手工业和运输业服务，情况要好些，因为它们离政治比较远。

随着近代文明的出现，特别是在资本主义社会早期，一些政治家开始研究人类社会灾难的产生和消除办法，他们提出了种种社会改良设想。这些被称为“空想主义者”的社会学家们，一些脱离实际的思考，虽然有明显的空想性质，却启发了对资本政治不满的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的思考：我们辛辛苦苦几十年，为什么劳动果实都进到老板的腰包里去了？我们每年的抗争为什么都失败了？原来有资本家政府为他们撑腰呵！劳动者的抗争，就由最初的经济诉求渐渐地演变成成为政治诉求。统治阶级的镇压行为越来越残暴，变本加厉。社会灾难便越来越经常化，形成周期性经济危机。——这就是现代最普遍的社会灾难。这种灾难，也常常跟战争联系在一起，给人一种“经济危机引发战争”的深刻印象。

怎样消除经常性的社会灾难？是一切先进思想家思考的共同课题，但由于思想意识的不同而得出完全不同的结论。改良主义的基本特征，是不改变社会政治制度，希望统治阶级对劳动人民“发善心”，主动进行社会改良，减轻剥削。让劳动者生活得好些，资本家也就能获取更丰厚的利润。国外企业家们从中国获取的所谓“儒家资本主义”思想，会在北欧及其他资本主义国家获得发展，说明我们过去对改良主义的嘲讽态度，有一定程度的片面性。更有甚者，以社会主义企业宪法著称的《鞍钢宪法》，所谓“两参一改三结合”，也能在国外取得良好的声誉。国外不少资本家所有制企业，会仿照中国国营企业的办法管理企业。事实说明：改良主义虽然治标不治本，不能解决根本问题；但是，对于促进社会进步和减轻社会灾难，有一定的实际作用。不应该把他们都说是“麻醉人民的精神鸦片”，予以全盘否定。

以马克思主义诞生为标志的革命派，包括在之前出现的，主张以武装斗争形式推翻旧制度，建立新制度的早期革命家，及在其后出现的各国革命者，基本主张是武装夺取政权，推翻现有资本主义制度，建立全新社会制度，即人人平等，一切有劳动能力的人都要劳动的新社会。人们对新社会的设想并不完全一致，但是认为消灭剥削就是消除社会灾难的想法是一致的。然而前苏联所发生的变化及其最后遭遇，却让我们对此产生了困惑。

马克思主义原来的设想是：在资本主义高度发达的国家，首先发生社会革命。因为资本主义的罪恶在这里暴露得最充分，工人阶级的革命就会比较彻底。但事实却是在资本主义刚刚诞生才 12 年的俄罗斯，发生了 1917 年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资产阶级领导的俄国二月革命是在 1905 年。这是因为：人类社会发 展极不平衡，落后国家正好是旧制度的薄弱环节，而堡垒最容易从最薄弱环节被攻破。作为资本主义老祖宗的英国，直到现在也没有发生社会主义革命的迹象。与苏联东欧社会主义集团相呼应，在落后的实际上是封建主义顽固堡垒的中国，在十月革命 32 年之后，中国人民的革命终于也获得成功，建立了将来一定会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新民主主义社会。上世纪中叶以后，强大的社会主义阵营，成为全世界资本帝国主义国家集团的眼中钉、肉中刺。但是，由于苏联政治的极端不科学，强大的苏联在建立 74 年之后轰然倒塌。苏联政治不科学，除了苏共自己的原因，从客观上说，“卡夫丁峡谷”并没有那么容易跳得过去。苏联在十月革命前没有经过真正资本主义的洗礼，是其失败的客观原因。2023 年以来俄罗斯与乌克兰的战争，是前苏联两个加盟共和国之间的战争，这有多么可悲呀！这是错误政治带给人类的重大持久性灾难！

前苏联在政治上的错误非常严重，而以前我们对苏联政治错误的认识不准确，更不深刻，这很有必要在后面的章节进行详细讨论。

说中国的社会灾难与错误政治有必然联系，既是我们对历史事件的反思，更是自己的切身体会。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满清帝国的社会灾难，其实一直不曾中断过。满族是中国东北的少数民族，入关后要镇压关内剩余的明朝反抗部队，还要消灭李自成、张献忠所领导的农民起义，战争连绵不断，中国人民所受到的社会灾难深重而持久。战争频频，统治者更会忽视自然灾害防治，所以，社会灾难与自然灾害常常叠加而致。在这种情况下，即使统治者是天才人物，也决不会想到要用什么“民生政治”来代替政权政治。他们日思夜想的就是：训练军队、选择将领、保护朝庭、镇压和扫荡敌人，如此等等。无论如何，他们也决不会把治下百姓的冷暖安危放在主要思考的位置上。

1911 年孙中山先生领导的民主革命，推翻了满清王朝。中山先生去世以后，蒋介石背叛革命，他掌握军队和国家大权，军阀混战又成了中国人民经常要承受的社会灾难。土匪多如牛毛，“兵匪一家，欺压百姓”，反映了当时的实际情况。1927 年南昌八一起义，劳动人民有了自己的军队，在毛泽东、朱德等领导下，经过 22 年艰苦卓绝的武装斗争，打败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武装围剿和日本军队的猖狂进攻，建立了崭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经过镇压反革命、土地改革、三反五反、公私合营，农村消灭了地主剥削，城市调整劳资关系，建立国有工矿企业，及军垦农场等等，使得全国性大规模社会灾难基本上被消除，人民安居乐业。经过朝鲜战争的考验，证明由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坚强无比！同时赢得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和被压迫民族的信任，也得到苏联的真诚帮助。

新中国的政治在本质上已经是民生政治，已经把全社会的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的普遍改善，当作头等政治任务来对待。到 1956 年，党的八大明确指出：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总之是主要矛盾的变化要求政治观念跟随着改变。

但是，1957 年 9 月 20 日至 10 月 9 日 中共八届三中全会在北京举行。毛泽东同志在全会上提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仍然是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从根本上推翻了八大方针。这就是“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纲领。后来他又多次提出对八大政治纲领的修改。个人可以修改党的决议，这对于党内高层民主，更是灾难性的打击。1959 年在庐山对彭德怀等同志

的“斗争”，后来的“四清运动”，一直到发动“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都是“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运动。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人民的社会灾难能够不沉重吗？所谓“破四旧”活动，不仅是政治灾难，也是文化灾难，被毁坏的文物典籍难以计数。数以百万计的冤假错案，运动所造成的人间悲剧，更是错误政治造成社会灾难的真实记录。八届十一中全会，彻底终止“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政治，开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新的长征。但是由于始终没有把政治体制改革列入议事日程，使用旧的管理体制，从事完全新的工作，就出现了一种新形势下的“政治不适”。错误的政治观念照样给人们带来社会灾难，只是它具有了全新的形式——大规模的贪污腐败之风，以许家印的“暴雷”为标志，给中国人民的正义感和幸福感产生强大的反向冲击。在中国真的有正义和幸福吗？为什么到处都是“官本位”呢？反动资本家如果不勾结和笼络贪官，他们自己决没有这么大的“能量”！不废除官本位，就不会有科学本位。对国家和民族有卓越贡献的民族资产阶级，同样受到国内外反动势力的排挤和打压，好在他们得到了人民群众和各级政府的支持。政治不科学是人类社会灾难的总根源，不彻底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中国决不可能例外。

第二节 社会灾难的经济学分析

强调社会灾难是由于不科学的政治所导致，决不是否认产生灾难的经济原因。在灾难发生的过程中，经济原因和政治原因互为因果、互相联动。就一般灾难而论，除了自然原因外，经济和政治两方面的缺陷，都会使灾难加深和加重。以江河水灾而论，中国在解放前和解放后，有着两种完全不同的景象。在根本上肯定建国后党中央的经济政策英明正确的前提下，也有必要分析一下：历史上党在经济政策方面所犯过的严重错误。

1958年在中国发生的“大跃进”运动，今天在网络上仍然充满负面评价，而且不乏对伟大领袖的直接批评。这是很好的现象，说明人们坚持实事求是原则，承认伟人也犯错误，历史就是证明。但是，大跃进的错误是历史发展的结果，不是毛主席个人能够制造出来的。毛主席的错误在于：没有及时而冷静地对待此事，设法将人民的革命热情引向稳健的科学发展轨道上来。

全国解放以后，随着在广大农村开展土地改革运动，没收地主土地，分给无地和少地的贫苦农民，极大地调动了广大农民群众的生产积极性。随着生产发展，获得土地后的农民也出现两极分化现象。党中央一知道这种情况，就立即采取措施，组织农民走集体化道路。在人民民主专政条件下，通过合作化道路，把小农经济逐步改造成为社会主义集体经济，是中国共产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重要组成部分。

1956年基本上实现了完全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了由农民个体所有制向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的转变。与农业同时，还进行了手工业和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时称“三大改造”。在这整个过程中，确实存在着工作不够细致，过急过快的错误。当时，中央曾经计划十五年内完成农业合作化任务。然而，在毛主席本人一再催促下，短短三年半就完成了任务。所以，有关部门（如中央农村工作部等）开始着手纠正其中所发生的一些过急过快的错误。中央一些领导同志，如朱德、陈云等也提出了“要稳妥一些，条件成熟再发展”的正确主张。但是，这些老同志却被毛泽东给扣上了“老机老右”、“小脚女人”的政治帽子。

1957年9月，在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毛泽东认为1956年对经济工作中过急过快情况的纠正是“反冒进”，他就针锋相对地提出“反反冒进”。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修正草案）》，这实际是农业“大跃进”的纲领。会后，全国大部分省、自治区召开党的各级干部会议，传达贯彻三中全会精神，积极准备掀起工农业生产的新高潮。

1957年11月13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提出了“大跃进”的口号。1958年2月，《人民日报》发表“鼓足干劲，力争上游”的社论。当时有人说：“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粮食产量不断被人为拔高。1958年要比1957年增产80%，由3900亿斤达到7000亿斤，1959年要比1958年增产50%，由7000亿斤达到10500亿斤。1958年5月，党的八大二次会议正式通过了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号召全党和全国人民，争取在15年或者更短时间内，在主要工业产品的产量方面赶上和超过英国。会上通过了第二个五年计划，提出了一系列不切实际的任务和指标。会后，全国各条战线迅速掀起了“大跃进”高潮。

1958年6月初，国家计委提出《第二个五年计划要点》，其中提出五年超过英国，十年赶上美国。这个文件得到了毛主席的首肯，并批示：“这是一个很好的文件，值得认真一读”。到了6月17日，又提出“两年超过英国”的报告，毛主席看后，非常高兴。因为领袖亲自批示，文件精神很快就传达到基层单位。

1958年7月份，从农业战线传来喜讯，各媒体先后刊登湖北省某农业生产合作社，早稻亩产15361斤，放了一个大“卫星”。随即农业部公布夏粮产量同比增长69%，总产量比美国还多出40亿斤。8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举行扩大会议，制定1958年国民经济计划，提出1958年钢产量要在1957年535万吨的基础上翻一番，达到1070万吨。1959年要比1958年再翻番，由1070万吨达到3000万吨。全国几亿人掀起了“全民大炼钢铁运动”，遍地开花的“小高炉”，浪费了大量人力、物力、财力，耽误农时，也破坏了生态环境。但在当时，人们并不这样看，

而是认为：“要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就要这样拼命干，加油干”。本人也曾经抬着铁矿石，跑步前进。

1958年8月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召开会议，到月底结束。在会上研究了超英赶美、大炼钢铁和成立人民公社等重大问题。1958年10月1日《天津日报》报道，天津市的东郊新立村水稻试验田，亩产12万斤，并称在田间的稻谷上可以坐人，让群众参观。到了10月8日和10日两天，《天津日报》又分别报道天津市双林农场“试验田”，亩产稻谷126339斤的特大消息。徐水县在“大跃进”的过程中，曾经放了一亩地产山药120万斤、小麦12万斤、皮棉5000斤、全县粮食亩产2000斤等高产“卫星”。毛泽东主席在1958年8月4日到徐水县视察时，县委书记张国忠亲自向毛主席汇报，毛主席听后大加赞许。河南西平县和平农业社小麦亩产7320斤，湖北麻城县建国农业一社早稻亩产36956斤，广西环江县红旗公社中稻亩产130434斤，在当年诸多的“卫星”中特别耀眼。更有一个惊人的“卫星”口号：“一个萝卜千斤重，两匹毛驴拉不动”。作为官方媒体的《人民日报》，1958年9月18日竟然在头版头条加以报道，造成极坏影响。“大跃进”、“总路线”和“人民公社”，并称“三面红旗”，“大跃进万岁”也整整喊了二十多年。

这样“折腾”的结果，就是出现所谓“三年困难时期”。关于这方面，网上提供了丰富的资料。众多材料可以相互比对，我以为程恩富、詹志华二位提供的资料可信度比较高。中国三年困难时期，从大跃进之后的1959年算起，到1961年止，1962年情况开始好转，脱离“困难时期”。一个非常流行的说法是，三年困难时期中国饿死三千万人。他们认为这个数字不准确。实际上这个数字没有办法搞准确，因为非正常死亡原因太复杂。谁是直接饿死的？很难确认。因为吃的不好，生病又无法及时治疗而死，算不算饿死？经济困难，社员不愿意生孩子怎么算？农村生活困难，死亡率增高是事实，只有用正常年份的情况与三年困难时期进行对比，才算是比较可靠的方法。他们得出的结论是：大约非正常死亡1500万人左右。（三种算法取平均数）这个数据还比较令人信服。如资料显示：安徽省1960年人口比1959年净减少3839779人，其中非正常死亡2218280人。但省委书记曾希圣想尽各种办法严密封锁消息，向中央隐瞒实情。

困难时期是天灾，也是人祸。极左的经济政策，需要极左的政治氛围来实行。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党中央，不理睬以朱德、陈云为代表的所谓“小脚女人”们的正确意见，把这些同志称为“老机、老右”，是政治极左推动经济过热；经济过热，又需要政治极左来维护，困难是二者相互作用的结果。

我们知道：社员吃公共食堂，自己家不做饭，是浪费粮食和饿死人的直接原因。1959年1月，朱

德同志发现这个问题，就向中央建议社员回家自己做着吃，取消公共食堂。但是，从那时到1961年5月，经过了十三次以多种形式提出，差不多两年半时间，才被中央采纳。这中间多浪费了多少粮食？如果是毛主席提出这个问题呢？“传达最高指示不过夜”，全国马上行动，可能立竿见影。不看指示正确与否，只看领导者的地位——中国干部这样的思维方式不是很可悲吗？所谓“三线建设”，实际上得不偿失。朱德同志说：“世界大战，我看几十年内打不起来。”毛泽东同志就说：“你是总司令，还这么右倾！”一个“备战备荒为人民”的指示，造成经济建设上的极大浪费。事后很多三线厂回迁内地。朱德同志主张“沿海搞建设，跟欧、美、日做生意”的正确意见，直到改革开放以后才得以落实。1957年朱德视察海南，就提出开发建设海南岛，要建设军港、商港。不要以粮为纲，要搞多种经营。海南地区领导人冯白驹同志，接受朱德建议，就提出海南要建省，脱离广东。因为海南还要管南海的事，不单独建省不行。结果在反右斗争中，冯白驹同志竟被打成“地方主义”、“右派分子”。类似冯白驹的事件说明：**中国缺少一个允许各种不同意见健康讨论的机制。**

更加不可思议的是，处于困难状态的安徽金寨人民，创造性地实行了“责任田到户”的承包制度。1962年夏天，我跟随父母去金寨农村，看见了社员们安居乐业，百业兴旺，欣欣向荣的景象。农村社员的生活比城市居民好得多了，甚至伙食方面，比省委宾馆招待我们“客人”的伙食都要好很多。我详细地讯问了我的那些社员哥哥们，他们兴奋地告诉我：责任田到户的承包办法，是他们老农民自己想出来的！我说领导支持吗？他们说省委书记李葆华同志坚决支持！我说中央有人支持吗？他们告诉我：朱总司令坚决支持！我还专门问了刘少奇的事。他们说刘少奇在安徽最困难的时候，派军队在公路上设卡，凡是从安徽运粮出省的一律退回！他们感激刘少奇同志是因为这事啊！农村集市上的商品简直太丰富了。我兴高采烈，一回到南京就在学校里讲开了。可是没有想到，我讲真话竟然“犯错误”！系党总支领导找我谈话，说我亲眼所见不算事实，要按上面的口径说。

当时的宣传口径是什么？是刘少奇在安徽搞“包产到户”，其本质是搞单干！后来“文革”中批判刘少奇，这也是他的“罪状”之一。其实，责任田到户和包产到户并不等同。一个生产队有多少地，社员们很清楚。过去社员排着队上班，集体出工，谁懒惰谁勤快，互相间无法监督。就是看到了谁干活不出力，也不愿意说出来，怕得罪人，这样效率很低。责任田到户的办法，是根据劳动力和土地的具体情况自报公议，在队集体范围内认真讨论，适当

平衡。各劳动力专注自己承包的那些土地，在种植作物品种、时间、数量、水、肥、田间管理等方面提出要求。在产量和产值方面规定数额。超额有奖，完不成任务就罚。这样就有效地避免了磨洋工和出工不出力现象。我的社员哥哥们都是得了奖的，他们认为自己是红军亲属，不能给红军家庭丢脸。土地和重要生产资料的集体所有制不变，跟“分田单干”毫无共同之处！本质上是找到了更为科学的管理办法。

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是我们党在五十年代后期全面开展社会主义建设中，为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所作的一项重大决策。但由政社合一为特征的“人民公社”，所带来的经济、社会问题更为严重。1964年开始的“四清运动”，实际上是被迫采取的应对措施。公社干部的坏作风，就像封建社会历史上农民起义领袖人物“一进城就变坏”一样，是从来没有当过“官儿”的农民心态自我膨胀的结果。他们和战争年代经过血与火考验的老干部们不同，经不起“有权有势”和“无耻吹捧”的考验，不知不觉地就“懒、馋、占、贪、变”了。我在内蒙参加过两期农村四清工作队，当时社员反映大队干部“溜溜跔跔，两千七八”、“炕上一座，三千超过”，意思是说：大队长要下地检查工作，往各生产队地块上跑，每月记两千七八百工分；大队书记要找人谈话，做思想工作，坐在炕上谈话，喝着茶水，甚至还有“嚼物”，每月记三千工分。一般社员工分怎么记呢？好劳力大概一天记八分，如果每月三十天都干活，就记两千四百分。可是，谁能天天都出工呢？

干部管理工作怎么计算报酬？而且都得从人民公社总收入里面支出，这样的管理工作从来没有做过，出现各类问题在所难免！我在一个生产队的账本上发现：该生产队曾经杀了五头牛，但一共只记了五十斤肉。我问生产队会计：“这是怎么回事？每头牛只有十斤肉？难道是袖珍牛？”他吓得腿肚子哆嗦，悄悄跟我说：“大队书记的姐姐来割肉，谁还敢记账？还有大队长屋里的也来，割一大块儿，随便记点就行，谁去约啊？只有普通社员才会认真约，认真记。”啊！原来保定地区搞“四清”，就是指“清工分、清账目、清财务、清仓库”，是讲的经济管理问题。可是后来，中央下达文件硬给改成了“清思想、清政治、清组织、清阶级”——显示出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特征。我当时真想不通：思想怎么清得了？他在想什么你怎么知道？但不敢说，还得努力学习，冲上“阶级斗争”前线。中央文件有前十条、后十条和最著名的《二十三条》。这么多文件的基本精神，就是要求同志们不要以为农村这些问题是管理落后，干部没经验，水平低。一定要“从阶级斗争角度看问题”。

把经济管理的落后、马虎，及其造成的不良后果，统统都上纲上线到“阶级敌人捣乱、破坏”和“资产阶级的猖狂进攻”上来。以后我常常想的问题是：怎样把农村的“贫下中农协会”或者“社员代表大会”变成常设民权机构？如果能变成“不走的工作队”那该多好啊！城市和企业、事业单位的“四清”，也经历过同样的历程，可以把“职工委员会”变成“不走的工作队”。可是，从“四清运动”的实际情况看，在坚持指导思想“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前提下，我的这些想法就是脱离实际的空想！

错误的政治方针与错误的经济政策，就这样互相支持，互相影响，给中国人民带来灾难。更可怕的是：明明真相如此，却不让说，谁说真话谁“犯错误”。

经济政策上的错误，其根源在政治上。左的错误本质，就是把社会管理不科学的问题，硬要说成是阶级敌人捣乱破坏。不抓改善管理，而要狠抓阶级斗争。以谁挖出来的阶级敌人多，性质严重，就说明谁的“社教”搞得不好。

以上我们所犯的错误，从思想方法上说，都是违反系统思维。

第二章 系统论是当代辩证法

现在的理论界，特别是富有创造精神的“院外理论工作者”，对传统教科书中所讲的唯物辩证法，乃至一般意义上的辩证法，都有不同看法。他们争论激烈，互相批评和帮助，热闹得很。这说明人们已经意识到：我们的基础理论中存在很严重的问题。不承认系统论的基础性地位，是其中最严重的问题之一。

在列宁“政治就是阶级斗争”观念指引下，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引入国外系统论时，有些事情在今天看来，相当不可思议。

《软科学的崛起》一书，由国家科委科技政策局编辑，地震出版社1988年8月出版。书的内容提要上写着：“软科学的服务对象是各个层次的管理者、决策者……它能为各级政府部门和各企事业单位的决策科学化和管理现代化提供咨询和依据。”我们要问：这些内容难道不就是政治吗？关于政治，我们在第一章已经讨论过了，这里所说，不就是直截了当地要求政治科学化吗？领导干部的两件大事：用干部和做决策，是政治的主要内容！我们各级党的政治部门，包括组织部和宣传部，就是协助领导班子做好政治工作。仅仅将政治等同于阶级斗争，即使是在过去的战争年代，也是不正确的，是以个别代替一般。当时的政治至少包括三个方面：对敌斗争、统一战线和动员民众，三者缺一不可。

那么和平建设时期的政治应该怎么理解呢？上述著作出版时间，正是全党接受“文革”教训十年之

后。吴明瑜同志所写的“前言”开头就说：“1986年7月，在国家科委于北京召开的全国软科学研究工作会议上，万里同志作了题为《决策民主化与科学化是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课题》的重要讲话。”

以万里同志的身份和地位，这样公开地发出号召，为什么“政治体制改革”竟然毫无踪影呢？成功实行政治体制改革，是决策民主化的必要前提。政治不改革，决策不可能民主化。三年以后发生的“六四事件”，似乎成为中国民主化进程的急煞车。一些最紧要的话题不得被搁置起来。不把系统论跟政治紧密联系起来，我们对政治很难有正确认识，因为系统论才是当代的唯物辩证法。

把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的我们，一直以认为：唯物辩证法是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基础。尽管这种认识并不准确，因为唯物史观才是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基础。但是，马克思、恩格斯在论述具体问题时，常常会用到唯物辩证法。因为唯物辩证法虽然不是马克思、恩格斯自己的发现或者发明，却是人类智慧的结晶。所以把唯物辩证法当作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基础，原则上不能算错。但是，系统论是当代辩证法，是古老辩证法的精细化和可操作化，是辩证法的高级形态。在当今世界可以认为：**不懂系统论的人，就是根本不懂辩证法。**这一点为大家所忽视，所以需要特别地加以强调和说明。

第一节 系统论与辩证法的紧密关联

中国古代道家的辩证法思想，如“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等等，特别是用寓言故事“自相矛盾”所表述出来的辩证法，透露出来的基本信息是：其一，世界是普遍联系的，世界上没有绝对孤立的事物；其二，世界上的事物是不断发展变化的，没有绝对静止的事物。或者说：静止是相对的，运动是绝对的。所以，用孤立和静止的观点看问题，就是反辩证法意义上的形而上学。而辩证法的古老形式，就已经包含有萌芽状态的系统思维。认真揣摩一下道家的上述教导，就一定会有所感悟。甚至可以说，其中已经包含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早期观念，即人类本身就是个大系统。而中国古老的阴阳思想，更是辩证法的灵魂。2024年3月在北京召开的纪念纪由先生的大会，事实上已经确认：他的阴阳互根32字口诀，“阴为阴中阳，阳为阳中阴。阴中有阳，阳中有阴。以阳压阳见真阳，以阴压阴见真阴。”是研究古老阴阳学说的最新成果，它与系统论非但不矛盾，更是系统思想的进一步深化。阴阳互根，就是相关双方互相是对方存在的根据。阴阳互根是讲根据、内因，互补理论则是讲两者相互关系的本质，协同论是讲两个相互关联的子系统之间如何协作的具体表现。这三者是统一整体，存在着由深至浅的关系。

后来的德国哲学家们，对这些基本思想进行发掘、整理、研究、加工，搞出来一整套的辩证法论述：什么对立统一规律、质量互变规律、否定之否定规律等等，无非是对大自然的演化规律做了一些形式化的概括。造成这种演化规律的根源是什么？动力机制何在？都不甚了了。当这些理论从德国引入中国以后，所产生的种种生搬硬套现象，违背了辩证法。搞辩证哲学的人，自己竟然犯教条主义错误，这本身就是极大的讽刺！不要去埋怨王明、博古等人。实际上，以黑格尔为代表的德国古典哲学家们，硬是把辩证法完全给形式化了。这些人习惯于形式逻辑思维，他们搞的这一套，可称之为“形式辩证法”。他们这一套东西，学习和理解起来非常困难，因为把辩证法归结为“三大规律”，并不符合辩证法精神。讲对立统一，就如同说“木质的铁”一样费解。如果是针对一种瞬时状态，那么它是对立的就不可能统一，是统一的就不会对立，说话必须表达确切含义。它也无法用来解释和说明另外两条规律：质变和量变分别同时进行，二者并不对立，何必求统一？原子表面少一个电子，原子就变成离子，最外层电子数决定它是离子还是原子，这跟对立统一规律不相干。否定和肯定也一样，否定的是A，肯定的是B，二者并不对立，无需再求统一。如果我肯定A，你否定A，我们俩这才闹对立嘛！可事实不是这样。

但是欧洲人所习惯使用的逻辑思维，恰恰是中国人思维当中的薄弱环节，所缺少的因素。在历史上，中国人偏重文科思维，轻视理科思维，因为科举考试做官，考的全是写文章，不考数理化。中国古代发明家，凡是出了名的，都是后来做了大官。不做官的发明家，只能默默无闻。所以说，只有将文科与理科统一起来，形成系统思维方式，才是通向科学思维的康庄大道。

当代系统论是在上世纪初，由国外的一批管理科学兼自然科学家提出来的。

上述《软科学的崛起》一书，详细地叙述了系统论的提出和发展过程。一般认为，系统论由六大基础理论构成。它们是：贝塔郎菲的一般系统论、仙农的信息论、维纳的控制论、普里高津的耗散结构理论、哈肯的协同学和托姆的突变论。爱根的“超循环理论”实际上建立在前六论的基础之上。这些专家都是西方科学家，有美国、比利时、德国、奥地利等国家的。他们在研究过程中利用了大量医学、物理学、化学等自然科学知识和高等数学手段，这就给了我们一个错觉：系统论涉及的不是哲学问题，更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因此，人们将其归纳为“软科学”。“软”的意思是不是约束力不强，我们可以不必严格遵守它的规律呢？推广系统论成果甚微，是不是这个“软”字起了作用呢？

四十多年过去，痛定思痛。我想应该说清楚：**系统论就是当代辩证法！万物皆系统，说明了世界普遍联系的最基本方式。**

我们现在重视生态文明建设，这是为什么？一方面，是现实生活和历史对我们进行的硬性教育：**发展不是硬道理，科学才是硬道理**；违背科学的发展，造成生态环境破坏，已经和还将给人类社会带来沉重灾难。例如：砍伐森林用来种粮食，就是一种短视行为，不可持续。从思想方法上说，是形而上学，违反辩证法。如果我们有了生态系统平衡的正确理念，就不会出现这种短视行为。同时也不会将这种观念绝对化，只要不影响全局和长远生态环境建设，为了生产生活的需要，有计划地砍伐一些伐去后不影响生态环境的树木，还是可以的。

要问为什么是这样？解释清楚这个道理，可能需要一些具体的生态学知识；但从哲学上讲，必须认识到全球生物是一个大系统的本质。

我们的眼睛是向外的，不善于从自身寻找不足。在对于自然生态系统开始有所认识的同时，对于如何搞好人类社会生态系统，却到了近乎麻木的程度。我们的政治制度违背系统论的地方比比皆是。我们的所作所为，一点也不考虑人类大系统的存在。中国似乎开始认识到这个问题，率先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这既是古老中华文明“大同世界”和孙中山先生“世界大同”思想的体现，更是开始采用系统思维对于人类社会所进行的思考。但是具体应该怎么做，还是不甚了了。为什么是这样？因为我们自身做得并不太好，缺乏运用系统思维认识社会关系、处理社会事务的经验。如果不改变这种局面，如果还是停留在美国独霸和奴役世界，号召全世界各国人民起来革命，推翻帝国主义的统治，这个世界就变好了的认识上，是远远不够的。

我们各级领导班子不知道如何按系统论进行决策和处理问题，经常停留在“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状态。上访的人多了，就成立个信访办；社会上有不良动向，就搞“维稳”。由于改革的思想 and 动作处处违背系统论，使得文、教、卫、体等事业单位失去事业心，努力“向钱看”——这就使另外一些片面思考的人认为：改革开放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就是“反毛”。事业单位与企业单位的关系是高度互补的，它们的趋同，使两者的互补关系遭到严重破坏，结果就使现实世界很不和谐。

社会由不同的人群组成。所谓人群，实际上就是子系统。子系统之间的关系，本质上是互补的。互补、协同，是系统理论的基础性概念。当这些互补关系遭到破坏的时候，社会就不稳，就会出问题。传统观念就把这些看成是阶级斗争形势严峻，又要动员人民群众去打击阶级敌人了！

子系统之间的互补关系一旦遭到破坏，系统在整体上就处于不稳定状态。这时，人民内部矛盾加剧，就会给外部敌人以可趁之机。“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左倾错误思想，之所以长期得不到清理和纠正，就是因为我们的领导层没有从国家是一个大系统的角度认识和处理社会问题。

系统论的六大基础理论，包括建立在其基础之上的“超循环理论”，都是采用科学思维，研究子系统或要素之间相互关系所取得的成果。这些理论都不能绝对化，但在思考社会问题时都有一定的参考意义。一个好的企业管理模式，实际上是比较好地运用了系统理论的模式。在现实社会中：**企业是小社会，国家是大企业**。运用系统理论能够搞好企业管理，促进企业的进步和发展，特别是实现其内部和谐，为什么不能用来管理和治理国家呢？我想，我国各级党和政府领导人，都应该好好地向往任正非同志学习，看看任正非是如何管理好庞大的华为公司的。用系统论管理好地球，只能是未来的奋斗目标；不过这件事不能消极等待。最近，中国对外推行让敌对势力和解的努力，如让中东两伊和解等等，获得了世界舆论的好评。这说明把整个人类看成一个统一大系统，符合全球多数人的利益。

但是，用系统理论来管理好一个像中国这样高度统一的国家，应该是眼前就应当努力做好的事情。

第二节 系统论的根在中华传统文化

一般系统论的创立者是一位医务工作者，这不是巧合，而是出于某种必然性。因为人类认识系统的伟大意义，正是通过对人自身神经系统、消化系统、血液循环系统等的了解。但是，只要认真比较一下中西医，就知道中医理论才是世界上最早采用系统思维的理论。

前面说过，辩证法的最大特点是注意事物的相关性，不会孤立片面地看问题。这可以概括为认识事物的“整体论”，中医的神奇之处正在这里。明明是头上有病，或者是内藏有问题，却可以在手上或者腿上找到穴位，用针灸或者其它方法刺激穴位，通过经络治疗疾病。还有所谓“冬病夏治”、治“未病”等等，更是注意到了事物在时间上的关联性。

更值得注意的是《孙子兵法》，世界各国军事院校都把它作为必读教材。然而，军事是政治的集中表现，它也是全世界最早的系统论政治教材。这一点，在笔者写作《条件分析引论》（上海社科院出版社，1990年）时就已经注意到了。后来写作《条件哲学与互补原理》（江西人民出版社，2009年6月）时，更是充分利用了这一事实。

中华传统文化的精华，就是其中充满着系统精神。它被概括为**整体论和互补论**，实际上此二者是**系统思维的要害和主要内容**。

其它例子不用多举，以上这些就足已说明系统思维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精华。

所以，我们不要看到系统论的“创立者”都是一些外国科学家，就以为系统论是舶来品，以为系统论与“无产阶级政治”无关。恰恰相反，所谓“无产阶级政治”，必须是系统化的，否则就与中华传统文化脱节，也谈不上是“无产阶级”的，因为胸怀天下，是无产阶级的阶级本性。

《孙子兵法》是古代系统论的典型教材，而且往往显示出比现代系统论更高明之处，这一点很是令人惊讶。

现代系统论在用于实际问题时，对于“因子相关度”的确定，采取了一种极其错误的做法：即用“重要度”来确定因子的权值。同一因子，不同的专家会因其所属专业的不同，对因子重要与否做出完全不同的判断。比如一条河流要筑坝蓄洪，对于坝址选择产生争议：水利专家认为防洪最重要、交通专家认为航运最重要、农业专家认为灌溉最重要，如此等等，莫衷一是。将他们的评分加权处理，就纯粹是一种数学游戏，毫无科学性可言！

中国古代的孙武先生可不是这样做的。他是将因子相关度的大小，作为因子权重的依据。《孙子兵法》所讲，是一个双层递阶系统，总目标是说明取得战争胜利的条件。第一阶，可称子系统，即“道、天、地、将、法”。

在孙子看来，无道之战，无论如何都不能打。道，是统帅一切的东西，所以与战争胜负相关度是1。

“道者，令民与上同意也”这是什么意思？上下一心哪！国王和老百姓意志统一，是战争取胜的关键前提。在他哪个时代，就提出了“民心决定论”，预先说出了唯物史观的基本原则！

对于五大条件群的排列顺序，严格按照条件相关度由大至小排列。需要注意的是：这里的“天”，不能简单地理解为气象，而应指“天时”，即是说天下大势，政治上是否对自己有利？否则，就没有这么高的相关度。

其它条件群的排序不再解释，只说明一下为什么孙子把法制问题排在最后。在孙子看来，法制是要众将领来遵守和执行的；如果将领自己很不争气，再好的法律制度也没用！这是对于过去战争经验的总结。这一点对于我们一些迷信法治的同志，应该是一副清醒剂。当然，排序只是依据相关度大小进行，决不是说排在后面的子系统没有用，或者不重要。

“五事”之下，是具体条件，可称为“因子”。因子对于条件群的相关度，也是严格由大至小排列。比如对于“将”的要求：“智、信、仁、勇、严”，五者排列顺序很严格，不能颠倒。古人说“将贵智”，

就是把将领的智慧摆在第一位。不智之信，谓之轻信，没有不打败仗的；不智之仁，谓宋襄公之仁；不智之勇，谓之鲁莽；不智之严，捆绑了部下的手足。往下顺序也是一样，不信之仁，叫做假仁假义；不仁之勇叫做残暴……以下类推。将领自己不勇敢，就没有权力严格要求部下。

从表面看，孙子不懂高等数学，对于因子权重没有进行计算；而从本质上看，他比任何系统论专家都高明百倍！而我所做的工作，仅仅是找到了确定条件对于目标权重的计算办法：只有“验后概率”，才是确定条件相关度的唯一根据！即因果关系量化的唯一根据。同时指出：直线因果观根本不成立，任何结果都是条件组合所决定的，单项条件没有决定权。但是，绝对性条件对于目标拥有否决权！

我们的结论是：**落实系统论就是弘扬中华文化。**

第三节 可持续发展理论与系统论的血肉关系

可持续发展理论，是先进的人类思想界共同提出来的。可持续发展理论是指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它以公平性、持续性、共同性为三大基本原则。可持续发展理论的最终目的是达到共同、协调、公平、高效、多维的发展。可持续发展理念是科学发展观的核心内容，它强调在经济发展过程中，要注重环境保护和资源节约，以确保未来的可持续发展。这种思想，是对于二战结束以后，世界各国都把经济发展作为社会生活的主题，工业革命更是在全球掀起“经济热”，在短期内积累物质财富的同时，却造成了资源短缺、环境污染、生态破坏、土地沙化、臭氧层锐减、温室效应等问题。世界有识之士开始对问题进行反思。1962年，美国生态学家卡逊出版《寂静的春天》一书，深刻揭示化学杀虫剂对生物界的危害。1972年罗马俱乐部的研究报告《增长的极限》，提出世界面临“灾难性的崩溃”，引起人们对环境和资源对人类不断增长的需要的可供性的关注和担忧。接着，联合国历次大会把环境问题列入议事日程，发布《世界自然保护大纲》、《我们共同的未来》等等文献，将可持续发展问题引向世界最高程度的关注，形成全球共识。

但是，人们并没有注意到可持续发展理论与系统理论的血肉联系。所谓系统理论，既包括横向的，即空间方面的系统延伸；也包括纵向的，即时间方向的系统发展，而且可能更为重要。人类生活的过去、现在和将来，构成统一的大系统。谁要想把过去、现在和将来割裂开来，谁就违背了系统思维的一般准则。

人类和其他哺乳类动物的根本区别在于：人是智慧生物。智慧是什么意思？就是懂得对于事物联系起来进行思考，不是孤立、静止的看问题；懂得空间方向的横向联系和时间方向的纵向联系，而且将这两个方面结合起来，这才是人的辩证思维。所以，坚持反辩证法意义上的形而上学思维，就属于低智慧生物；或者也可以说，这些人离开真正意义上的人还有比较远的距离。

要加深对这个问题的理解和认识，必须从自己做起。每个有志气的人，都要努力学习系统思维，因为**系统思维是反对形而上学的精神武器。**

第四节 怎样用系统论管理社会

如果承认了上述结论，那就带来一系列问题。

第一，我们的管理者，根本不懂系统论，这怎么办？

不懂就要学习。建议：**将系统论作为干部培训和党员学习的基本教材。**为了让人民群众能以系统理论为武器，监督和帮助干部，在人民群众中广泛开展系统理论的学习和教育，也有必要。当然，这是个逐步推广扩大的过程，不要想如过去全民学毛选那样“活学活用”、“立竿见影”。但是我以为系统论的基本精神只要为人民群众所理解和掌握，就一定会产生巨大的精神力量。

在学习中遇到的第一个思想障碍就是：我不懂数理化，没有那么深厚的自然科学知识，理解不了系统论，这怎么办？

这个问题应当从两方面看：

其一，我们过去的学习，总是学习历代领导人的讲话和著作，不学习数学和自然科学，这其实是不对的！**我们理解任何一个重大理论问题，都必须立足于充足的自然科学和人文知识的基础之上。**没有基础知识，领导人的讲话和著作其实你没办法搞懂！所谓学习，成了语录背诵，好像鹦鹉学舌，不理解其精神，根本没有实际意义！当你有了丰厚的基础知识以后，你对历代领导人的讲话看法又会有所不同，理解也更深刻。甚至如果其中有什么不妥当之处，也不会对你造成伤害——你会理解领袖之所以那样讲的原因或苦衷。例如，邓小平所说的“不争论”，就有很大片面性——不争论那里会有真理呢？但邓小平那样说，在当时情况下不能算错，它有很强的针对性，有特殊的策略意义。如果我们作了教条式的理解，那是我们自己的形而上学思维方式造成的，不能怪别人。

其二，任何人都不能成为万能学者，什么都懂。所谓“数、理、化、天、地、生、文、史、哲、商”十项全能的人，在现实社会中并不存在。所以，一些知识的欠缺，不能成为我们学习系统论的障碍。但是有一点例外，那就是最基本的数学知

识是不可或缺的。如果你连概率是什么都搞不清楚，那就很难办了。

反正学习系统理论也是学习，顺便把概率的基本概念搞清楚更好。这对于一切管理者都有用。如果一个现代管理者不懂概率，那就只有请他离开领导岗位！

第二，在社会管理中如何运用系统论？

系统论的基本观念是：没有孤立存在的事物。既然如此，在运用系统论之前，首先要搞清楚个人与集体的关系。集体是由个体组成的，只是各人所处位置不同，所起作用不同而已。如果你瞧不起小小螺丝钉，有一架航天飞机，就是因为螺丝钉的脱落而造成机毁人亡的。因为人在集体中都有特定的位置和作用，他们就没有高低贵贱之分。所以人人平等，决不仅仅是人文追求，更是科学的规定。

在这个基础上，我们需要深入调查研究：一个系统之内的人们，是如何相互协同的？比如说，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买者和卖者双方如何实现协同？城市和乡村如何协同？工业和农业如何协同？生产、销售企业和交通运输业如何协同？在社会运行过程中，信息传输是否通畅？各种“能量”的消耗是否合理？这里给“能量”二字加上引号，是指各类人的工作积极性是否能充分发挥和得到足够的尊重？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才能找到改善社会管理的要点和优化管理的方法。

在社会管理中运用系统理论，必须排除传统政治观念所造成的思想障碍。按孙中山先生的观点：**政治是管理众人之事**，这是全人类至今唯一正确的政治定义。台湾已经把政治搞成了争权夺利的代名词。中国在这方面的问题很严重，不是短短几篇文章就能说清楚的。这里仅仅举一个例子：中国为什么要搞市场经济？

一些“左派”人士认为：搞市场经济就是搞资本主义！搞计划经济才是社会主义。这是一种极其幼稚和糊涂的观念，但影响很大。特别是在市场经济导致“一切向钱看”的问题没有引起充分重视，得不到及时有效解决的时候，你无法说服这些“左派”们。

那么，中国究竟为什么要搞市场经济呢？共有三个原因：

最根本的原因，是解决消费的随机性和生产的计划性之间一直存在着的矛盾。

任何个人消费都是随机性的，特别是老人、小孩和青年妇女的消费，随机性更强，简直无法事先做计划。而消费品的生产，必须有计划、按比例，按节约原则进行，不可能有随机性和任意性。这二者的矛盾如何解决？只有靠实行市场制度来解决，将市场预测作为安排生产的依据。即使如此，如果

预测与实际情况差距较大，也会引发一定的经济危机或者生产困难。

有人以为，在全国实行军事共产主义，一切按计划供应，这个矛盾就解决了。但果真如此，在和平状态下，剥夺人们的生活消费自由，所产生的思想影响，将带来极其严重的政治后果。中国从1954年开始，就废除了供给制。

实行市场经济制度的第二个原因，是适应现代生产国际化的需要。中国经济要融入全球，要在世界上担当重任，为第三世界国家做出榜样，就不可能将自己的经济封闭起来运行，一定要投入全球大市场。近几年来，我国提高人民币国际化水平的努力，取得了长足进展。

还有第三个特殊原因，那就是中国实行按需生产和按劳分配所造成的生产与分配原则不一致的矛盾，必须通过市场制度解决。这是社会主义国家特有的矛盾。而资本主义国家既按资生产，又按资分配。在它们那里生产与分配的两项原则倒是统一的。现有的社会主义分配原则需要深化改革，则是另外一个问题。但不管怎么改，生产原则和分配原则仍不能完全统一，需要利用市场调节来解决矛盾。

总的一句话，要用系统论中的统一性、关联性、相互渗透性等观点来看待市场问题。不应该再将这种互相紧密关联的问题分割开来看。

站稳了系统理论的立场，就是站在了无产阶级的立场上，就不会犯什么政治错误，因为无产阶级是“世界公民”。这里所说到的相关性的各种概括，其哲学本质就是：不同要素的互补性，即阴阳互根。

第五节 相关因子的互补性是系统思维的要害和关键

这是协同学的主题思想。所谓激光原理，本质上是光子（波包）之间的相互激发和作用。人类社会活动本质上也是如此。我们常说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就是看到了这种相互激发热情的作用。其实这话并不准确：对于榜样的积极性不加爱护，榜样也会渐渐失去他（她）的作用。一切作用都必须是相互的，这才符合系统思维。

所谓互补，决不是一般地互相帮助，互通有无，而是互补双方提供给对方的，都是对方赖以生存的绝对性条件。以买卖互补为例：没有人买东西，你开商店干什么？如果消费者想买什么都买不到，在现代社会将如何生活？系统作为耗散结构，处处充满能量和物质的消耗和转移。当我用心帮助一位老人克服困难，找到他失散了亲人的时候，他们全家都会感激我——而这并非感激我，是在感激整个社会。当社会充满温馨和友爱的时候，人们才会在内心深处高唱“社会主义好！”否则，城管和

市民冲突，今天这里打人了，明天哪里杀人了，做了好事反而被人诬陷；或者用老鼠骨头充当鸭头；狗咬人致人受伤住院，咬人的狗被受伤者打死，狗主人反而向受伤者索要买狗钱！如果经常发生这样的事，和谐社会何在？！

党中央提出建设和谐社会，实际上已经意识到了系统思维对于国家和社会建设的极端重要性。

工农业互补，是体现互补原理的有力实例。我们的工业原料，主要来源于矿业和农业，而矿业本身是工业的组成部分。除了矿产品以外，人们吃、穿、用、住、行所需要的工业产品的原材料，归根到底来源于农业（含林、渔业）。此外，农业更是工业产品的巨大吸收者和消费者，农村是工业产品的广阔市场。而农产品的市场，除了自己消费，主要也在城市和工业。所以，我们思考任何一个社会问题，都必须以其广泛的相关性、社会性为前提。

我国现状是什么呢？社会高度的互补性受到了什么破坏吗？

我想大家心知肚明，不愿意说的就是：**干群关系不好，官民互补受到严重破坏**。从贪污腐败份子的数量和贪污金额的巨大数字看，已是空前，希望能够绝后。有人想，解决这个问题就是法制要严，多杀几个，多关几批，犯罪成本高了，代价大了，他也就敢犯罪了嘛！这种想法实在是太天真了！

贪官连死都不怕，还怕坐牢吗？贪官过多的根本原因是：**权力分配极不合理**，处处显示出“官本位”特色。官多大，理多大，不当官就没有“理”！某位主持干部培训工作的领导人曾经对我说：“你知道什么是领导科学吗？领导就是科学！连这点都不懂，你还讲什么领导科学！”不知道他是有感而发，还是真这样认为？一个“外行领导内行是客观规律”，就取消了内行的发言权。这样的典型例子不胜枚举：管地质的领导不懂得“矿石品位”，下令在“有金子”（远低于品位）的红土层里面勘察金矿，浪费了国家的大量投资和人力物力。使用干部，论资排辈，压制了多少年轻人才！中国年轻人才在国外大放光彩，除了指责他（她）“不爱国”以外，为什么不好好检讨一下中国自己的用人机制呢？

苏联后来是出了问题。但为什么不好好想想：原来比中国落后很多的农奴制度的俄罗斯及其它加盟共和国，怎么可能在短短几十年时间内就变成了可以与美国抗衡争霸的苏联呢？世界上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是由苏联发射的！当时就只讲社会主义优越性，苏联是我们学习的榜样！制度优越怎么出了一个“叛徒”就垮台了呢？出一个“叛徒”就能把整个制度搞垮，难道社会主义制度是纸糊的不成？事实决非如此！而是苏联当时实行了技术本位的管理制度！农场实行总农艺师责任制，书记、场长都得

围绕老总的规划开展工作。工厂实行总工程师责任制，书记、厂长围绕总工开展工作。科学技术居于领导地位，行政、党务为科学技术服务。电影《驯火记》生动地描述了这种状况。支援中国的苏联专家，也跟本人及长辈讲过这些事情。但是，苏联的教授治校，专家治厂，却被我们看成是“反对政治挂帅，大搞修正主义”，对之进行猛烈批判，而且以当时中苏交恶和后来的苏联垮台作为“苏联变修了”的证据！

这种被扭曲的历史应当尽快纠正过来！近来看到网上有公正评述赫鲁晓夫的材料，但不知道是否经过了有关部门的审查和同意？苏联对华援助最充足的时候，即1954年，恰是赫鲁晓夫掌握苏联政权的时候。而他对于斯大林时代在全苏联制造冤假错案的揭发、批判和纠正，比较彻底。斯大林本人功劳巨大，应当全面评价是另外一个问题。但是，正因为斯大林同志功劳大威望高，才具备了犯“左”倾错误的条件。后来，苏联从中国撤回专家，是苏联对我们“猛烈批判苏联修正主义”的必然反应，不能光怪人家。

政治和行政工作，支持并服从科学技术发展的需要只是一个方面；更重要的是政治工作本身必须科学化。苏联垮台的根本原因，是他们的政治没有科学化，违背系统原则，搞少数人专制，维护当权者的利益。勃列日涅夫等人，复辟少数人专制。到了戈尔巴乔夫时代，各加盟共和国领导层的特权思想更为严重。原来我们说西方意识形态渗透，造成苏联解体。可是全苏民意测验有71%的人反对苏联解体；按照西方民主原则，苏联不应解体。但苏共中央少数领导就是置民意于不顾，利用苏联苏维埃中央政府，强行宣布苏联解散。这说明前苏联也并没有真正被“西化”。苏联在解体以前，就已经成为“社会帝国主义”（毛泽东语），这才是问题的本质。

第六节 政治制度改革已经迫在眉睫

历史事实是：苏联垮台是“官本位”造成的。针锋相对，我党中央在在强调“民本位”，以民为本，人民就是江山。具体怎么体现呢？干部制度不改，决策机制不改，“以民为本”就永远只是一句空洞的口号。

采用系统思维，是政治工作科学化的主要内涵，是政治改革的指导思想。

官员公布财产，是世界各国的惯例。我国人大讨论多次就是通不过！其实，财产不公只是权力不公造成的最终结果。人民群众对政府官员没有任何“监督权”，官员权力至高无上，想培养出一心为公的好官员，极其困难！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有很多重大决策，牵扯到方方面面的利益。所谓“官商勾结”，是官员犯罪的主要形式，因为搞项目经营，

离开官方支持就搞不成，出资方就想设法拉官员下水，争取官员支持自己。决策论证，本质上不是科学论争，而是利益博弈。在这种情况下，科学处于“仅供参考”，或者“为我所用”的地位，不是决策的真正依据。这样，决策层想不犯错误也难哪！

为此，笔者提出“常委表态公开化”，（《领导科学》2010，5月上，16页）至今无人问津。文章的四个小标题，就是需要这样做的政治意义：政治改革的开场锣鼓、反贪治腐的一剂猛药、考评干部的关键环节、群众监督的有效途径。如果做到了这些，人民群众应该关心的是：干部在重大决策讨论中持什么态度？重要的错误决策在表决通过时，某位干部是坚决反对者——这样的干部就值得群众尊重、信任和拥护。因为他遇事有自己的主见，不盲目随大流。**干部在重大决策中的表现为选民群众所了解，才能作为群众考核干部的真正依据。**

政治民主化建设的另一关节点是认真实行“双首长制”（《双首长制的现实意义和内在逻辑矛盾》，载《领导科学》2010年11月上，第15页）

封建社会和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国家政府，都实行单一首长制。封建社会是“朕即天下”。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有的实行总理制，如英国，女皇只是摆设；有的实行总统制，总理只是大管家而已。只有当年的中国工农红军，才真正实行了“双首长制”——总政委和总司令各负其责，各司其职，没有谁领导谁的问题。

现代的一把手把自己当皇帝看，常常是极其不自觉的。革命事业领导人，在主观上不会把自己的权威凌驾于其他领导人之上。但是，当某人的意见总被证明是正确的，其他人的意见常常被证明是错误的时候，久而久之，革命队伍里的人们就会不自觉地把这位领导人当成事实上的红色皇帝。认为：反对他就是反党，就是反革命！此种事情一旦既成事实，党中央的政治生活民主化就很难做到，甚至彻底终结！所以，红军规定在军事上由总司令指挥，在政治上由总政委领导，遇大事两人商量着办。明确实行双首长制，双方都会自觉地尊重对方的意见，再也不会不自觉地把自已看成皇帝了。封建社会的基本观念是“天无二日，国无二君”，红军实行真正的“双首长制”，就彻底革除了革命军队内部的封建传统。再加上士兵委员会对军政领导的有效监督，红军内部的民主就比较完善。

全国革命胜利以后，双首长制基本结束。总理不是和主席平权的最高首长，而只是主席意见的执行人。由此造成的政治损失简直无法估量。现在的政治体制改革，必须重回双首长制传统，而且要提高一步。协同论是指双方，如果只有单方面，协同论也无用武之地。

我的另一篇文章是“领导科学中的互补原理”（《领导科学》1987年第10期，第7页）。以上三篇文章从不同侧面论述了系统思维在领导科学中的意义和作用。希望能够引起中央有关部门重视。

第七节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终极标准

曾经的两报一刊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影响巨大，使我们的理论工作者基本上无法工作。一切都让实践来检验，实际上是主张“干就是一切”，理论讨论毫无意义。这是中国理论界的巨大悲哀，因为这种主张也是所谓理论工作者自己提出来的。

标题中“唯一”二字是极大错误！这是形而上学思维的结果，是反辩证法的命题。如果改成“终极”二字，并不影响实践的权威性，而且符合实际。

理论与实践构成互补的系统，必须用系统思维来理解。

理论是对过去经验的总结，用来指导今后的实践，时间、地点、各种条件都发生了变化，原来的理论还有效吗？这就需要理论工作者认真地进行调查研究，搞出符合实际的理论论证来。决不是等到中央做了决定，再来想方设法说明中央决策如何英明正确。理论工作者不应只是吹鼓手。所谓“毛派”仍然主张：“毛主席怎么说的我们就怎么做！”，我就对他们说：“毛主席从来没让你们玩手机，你们怎么天天玩手机？你们对毛主席不忠！”对方哑然。

随着时代的发展一切都在变，当然也有很多是不变的。现实是变与不变统一，需要从时间的系统性方面思考问题。

所谓真理，各人的理解都有所不同。帝国主义者说：“真理在大炮的射程之内！”但是，由于导弹技术的发展，“真理”已经超越了大炮的射程。可见即使他讲的是歪理，也会随着条件的变化而变化。

而我们所理解的**真理，是事实与逻辑的高度统一**。如果不统一，无非是两种可能：事实不真实，或者逻辑不成立。特殊情况下，两者都存在问题。

理论讨论得出来的结论，在我们的社会实践中，必须认真遵照执行。只有不折不扣的遵照理论进行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终极标准。否则，你经常背离理论指导行事。最后出了问题，你又说经过实践检验，证明这种理论不对。这样就极不合理，因为你的板子打错了地方。

所以，对于过去的成功与失败，经验和教训，都必须在理论上经常翻翻老账，弄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如果我们的理论工作者，这也不准讲，那也不准讲，那样的话，理论工作就别干了！

一个国家，一个社会，如果连理论工作者都不敢争鸣，“万马齐喑究可哀”，那这个社会的“民主”也就彻底完蛋了。言论自由是民主的前提，更是民

主的保障。但是，言论自由决不等于造谣自由。这个矛盾怎么解决？据说俄罗斯有专门的辟谣网站，一天二十四小时不停播送什么消息属于谣言，告诉大家不可相信。如果此消息属实，倒可以供我们借鉴参考。这样做虽然给宣传部门增加不少工作量，但是如果工作认真，搞得好了，对于国家和民族有大益处。其一，全国公民不会因为什么消息是真是事，什么消息是谣言而争论不休。遇有怀疑查一下中宣部专业辟谣网站，就清楚了。这对于提高全民辨别真假是非的能力，加强团结合作有极大促进作用。其二，久而久之，公民只要善于独立思考，就会知道：敌人为什么要造这种谣言？试图在心理攻击方面达到什么目的？难道是我们自己有什么地方做得不对，被敌人利用了？对于提高全民的警惕性和自觉改造思想的能力，也有帮助。经历多了，老百姓就有经验了，不容易上当受骗了。

理论工作者对于我们党和国家的过去“翻老账”，就是要对党的历届领导人，包括主要领导人和团队主要成员，造成是非成败，及之所以如此的主、客观原因，进行透彻分析。这种分析“对事不对人”，不支持吹捧个人和攻击个人，但一定要把“事”分析透彻、讲清楚。这件事如果做好了，就会在中华民族思维的风格中，彻底清除“圣旨即真理”的封建遗毒。这对于提高中华民族独立思考，决不盲从的思想品格，是极为重要的训练和演习。

第八节 生态政治与系统政治是什么关系？

前面我们曾经说过：资本政治，就是政权政治在帝国主义集团的具体表现。那么我们所说的系统政治又是怎么回事呢？在第三章还要详细说明这个问题，这里先把结论性意见提出来，给读者一个初步印象。

政治的概念，至今已经出现三个层次：最原始的政权政治，就是谁掌权就表明谁政治正确，丢了权就是你政治错误。它在今天的本质就是资本政治——资本利益高于一切，使资本快速增殖就说明你政治正确；反之就说明你政治错误，必须更换政府首脑和班子。美欧日都是如此。

中国共产党提出科学发展观，就是认为发展观才是政治，它统帅一切，领导一切。党领导国家和整个社会，能够健康、科学地发展，就是政治正确。违背科学发展，就是走邪路，犯政治错误。

紧跟着提出的“五位一体”布局，把科学发展观的核心问题突显出来，这就是生态文明建设。这使政治上升到了生态政治台阶，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就是政治正确，违背和破坏生态文明建设，就是犯政治错误。生态概念本来就是系统化了的概念，或者说它的本质是把地球的所有生命看成是一个大系统。而生命建立在非生命物质的基础之上，所以进一步宁可说：地球是一个大系统。这就提出了我们

一定要运用系统思维，来处理生态保护和发展的问題。质而言之：正如人们常用的“生态系统”概念所说明的：**系统政治是生态政治在思想方法上的本质表现。**

经过本章内容的讨论，我们已经说明：系统政治是生态政治的思想本质，是当今世界最先进的政治概念。但是，无产阶级如果不掌握国家政权，我们也做不到这一切。所以，这种观念决不是要放弃国家政权，而是要求当权者合理地、科学地运用自己手中掌握的国家权力，决不能为掌权而掌权，更不能利用国家政权为自己和亲属谋私利！以权谋私，是对社会生态的极大破坏，更是在动摇系统的稳定性，害莫大焉！

注：本章内容，请参考2024年4月由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发行的《智慧中国与时代人物》一书，第210页至第213页，陈建国文章“系统论是唯物辩证法的高级形态”。

第三章 政治的基本概念及其阶梯式发展演化

马克思主义认为，政治是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我们的革命和建设实践中，政治的范围都远远超出了“阶级斗争”，而且各级党委政治部的实际工作，所涉及范围几乎达到了整个社会的上层建筑领域。但是，左倾思潮的特点是：看问题一定要抓住问题的本质。他们认为：这些都是表面现象，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才是问题的本质。所以，对政治问题一定要“以阶级斗争为纲”，进一步要求全国各个方面都要以阶级斗争为纲，“纲”就是我们一切工作的指导思想。在“以阶级斗争为纲”思想指引下，我们曾经开展了1957年的“反右斗争”，把许多敢于向党“提意见”的知识分子打成“右派”，说他们借整风之机向党进攻。1959年在庐山针对彭德怀元帅等人的“反右倾”斗争，也被说成是为了反击资产阶级的“进攻”。经过“三年困难时期”以后，跟着进行的“五反”、“四清”等等，当时称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简称“社教”。一直到1966年至1976年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接下去两年以“揭批‘四人帮’为纲”，本质上都是“以阶级斗争为纲”。建国后至1979年以前三十年的历史，有一半以上的时间显示出“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特色。这是为什么？难道是我们共产党人偏爱斗争吗？当然不是！从1921年建党，到1949年建国，我们经过了28年的艰苦奋斗，才取得全国政权，在这个过程中牺牲了多少革命烈士？还有他们的亲属和无辜百姓？斗争就会有牺牲，难道我们不知道吗？那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自己经历过旧社会，看到过革命尚未成功的兄弟国家的劳动人民，人民一旦失去政权，就会失去一切，任由统治者宰割，革命果实就会丧失殆尽。所以，我们把革命政权看得比自己的生命还宝贵，还重要。敌人会牢牢抓住政权不放，我们重视建设和巩固

红色政权，就是从敌人那里学来的，这有什么错？要巩固和保卫红色政权，就必须以阶级斗争为纲！

但是，三十年的经验教训告诉我们：政权政治的观念太原始，太落后了！我们不能“为政权而政权”，因为民心向背，才决定着执政党的命运和前途。只要让全国绝大多数老百姓都懂得并且坚信：只有中国共产党，才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党，我们的红色政权就一定非常牢固，无坚不摧！要达到这样的效果决不是靠说教，而是靠社会发展中从不间断的事实！只有事实才具有最强的说服力！

第一节 政权政治和政治概念的原始性

孙中山先生的政治观念与马克思主义高度一致，即是说：**人类的社会管理就是政治。**然而政权政治的观念与此相距甚远。

为了说明这个问题，我们暂时离开国内，到所谓发达国家去看看他们的民主政治是怎么一回事。

2013年，爱德华·斯诺登的名字犹如晴空霹雳般响彻全球，史称“棱镜门事件”。他是美国中央情报局（CIA）的情报人员，据他在英国《卫报》揭露：从2007年起，美国国家安全局通过一个叫“棱镜”的项目，秘密窃听所有美国公民的通话记录。就在国际社会为之哗然之际，美国《华盛顿邮报》再次爆料，国家安全局不仅监听通话，还在监视所有网络动态。时任美国总统奥巴马，不仅承认这个事实，而且还辩称这是为了保护公民的安全。但是谁都知道：这是对公民隐私权赤裸裸地侵犯，是对人权的疯狂践踏。正在这个关键时刻，斯诺登勇敢地站了出来。6月9日，《卫报》应他的要求发布了一段他亲自录制的视频。

当那段震撼人心的视频在网络上传开，斯诺登的声音，坚定而有力，穿透了无数人的心。他说出了每一个普通人心中担忧：“公民的隐私应当得到尊重，在一个人没有犯错的情况下，他的过去、现在和未来都不应当被监视。”短短两天，白宫请愿网页上聚集了两万余名美国公民的声音，他们要求赦免这位勇敢的告密者。美国政府对于斯诺登的愤怒超乎想象，众议院议长的骂声“可耻的叛国者”只是开始，背后的巨大损失更是让他们对斯诺登恨之入骨。在这样的风暴中，民众的呼声揭示了一个时代的困境：当权力与技术相结合，普通人的隐私何处安放？而当我们为真相呐喊时，是否真的能被听见？

斯诺登开始流亡之路：在香港酒店套房的幽闭空间里，斯诺登度过了如同囚禁般的二十天。6月11日，他决定不再坐以待毙，开始了一场跨越多个国家的流亡之旅。冰岛、厄瓜多尔、古巴、委内瑞拉……他频频向这些国家递交庇护申请，却在美国政府的强大压力下屡屡碰壁。斯诺登毫无悔意，甚至在6月21日再度震惊世界，揭露了英国的秘密监听项目“颞颥”。这一举动无疑加剧了他与美国政府之间的紧张关系，也让他的流亡之路更加崎岖艰难。7月1日，

消息传来，斯诺登已向俄罗斯正式递交了避难申请。这一决定立即引发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虽然俄罗斯愿意为斯诺登提供庇护，但他必须“停止对美国造成损失的活动”。面对普京的条件，斯诺登坚定地回应称，“自己从未伤害过美国”。然而，他也表达了一种可能的妥协：如果俄罗斯给予他庇护，他将停止揭露美国秘密的行为。这让人们看到了这位揭秘者在困境中的无奈与挣扎。8月1日，一个令世界瞩目的日子，这一天，斯诺登踏上了俄罗斯的土地，获得了临时居留许可。而在遥远的美国，曾有人为斯诺登立下一尊半身雕像，象征着他曾经的辉煌和勇气。但很可惜，这座雕像在当天就被政府部门拆除，仿佛要抹去他在美国的一切痕迹。在俄罗斯，他找到了新的生活，新的家庭，甚至新的身份——2020年，他获得了俄罗斯的永久居留权；2022年，他更是成为了俄罗斯公民。斯诺登的故事告诉我们：号称头号自由民主国家的美国，实际上并没有民主和自由。这件事情，对于中国哪些“认为美国月亮都比中国圆”的崇美者，是一个沉重打击。当然，如果从正面看，这也是让他们头脑清醒起来的清醒剂。

这到底是为什么呢？一个自认为是世界第一强国的美国，为什么对自己的老百姓害怕成这个样子呢？让老百姓批评政府，不是可以从中找出自己的不足，以便改进政府工作，提高工作效率吗？谁要是真这样想，那他（她）就是太天真了！这里充分展示了政权政治的原始性和落后性。

比起美国政府的种种荒谬不堪，台湾的所谓“选举闹剧”，真是小物见大物了。但是，两颗子弹的故事，也足以让大陆人民见证了所谓“西式民主”的“风采”：当年台独分子陈水扁，也就靠着这种极为“巧妙”的手段上台。2004年3月19日台湾领导人大选，阿扁遭遇“枪击”，获得不明真相者的同情，之后以0.228%的微弱差距险胜对手。陈水扁是台湾地区首位非国民党籍民选领导人，律师出身，毕业于台湾大学法律系。2000年—2008年任台湾地区第十至十一届领导人，因涉嫌贪污洗钱，而被判处无期徒刑，目前在台中培德监狱中服刑。

主张政权政治者就是认为：不管通过什么手段，只要我掌握了国家政权，就是政治正确。反之，不管因为什么原因，只要是弄丢了国家政权，就是政治错误。这种观念正是从封建社会无数次政权交替的事实中总结出来的。欧洲封建社会政权交替中的阴谋诡计多不胜数。中国的“狸猫换太子”故事脍炙人口，是把它作为“忠君”的正面故事加以宣传。但曹操的“挟天子以令诸侯”，就多遭遇差评。不管怎么样，谁有权谁就有理，这是政权政治的基本特色。在此种风气的长期熏陶和培育之下，社会上多数人的心灵就失去了独立思考的习惯和能力。人们思维的盲目性，并不是完完全全地随大流，而

是遵循两条准则：一是圣旨即真理；二是官本位。一个道理，一句话，是对还是错？要看是谁说的。皇上说的，就是圣旨，就是真理。皇上说铅山不叫铅山，叫元山，那么铅笔的铅字就要读成“元”字的音。所以江西铅山县就读成“元（写作铅）山县”。

圣旨真理观的最新表现，就是“毛主席怎么说的我就怎么做”。这里所依据的就是“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勇敢的纪由先生，在他还在挨整的那个时代，就对此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和辛辣的讽刺。他说：“文革”中“兴无灭资”的口号震天响，过分地强调了斗争的绝对性，于是“狠斗私字一闪念”，……”（《阴阳初探》第114页）“阶级之间也不都是斗争关系，历史上许多主仆之间从感情到行为上都很融洽的例子并不少。”“人与人之间的敌对关系终将成为沉痛的历史教训。”（同上，第176至177页）他的勇敢追求真理，决不唯圣旨是从的精神，值得我们每个人学习。

皇帝也罢，主席也好，他不可能对全国大小事情都下达圣旨或指示，这就要依靠“官本位”来支撑整个政治运作体系。没有大大小小不同级别的官员，来帮助皇上或者主席，这个全国统一的政治系统就无法运作。只不过在新时代，政府官员有了一个新的称呼，叫“干部”。我们今天的干部和过去的官员，究竟有没有本质区别？这就要看他们是不是真正把“社会管理”当作政治。或者仅仅是“听上头的”，把“听上头的”和“管住下头的”叫做“干部以服从命令为天职”。如果干部素质都是如此，那就只好在将来生产一批机器人来当干部了。

持政权政治观念者，也有他们的“道理”：如果我不掌握政权，我拿什么来做好“管理众人之事”？所以，我并没有违反孙中山先生的政治定义！

但是，掌权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我可以搞官商勾结，为腐败创造条件？还是我一定要像焦裕禄一样为人民服务？这两种截然不同的政权观念，是新旧政治的分水岭。这样鲜明的对比，让我们更清楚地看到政权政治的原始性、落后性。

中共中央实际上提出了全新的政治观念，我们接下来再讨论。

第二节 发展观政治（民生政治）的现代性

国外的有识之士，也曾经提出“民生政治”概念，想用之代替政权政治。我国台湾地区，也有人接受这种观念。百度文库有赵丽江、马广博、刘三三人所写文章，提出“民生政治：当代中国最重要的意识形态”。文章大意是说“从政治学角度出发，意识形态本质上是一种改造社会的计划，是特定社会集团的理论体系及价值追求。民生，即民之生计，是民众的基本生存和生活状态，以及民众的发展机会、能力和权益保护状况。民生政治就是改善民生诸种价值的权威性分配。从民生主义到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是中国

人原创的意识形态，民生政治是当代中国最重要的意识形态，是对阶级斗争及专政的意识形态的救赎；目前，改善民生在中国已经成为最广泛的政治共识，构建以改善民生为核心的意识形态，是中国共产党持续执政的重要任务。我基本上同意他们的观点，更赞成他们所说的民生政治与发展观政治二者之间的关系。

国内外对民生政治的呼唤，至少说明两个问题：其一是传统的政权政治观念已经被公认是错误的：你有权不等于你有理；其二是民生是大事，是掌权者必须高度关注的事情。戏剧唱词“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虽然没有摆脱官本位的束缚，却已经说出了民生才是最重要的事情。

我们如果真的信任孙中山先生，就应该知道：孙中山先生早就主张民生政治。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杨天石教授的介绍，孙中山不仅期望国家富强，人民民主，而且期望民生幸福。孙中山高于他的同时代战友的地方就在于：他在领导人民进行一般的民主革命的同时，还创造性地提出“民生”问题，要求建立一个新社会，人民普遍享有“文明之福祉”，达到“家给人足，无一夫不获其所”的境界。从提出“驱逐鞑虏”，到提出“中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从提出“创立合众政府”，到提出国家政权应该“为一般平民所共有，非少数人所得而私也”；从提出“平均地权”，到提出“耕者有其田”，处处体现出：孙中山能随着时代发展，不断更新、发展自己的思想。（杨天石：为李菁著《天下为公：孙中山传》作序，2006年11月12日）

为什么说“民生政治高于政权政治”？

中国共产党已经提出了，要执行一个科学的发展观。它的针对性明显：发展不是硬道理，科学才是硬道理，违反科学的发展千万不能要！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什么？为什么要采用科学发展观？管它科学不科学，尽快解决民生问题难道不好吗？不行！因为人类的发展必须符合生态科学的要求，必须是今天的发展为了今后和下一代，甚至下几代人长久的、可持续发展。否则，只顾当前不顾长远，就违背了无产阶级的阶级本性。由此可见，科学发展观本质上也是为民生，而且是为了更长远的、全球范围内的民生。反过来也可以说：民生政治抓住了“发展观政治”的要害和关键，体现了发展观政治的本质。

发展观政治，是先进的思想家认识到政权政治的片面性、落后性以后，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为着全人类的将来而提出来的政治观念。一个社会采用什么样的发展观？这才是政治问题，是统帅国家和人民全部政治生活的本质问题，更是国家和社会运行的指导思想。

发展观政治，总结了近三百年来人类盲目发展的经验教训，认为大自然能提供给我们的物质、能源、干净水和空气，甚至土地资源，都是有限的。人类的

发展不能超越大自然的承载力，更不能占用我们的子孙后代所需要用到的资源和环境容量。现代化，必需接受环境和资源的约束，走可持续发展之路。

对比已经落后了的政权政治，发展观政治才是现代化的，应该有的政治；而民生政治是发展观政治的本质和核心。所以，就政治观的发展而论，民生政治就比政权政治提高了一个台阶。

说发展观政治是现代的，还包括另一层意思：只要是现代化国家，都应该执行这样一种政治观念。美国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科学技术和军事装备方面可能很先进，但是在政治观念上却长期停留在“政权政治”层面，本质上奉行“资本政治”，不愿意有丝毫进步。前述斯诺登的故事，已经生动地说明了美国在政治上的落后性。科学技术上先进，而政治观念却十分落后，在这样的国度里，社会矛盾将会进一步深化和发展、加剧。它们哪里正在孕育着新的政治冲突。

第三节 人类生态系统与生态政治的前瞻性

中国共产党所提出的五位一体发展战略，实际上推出了比发展观政治更高一个层级的“生态政治”。根据当前国内国际的实际情况，我们只能说：生态政治具有高度的先进性和前瞻性，是我们需要为之努力奋斗的长远目标。既然如此，为什么还要特别提出来呢？因为发展观政治的判别标准和核心内涵，就是生态文明建设，违背生态文明建设的要求，你的发展观不可能正确。这正如没有革命的红色政权，就不可能真正执行科学发展观一样。所以说，政治观念的这三个层级虽然有高低之别，却是一脉相承，不可分割的统一整体。

以下叙述根据“人民网”的说明。“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是党的十八大正式确定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包含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这五个建设都有了，我们才可以说是全面的。十九大修改党章，明确把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写了进去。第一，**经济建设**。什么时候都必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妨碍我们强调其他方面的发展。第二，**政治建设**。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我们的奋斗目标。这个方面做好了，就能够保证人民依法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巩固和发展生动活泼、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第三，**文化建设**。社会上的每个人都受一定的文化观念影响。一定要以推动社会进步的文化为主导。第四，**社会建设**。包括民生问题，比如得了病有地方看，有基本的社会保障。还关系到社会组织、管理、建设这些方面的内容。第五，**生态文明建设**。老百姓环保的观念和意识越来越强，因为这件事跟我们每个人息息相关。这五大建设哪一个方面的建设都非常重要，哪一个方面也都离不开。“人民网”的这些

说明，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这五者构成统一整体，不可分割开来进行考察。换言之，它们实际上构成一个“大系统”，以上五者就是五个子系统。所以必须用系统论的观点来考察和处理它们的彼此关系。五者间的任何关系都一样。把民主作为政治的主题，不是以阶级斗争为主题，就已经很不容易了。要让大家都认识到“生态文明”在五大文明建设中的统帅地位，实在是太难！所以我们不能苛求网络主持人。

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实际上有两个认识问题需要认真讨论和改变：

其一，生态文明涵盖的范围问题，如果认为生态文明建设就是搞好环境卫生，保护野生动物，抓紧城市乡村绿化美化等等，那就太狭窄了。对于落实生态文明的要求，实际上是全面的。可以说，我们所应该追求的是：生态经济、生态文化、生态政治、生态社会等等，因为它们构成统一的大系统。如果承认这个道理，生态文明建设其实居于领导地位，也就是过去我们常说的：以什么为“纲”的问题，一定要以生态文明建设为纲。例如，我们的政治建设，如果不符合生态政治的要求，民主就将被看成是一种掌权者的恩施，也就没有真正的社会主义民主。生态经济是学术界早就提出来的概念，生态文化也是如此。在观念上最落后的是生态社会建设。在生态文明居领导地位的前提下，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就会向着全面现代化发展，这样就构成一个“生态系统”——必须用系统理论全面地引导这一切发展。前面已经讨论了：系统论是当代的、可实际操作的辩证法。

其二，生态政治是政治概念的最高等级，生态文明建设是科学发展观的核心，用生态文明建设的观点来认识和处理政治问题，在国内还是有待于宣传和落实的问题，在世界上通行“资本政治”原则的国家和地区，更是有待于将来才能实行的问题。所以，它虽然具有前瞻性和科学性，而现实的社会实际，离开落实生态政治还很遥远，还需要我们为之付出长期而艰苦的努力。

中国是公开宣布以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思想的国家，而且我们所宣传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本质上就是要在全球实现生态文明，其中当然包括生态政治文明。所以，其高度的前瞻性不是我们放弃努力的理由，恰恰是我们从现在起就要加倍努力的原因。没有生态政治，就不会有我们终生为之奋斗的共产主义理想。或者说，生态政治是通往共产主义的必由之路，因为共产主义的本质就是世界大同，就是全球一盘棋，**只有把全球看成巨大而统一的生态系统，才能做到“世界大同”，即实现共产主义。**

所以，不是我们要把生态文明政治化，而是只有生态政治才与共产主义理想和信念相一致。生态政

治的本质，要通过系统政治的形式表现出来；如果从思想方法角度看问题，也可以反过来说：系统政治思维，是生态政治所必然要求的思维方式。违反系统思维，我们就没有办法实现生态政治。

接下来再看“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仍然是取自“人民网”的叙述。

第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是我们的奋斗目标。八十年代初提出“建设小康社会”，党的十六大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党的十八大提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时间就是 2020 年，已经宣布完成了。今天讲的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不是吃饱喝足略有节余，具体要求比过去高了很多。我们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新发展理念，就是为了建成这样的小康社会。

第二，全面深化改革。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三中全会上就《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讨论稿）》做说明的时候说得很明确，为什么要全面深化改革？“前进道路上还有不少困难和问题”。我记得他讲了十几个问题，每一个问题都是深层次的，每一个问题不通过深化改革都没办法解决。比如说公车制度的改革，这影响多少人的利益呢？再比如国企的高管降薪、限薪、取消职务消费，又影响多少人的利益呢？还有军队改革，军队的编制等等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这些改革多不容易，改革是利益调整，给谁增加利益谁都欢迎，但是减少谁的利益，谁的内心能愿意吗？都不愿意。总书记深知改革之难，所以他讲“好吃的肉都吃掉了，剩下的都是硬骨头”，但是骨头再硬也得啃。为了国家民族长远利益考虑，这些事我们必须去做。怎么改？他强调要让人民群众有更多的获得感。过去五年出台了 1500 多项改革，都会程度不同地给我们带来获得感。

第三，全面依法治国。法治非常重要，从确定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以来，我们取得了巨大成绩，但是也还存在着不少问题。比如说存在司法不公平，司法腐败的现象。所以，十八届三中全会出台了很多司法改革的举措，四中全会专门研究全面依法治国。这几年在这些方面的进程推进得很多、力度很大，中国的法治状况有了明显的改观，大家越来越对法治充满信心。

第四，全面从严治党。虽然“四个全面”里，全面从严治党排在第四位，但它是根本保证。习近平总书记讲过“打铁还需自身硬”，十九大改了两个字“打铁必须自身硬”。党的建设如果搞不好，党的领导如果不坚强有力，前“三个全面”怎么能建得好？怎么能建得成呢？一定是无从谈起。所以过去这五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特别重视全面从严治党。全面从严治党取得的成就每个同志都感同身受。

十九大修订的党章，明确把“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 and “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写进去，一定会使我们

党更加重视统筹推进“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更加重视协调推进“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把我们这个党建设得更好，把我们这个国家发展得更好，使我们的人民群众生活水平越来越高，推动我们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我基本上同意“人民网”的上述论述，但是总感到有某些不足。例如，对于当前这么严重的贪污腐败问题，没有深入地分析其原因，和提出针对性很强的策略打算。再比如所谓“获得感”，为什么不是作为公民应该本来就有的呢？为什么不把建议权、讨论权、决策权都全部交还给人民群众呢？总觉得对于问题还需要深入研究，分析改革的困难和方法，其内容将在第八、九两章展开。

第四节 在全球确立生态政治的领导地位，是系统政治的终极目标

系统政治是手段，生态政治是目的，就一定要把地球上的人类，看成一个统一的大系统进行操作。我们大家都要成为世界公民。现在的年轻人，是不是对于家庭有责任感？真的很难说。溺爱孩子的父母，培养出对社会毫无责任心的后代。如果一个人对于自己国家都没有责任心，而要求他（她）胸怀国际主义大目标，岂不是白日做梦？而在全球确立生态政治的领导地位，是系统政治的终极目标。

用发展观政治取代政权政治是现在就必须做好的事情。而让发展观政治提升到生态政治层级，则是将来的发展目标。但必须做到：把生态问题当作政治问题来对待，即用生态系统的观点处理社会、经济、文化、民生和党的建设问题，还需要我们从现在就开始，进行长期、艰苦的努力奋斗。不客气地说：我们只关注自然生态建设，完全忽视社会生态建设，是目前我国党、政、军、企、事单位领导班子成员中，“涌现”出大量敢于和善于“让自己先富起来，不顾别人死活”的贪污腐败分子的根本原因。

五位一体建设和四个全面推进，属于系统性的工作步骤。用系统论观点看问题，包括横向的空间联系和纵向的时间联系两个方面。系统地、联系起来看问题，就是反对单打一地对待问题。例如，发生很严重的塌方式腐败，以为加强法制，狠狠打击贪污腐败分子就可以了，事情决不会这么简单！连法院领导、银行官员，甚至军队高官都成批地腐败，这一定是**我们的政治体制存在着严重问题，需要彻底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决不是修修补补就能解决得了的问题。

在系统理论深入全面地指导下，用生态政治的要求，进行彻底的政治体制改革，还需要在后面各章节逐步展开讨论，但思想认识方面必须先行。在“以阶级斗争为纲”思想指引下，我们对资产阶级法制观念不屑一顾，中国没有经过资本主义发展的洗礼，短短三年半的“社会主义改造”，一口气就跳过了“卡夫丁

峡谷”，从新民主主义社会进入社会主义社会。批判以朱德、陈云为代表的所谓“小脚女人”、“右倾机会主义”，迫使原计划十五年完成的社会主义革命，三年半就完成，结果带来了诸多后遗症。缺少真正的资本主义生活，使我们对资产阶级缺乏全面的认识 and 了解。好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毛泽东同志还是对中国资产阶级进行了“一分为二”：民族资产阶级和工人、农民一样，是革命的依靠力量；勾结反动地主政权和外国帝国主义的官僚资产阶级，才是革命的敌人。但是在实际工作中，常常会把民族资本家看成“不是自己人”，对他们的意见和要求很不重视。网传，我们党对宋庆龄女士的正确意见就很不重视，是真是假，只好存疑，因为无法进行调查。但是对于早期资产阶级革命时代的理论家、思想家，不屑一顾，极不重视，认为他们无法跟马克思主义相比，则是事实。这让我们多走不少弯路。

孟德斯鸠是法国杰出的思想家、社会学家，18世纪启蒙运动的主要代表之一，资产阶级国家和法理论的奠基者。他对旧的封建社会深恶痛绝，提出“十恶论”：1 没有人性的政治、2 没有思想的崇拜、3 没有人文的科学、4 没有道德的商业、5 没有良知的知识、6 没有真实的历史、7 没有独立的精神、8 没有自由和幸福、9 没有劳动的富裕、10 没有制约的权力。

我们用他的“十恶论”，对照一下中国的历史和现实，是多么地切中要害啊！我们讨论的政权政治表现出残酷迫害革命同志的本质，不就是“没有人性的政治”吗？第四条没有道德的商业，第九条没有劳动的富裕，第十条没有制约的权力，不都是对中国现实严重贪污腐败问题的真实写照吗？没有思想的崇拜，实际上很严重。不真实的历史也有，为尊者讳，我们相信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明明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历史是人民群众创造的，我们却非要说是某位天才人物创造的，而且还振振有词，这就值得检讨了。用系统理论统帅政治体制改革，就需要全面地根除以上“十恶”，至少要有根本性的改观。

国内如此，在国际上困难更大。现在的世界，还是以资本政治为其本质的政权政治占居统治地位。二十年代初期的国际战争，使我们感叹：生活在强大的中国是多么地幸福啊！2024年春节成为国际节日的时候，当我们在欢呼庆祝的时候，俄乌前线和中东地区的人民和军队却在战火中煎熬。联合国人权高专办主任福尔克尔·蒂尔克表示，有报道称，在东南部贾兹拉州的针对种族的袭击中，数十人被残忍杀害，还有报道称首都喀土穆的控制权争夺战即将爆发，苏丹的冲突对平民来说正变得越来越危险。国际组织指责准军事快速支援部队在苏丹达尔富尔地区实施种族灭绝，该部队指挥官穆罕默

德·赫梅蒂·达加洛承认遭遇挫折，但誓言要加紧战斗以收复失地。（据美国马斯兰出版社网站报道）

我承认共产党员应该是世界公民，所以我的内心真的很难受！诗云：**俄乌硝烟紧， 中东战火摧； 资本握世界， 灾民尸骨堆； 世界不太平， 我为人类悲； 何日停战火， 全球共光辉？**

系统政治既然是生态政治的思维方式，它的确立就不是那么轻而易举的事情，必须要有长期打算，也许需要我们共产党人一代接着一代的不懈努力。在全球绝大多数国家和人民，都接受系统思维的情况下，才有可能把生态政治变成全球共识。所以它是系统政治需要努力实现的终极目标。

第四章 系统政治的历史渊源

虽然本人在本世纪二十年代初才提出系统政治，但它早已经是人类经典文化的实际内涵，这就像系统论的基本思想源远流长一样。因为人类对系统政治思想的认识，来源于一部经典教材——光辉永驻的《孙子兵法》（见本书第二章第二节论述）。1953年，美国政治学家戴维·伊斯顿创立政治系统论，其代表著作是《政治系统》。本世纪初，中国的毕思文，在人民出版社出版了《系统政治学》。闵家胤先生的《黑格尔心目中的中国》一文，对于中国古代历史有较深刻的认识，虽是借黑格尔之口，也表达了他自己的观点。我的论述将要引用他文章中描述的一些事实和观点，不同意其观点处，会在行文中说明。中国的封建社会到底是什么时候结束的？闵先生认为是秦始皇结束了中国的封建社会！这种说法已经相当流行，他认为秦统一中国，是皇权专制政体，不算封建社会。

判定人类社会的性质，根据什么？应根据从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的全部内容，并不是只根据上层建筑当中的政治管理体制这一项因素。小农经济是旧中国全部社会的经济基础，手工业、商业只是其必要补充。上层建筑就是由代表地主阶级最高统治者的皇帝来主宰全部政治活动。无论是分封制还是郡县制，都是天子地位高于一切，分封制下面的王爷或者公、侯、伯、子、男，在其封地范围内有自主权，但以天子所恩赐的范围为限。对于不听话者，天子有权随时褫夺其封号。专制条件下的官吏则完全是皇帝的奴才，自己没有自主权。但是，实际上秦代以后各个朝代的天子，封赏立功者、恩施皇族后裔之事，多有发生。刘备被人称为刘皇叔，是因为其祖上被封为中山靖王，是汉高祖刘邦的直系。一直到太平天国，天王洪秀全封石达开为翼王，让他领兵大战鄱阳湖。太平天国的所谓杨、韦之乱，就是东王杨秀清，与北王韦昌辉打起来了。所以说，秦以前和以后，就是封建社会两种不同的管理模式，决不是两种根本不同的社会制度。

为什么会是这样？因为人类社会就是大系统。违背系统理论就管理不好社会，只是封建统治者都

不自觉。所以系统政治不是现代才有，而是古已如此，人们不认识而已。同样，古代就有辩证法，区别仅仅在于认识不认识，自觉不自觉。

闵家胤先生读的是黑格尔的《历史哲学》中文译本，即王造时译，三联书店1957年版。在这本书中，黑格尔有22页是写中国的，闵先生说黑格尔“讲得非常在行，内容相当丰富”。他动情地说：“周有光先生与夫人张允和周游世界后，悟出一则睿智的名言：‘要从世界来看国家，不要从国家来看世界。’我想，换一个方式，也可以这样说：中国人不仅要心怀祖国放眼世界，还要心怀世界回望祖国；做到系统哲学透视论提倡的换位思考，从不同视角看中国，整合起来才有可能得到一张客观公允的中国真相图景。”闵家胤先生所说的“系统哲学透视论”，就是说中国和世界共同处在人类大系统当中，我们必须采用系统论所主张的思想方法来看世界。

黑格尔说“中国很早就已经进展到了它今日的情状；但是因为它客观的存在和主观运动之间仍然缺少一种对峙，所以无从发生任何变化，一种终古如此的固定的东西代替了一种真正的历史的东西。中国可以说还在世界历史的局外，而且是预期着、等待着若干因素的结合，然后才能够得到活泼生动的进步。”“它的统治并不是个人的识见，而是君主的专制政体。”（161页）

我们看一下闵先生的按语：

“这是讲，从秦朝到清朝，中国是皇权专制政体，这种政体成功地将中国人的精神创造力即社会-文化遗传基因（SC-DNA）的变异-创新能力抑制住了，中国人就不可能用主观的精神改变客观的社会存在；所以两千年中国社会只是内卷化（involution），做简单循环；无从进化（evolution），不可能做革故鼎新的上升循环。唯一的希望是等待外来精神-文化的冲击。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是，中国人一直认为自己是世界的中心，故自称‘中国’；相反，在十八世纪的欧洲人看来，中国是地处远东的真正的‘边国’，一直在‘在世界历史的局外’。黑格尔这句话说得很重，可也说得准，足可以打消国人盲目自高自大的顽固情结。所以建议读者记住。”

我们感谢闵先生的上述提醒。专制的皇权体制，确实严重压制了中国人的创造力。中国最富有创造力的时代，是春秋战国百家争鸣的时代。《孙子兵法》就是那个时代的产物。以下还要引用闵先生的一些论述，因为我很赞成他这些主要的意见。

第一节 系统政治的经济社会基础

闵先生说：“科学跟信仰是死对头，自然科学是在跟宗教信仰做斗争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宗教的精神是固守信仰，灌输迷信，蒙蔽世人，迫害异端，追求自己的教条亘古不变；相反，科学的精神是怀疑、批判、否定和创新，追求活理论日新月异。”

我们回想古代传说中的原始人群，他们是不是在生态文明的前提下，过着群居的系统化的生活呢？这毫无疑问。因为原始人类就是高等动物之一种，他们脱离猿群的唯一标志是采摘果实后的储存、保鲜和合伙利用石块、木棍与野兽作斗争。后来发展到简单地农业、渔业和狩猎，再进化到养殖。用手工制造生产工具，他们对大自然的改造十分轻微。他们自己并不懂得自己和大自然构成统一系统的道理，但实际上对大自然却十分尊敬、热爱和崇拜。所以，原始人群基本上遵守着生态文明的规则。

中国在传说中的夏朝建立国家，到殷商成为奴隶制社会，封建革命发生得比较早，也就是武王伐纣。是不是周朝建立以后，中国就停止发展了呢？决不是这样，由于周天子对下面各个诸侯国控制比较宽松，社会经济发展比较快。周王朝从公元前 1046 年到前 256 年共经历 790 年，习惯上称为周朝八百年基业。以平王东迁为划界标准，早期称西周，至公元前 771 年为止。晚期称东周，共 524 年，又分春秋战国两个时期。周天子一共封了 71 个诸侯国家，到后来互相兼并，战国时就剩下七国争雄。我们在前面讲到《孙子兵法》是系统政治的经典教材，就是产生在战国时期的吴国。这说明什么呢？说明矛盾斗争，在破坏社会正常秩序产生负面效应的同时，也会逼迫你改变常规思维发现客观事物的规律，勇敢追求真理。相反，在四平八稳的生活状态下，人们很难有突破常规的发明创造。所以说，辩证法就隐藏在客观事物的演变过程当中，就看你能不能发现它，抓住它。我们今天之所以还要弘扬中华传统文化，决不是要“复古”，而是传统文化中确实确实充满辩证法的基本精神。例如，前面多次引用的阴阳理论，就是辩证法的古典形式。

但是，古人的迷信思想也确实比较严重。例如，出兵作战之前，兴建大规模农田水利工程之前，都要举行一定的敬神或者祭天仪式等等。被雷劈死之人，因为电击压力常常形成跪姿，古人就以为死者生前一定干了什么坏事，向上天请罪呢。此等事情多了，就形成一种思维的盲目性，很容易为宗教信徒所迷惑。这就进入前面提到的閔先生所批评的那种状态。中国长期封建社会形成的迷信传统，与近代西方科学从萌芽到成长的发展过程相比，确实显得太落后了。

我国从秦朝到清朝，主要经历汉唐宋元明清几个大一统朝代，但是中间也出现过“三国”、“五代十国”等分裂时期，史学家常说：“话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对于技术、科学、文化、经济的发展，究竟是分裂好还是统一好？决不能一概而论。例如欧洲各国，在相互竞争中促进了技术和科学的发展，近现代科学出现在欧洲，就与竞争态势有关。閔先生说：“从明朝中期算起，到二十世纪初‘五四运

动’，花了 500 年时间，科学技术——赛先生总算学进来了。盲目追随苏联的计划经济，走了 30 年弯路吃了大亏，市场经济总算学进来了。民主政治——德先生学 100 多年了，至今尚在门外，不知还要过多少年才能够学进来。”对此，笔者深有同感。没有竞争，感觉不到落后的危机，就缺少学习先进的动力。但是，像欧洲这样长期分裂到底是好还是不好？这就需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了。我们设想一下：假如欧洲是个统一大国，它还能听任美国资本财团的摆布，与俄罗斯死磕到底吗？拿破仑、希特勒进犯俄罗斯招致失败，是因为他们自己野心膨胀，他们发动的战争完全是非正义的。如果不是想欧洲统一的话，现在还搞“欧盟”干什么呢？统一的好处显而易见。因为统一，你的社会管理就不得不考虑整个大系统的要求。当然，这并不具哲学理论色彩。比如在高度统一的大国，皇帝陛下要有出息，就必须考虑全国范围统一调配资源，发展经济，培养人才等等。中国修建的南北大运河、东西南北畅通的道路，不是大一统国家，是根本不可能去思考的事情。科举取士，也是全国大一统才有的搜罗人才手段。全国是一个统一大系统，就必须统筹兼顾，从整体方面，从相互关系方面去思考治国理政问题。一个优秀的皇帝，必是系统思考和处理问题的高手。孤立地、静止地、片面看问题的形而上学者，在大国领导人面前是吃不开的。李白不仅仅是诗人，他在治国理政方面可能也有一手，传说他救了郭子仪，是真是假不知道，但是如果他对“政事儿”无知，皇上留他在身边干什么呢？

今天，由于科学技术的发展，这个地球好像变小了。世界各国的事情相互影响，谁也无法将自己置身事外。例如，一个小小的芯片，居然引起中美两国激烈的竞争。华为公司，成为以爱国闻名于世的中国私人企业。华为的骨头是最硬的，成为全国人民学习的榜样。这在过去无法想象。閔先生说：“拿破仑曾经说过一句名言：‘中国就是一只沉睡的雄狮，一旦醒来就会震惊世界，我希望它永远沉睡下去。’这话之后，200 年过去了。现在的中国，已经苏醒一半了，震惊之余，旧世界正竭力对它遏制和围堵；待另一半也苏醒过来，旧世界就只能在这头东方雄狮面前发抖，任何遏制和围堵就都不起作用了。”“中国已经苏醒的一半，就是物质的一半或物质生产的一半；还没有苏醒的一半，就是精神的一半或精神生产的一半。本人创立文化哲学的宗旨就是要讲明，自由和发展是一对孪生兄弟：发展需要自由，有自由就有发展，没有自由就没有发展；哪个领域有自由，哪个领域就发展，哪个领域没有自由那个领域就无法发展。”我忠心支持閔先生争取思想自由、文化自由的努力，正如他所说：“人区别于动物的最大特点就是运用符号语言进行精神生产。第一层级的人权是生存权，第二层级是发展权，第三层级是表达权。精神生产的成果

要自由地表达出来。一旦这一层级的人权达到了，中国就完全苏醒了，中国人就真正作为人站起来了，中国人被压制两千多年的潜力就会全部迸发出来。”我觉得目前**最重要的自由，是对过去的历史进行讨论和批评的自由**。华为公司要求员工：公司如果有错误，就一定要对公司进行批评。一个敢于和善于进行自我批评的民族，必将无敌于天下。如果动不动就给人扣上“恶毒攻击”的帽子，那就是不允许对过去进行讨论，中国人还怎么接受历史教训，追求更快进步呢？还要补充一点：自由是创新的前提，没有自由就不可能创新！不创新人类社会还怎么发展哪？

当然，思想解放首先是对上层的要求，因为中国的“官本位”制度和“圣旨即真理”思维模式，一时之间还很难突破。这决不是说普通公民没有救国责任，不要尽救国之义务，而是说明问题的难点和重点。闵先生我们都是普通百姓，没有任何特殊“背景”。统一大国，是系统政治的经济、社会基础。闵先生又说：“作为当代中国人，与其扼腕叹息，不如积极推动政治体制改革和科学体制改革。不改革，就继续是死路一条，中国人的聪明才智会继续会是全都白瞎了。”呼吁政治改革，我们在前面已经说过了。关于清王朝的保守和愚昧到了何等地步，闵先生讲了两个笑话：慈禧说蒸汽机车火车头里面有妖精，于是1881年中国有马拉火车的滑稽景象；为了不让洋人刚刚发明的一个螺旋桨小飞机入川，1920年四川军阀刘湘发奇想，要在三峡巫山顶上架大炮把小飞机打下来。可见当时的中国上层有多么愚昧和颟顸！今天中国的领导层，恐怕要比我们广大人民群众“见多识广”得多，根本不可与清朝当权者同日而语！既然如此，他们应该主动带领我们大家进行政治改革才对呀！**为什么“经改”多多，甚至敢于“摸着石头过河”；而“政改”却几十年来“纹丝不动”呢？**恐怕“利益”二字才是问题的答案。改革就必须触动利益分配机制，这就需要当事者有敢于得罪人的雄心壮志和超凡胆略。

第二节 系统政治的文化基因

文化是思维方式更深层次的基因。中国传统文化是复杂而多元的，最基本的内容起源于春秋战国时期，所谓“百家争鸣”就是文化派别的大爆发。秦始皇的《焚书坑儒》是烧了些书，但不可能把读书人杀光，更不可能夺去知识分子头脑中的东西，所以几个主要学术学派还是保留了下来。最近考古发现：所谓秦始皇焚书坑儒，可能是后人造谣。如果此事为真，除了给秦嬴政先生平反，各个不同学派能流传下来就更好理解了。

学术界现在比较统一的是认为：道家学说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精华和鼻祖。“文化大革命”是犯了很多错误，甚至是罪行，而在对儒家学说进行批判方面，主流还是对的。但是，杨荣国先生关于“儒法斗争”的

思想和著作，被当作是“评法批儒”教材从中央发下来，要求向全民进行宣传和学习，实在是太荒唐了！当时我作为省局一级宣传部门的“理论教员”，不得不讲课。讲了杨荣国的鬼东西就觉得自己在放毒。这怎么办呢？我就在讲课的最后，加了几千字的内容，专门讲讲“法家的欺骗性”——感谢听我讲课的九零九地质大队的同志们，他们当中没有任何人向“上面”检举我，大队宣传科黄科长还为我担心了好长时间。其实，“儒表法里”也好，“儒法斗争”也罢，它们不过是封建统治的两手策略而已，本质上并无区别：儒家重在“心治”，让你觉得忠君才是正道；法家重在“法治”，让你觉得统治阶级还是讲究法律的，并不是贪官当道。易中天对法家有比较好的看法，但谁也改变不了法家为封建统治服务的本质。

江西南昌的黎鸣先生，一直对儒家进行批驳，对道家十分推崇，在国内学术界有一定影响。现在中国民间学者多数跟黎鸣先生观点比较一致，这是为什么呢？只要看看老子《道德经》的主要内容，就明白了。

《道德经》共八十一章，内容极为丰富，可以说充满辩证法。笔者老则老矣，也不敢说对老子如何参悟得透，毕竟那是古汉语，跟今天的白话文差别太大。就选择一部分我认为容易理解的说说吧。

第二章“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已；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已。故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较，高下相倾，音声相和，前后相随。是以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万物作焉而不辞，生而不有，为而不恃，功成而弗居。夫唯弗居，是以不去。”天下人都知道美好之事所以美好，但自己却不作美好之事（恶己）。知道什么是“善”，自己却不做善事。后面的话很直白：“故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较，高下相倾，音声相和，前后相随。”却是辩证法的经典语录。世界上相反的事物总是“相成”的，有与无，长与短，高与下，……表面看来是相反的事物，互相成全。前述纪由先生的《阴阳理论》说的正是如此。

第八章“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居善地，心善渊，与善仁，言善信，正善治，事善能，动善时。夫唯不争，故无尤。”

老子劝人信善、为善，用水利万物来比喻“不争”，说明与人为善是最重要的品格。

第九章，“金玉满堂，莫之能守。富贵而骄，自遗其咎。功成身退，天之道。”如果你金玉满堂，不一定能守得住；因为富贵而产生骄傲，就是自己给自己找麻烦。所以说，应当“功成身退”，不要去争功。

第十六章，“夫物芸芸，各复归其根。归根曰静，是谓复命。复命曰常，知常曰明，不知常，妄作，凶。”天下事物都有根源，回到根源是“命”，是常态。知道常态是什么样子，就叫“明白”；不知道常态什么样子，无知而操作，很危险。我的理解不一定准确，

但由此可见，老子的辩证法讲得很细致，在古代一定是“通俗易懂”。我们仅仅因为对古汉语的生疏，才觉得理解起来有些困难。

第三十一章，“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恬淡为上，胜而不美。”、“杀人之众，以哀悲泣之，战胜，以丧礼处之。”

“兵者凶器也”是古代圣贤的共识，所以能不用战争解决的问题，尽量不要诉诸武力。中国人民热爱和平，从老子哪儿就受到了教育。

第三十三章，“知人者智，自知者明。胜人者有力，自胜者强。知足者富，强行者有志，不失其所者久，死而不亡者寿。”知别人是聪明，知自己是明白。死而不亡，我理解就是虽然人已经去世了，人们还长久地怀念着这个人，就跟他还活着一样。

第四十二章，“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是后人引用最多的内容。后人的“一分为二”、“一分为三”，以及阴阳互根理论，都与此有一定关联。“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治大国若烹小鲜。”这些充满辩证法的智慧之语，都是道德经里的名言。我想，可以不必再引述《道德经》了，还是说说老子以后的事情吧！

老子以后，对中华传统文化影响最大的就是孔子，即儒家。其接班人还有荀子、孟子。然后还有墨家、法家等等。儒家影响巨大，是因为后世各朝各代都有“孔老二”的代理人，例如所谓程朱理学，实际上也是儒学的发展或者分支，等等。1919年的“五四运动”，就是从反儒开始，鲁迅先生对儒家的批判比较深刻。

黎鸣先生彻底否定儒家，是今天的代表。但是，我们需要思考一下：在我们看来是如此十恶不赦的儒家，为什么会受到历代封建统治者的青睐呢？更难以理解的是：我们在国外办的中国文化传播机构，为什么都叫“孔子学院”呢？叫个“革命”一点的名字难道不好吗？静下心来思考这样一些问题，我们也许会有不同的想法。

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究竟有什么办法能把历代统治者都“迷惑”住了，让皇帝老爷都对他佩服得五体投地，敕封之为“大成至圣先师”；让自己的子子孙孙，即将来有可能当皇帝和王爷的人，都对他顶礼膜拜呢？孔丘自己可是从来没当过皇帝呀！这是为什么呢？

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为中国历代封建统治者制订好了一套完善的“统治经”，只要学会了这一套，并努力实践，巩固自己王朝的统治地位就没有问题！所以，儒家才会获得如此高的社会地位！例如：“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说君臣关系要像父子关系一样融洽。如果帝王能做到这一步，还愁政权不稳吗？所以，生活在两千五百多年前的孔丘，就受到中国历代封建统治者的不断吹捧，一再加封。

现在互联网上说：“完整的儒家思想体系，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影响深远。它是中国影响最大的流派，也是中国古代的主流意识。”“它是孔子社会政治、伦理道德的最高理想和标准，对后世影响亦甚深远。”这种评价和口气，如果是出现在“文革”时期，作者一定会遭到革命造反派的猛烈批判，愤怒声讨。弄得不好，作者还可能被造反派抓起来，当作“牛鬼蛇神”进行游街批斗。

孔子学说可以用“仁义礼智信”五个字概括。仁，指“仁爱”；义，原指“宜”，即应该做的事，所以说“义所宜”也；礼，属政治与伦理范畴，中国封建社会的道德规范和生活准则。智：同“知”，指知道、了解、见解、知识、聪明、智慧等，属认识论和伦理学的基本范畴。信：指诚实，言行一致。“仁义礼智信”是处理社会关系的准则。

忠，本来是讲与人交往要忠诚老实，后来发展到对皇帝，对主管官员要忠心不二，成为培养下级奴才思想的要求。孝悌就是处理家庭关系的原则。孔子认为：孝悌是仁的基础，孝不限于对父母的赡养，更应着重于对父母和长辈的尊重。悌：指弟弟、妹妹对于兄长要怀敬爱之情。古人常说“长兄如父”，“长嫂如母”就是“悌”的意思。

如果把忠、孝、悌都算作“仁”的内容，那么说起来儒学的“真经”，还就是最前面的五个字。我对儒学的概括就是：**用家庭关系演绎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要求全国的被统治者，都心甘情愿地被统治，本质上是主张阶级合作。**

但是，值得注意的是：阶级合作理论并不违背系统论。甚至可以说，阶级合作论完全符合系统论中“协同论”的要求。

儒学还应该包括“五敬”：即对“天、地、君、亲、师”要尊敬。敬天地，说明人们的科学意识不强，一切停留在听天由命的阶段，这很好理解。但这就是原始的对自然规律的尊重，与生态平衡的观念反而十分融洽。这实际上要求人们对皇帝要像对天地一样尊敬，然后是对父母亲和老师要敬。那个时候“师道尊严”到了“一日为师，终身为父”的程度。甚至搞得太过分：学生不听话，老师可以用戒尺打学生的手手心。打的这个疼，连笔都拿不住了。现在的年轻人没有这个体验。所以“文革”初始，反对“师道尊严”，学生们是挺支持的。

介绍了儒家的基本思想，有一个很严肃的问题就提出来了：现在既然说了儒家学说这么多的好话，甚至把在国外的汉语学校都叫做“孔子学院”，我们又要“不忘初心”，那么请问：当年“五四运动”、“砸烂孔家店”是对的还是错了？反儒反孔是“五四运动”的基本格调，两年以后就成立了中国共产党，引进“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说明党的宗旨是反儒的，我们将怎样自圆其说？

“五四”运动到二零二四年是 105 周年。从社会情况说，这一百多年来，国际国内的环境都发生了巨大变化。从儒家学说本身来分析，它既有进步的一面，也有反动的一面，既包含“歪理邪说”，也有“处世真经”，全盘否定儒学和全盘肯定儒学，从思想方法上说都是错误的，必须辩证地对儒学进行具体分析！

在这里不可能全面地评价儒学，因为我们讨论的主题不是这个。但儒学对政治的影响必须说清楚。

儒学的本质，是用家庭关系演绎社会关系。在一个家庭中，父亲是家长。在家庭关系上一定要实行家长制——“家有百口，主事一人”——男性辈份最高的那个人。一般说，爷爷头脑清醒，就是爷爷说了算；如果爷爷头脑不清楚，就由爸爸说了算。“重男轻女”，古代观念即是如此。整个封建社会，就是把一套治理家庭的规则，完全复制准确无误地应用于封建朝廷。皇帝就是全国总家长，国家大事都由皇帝个人说了算。皇帝一个人当然忙不过来，就组织了一个由宰相领导的执政班子，给皇帝出出点子，或者替皇帝分忧，办具体事儿。中国几千年封建社会都是如此，直到 1911 年辛亥革命，中华民国成立。

我们常说：有国才有家，国家、国家，说明国和家高度统一。所以儒家对爱国如爱家的要求，本质上没有错。古人说“君不正臣投国外，父不慈子走他乡”是什么意思？就是说，家长是人，皇帝也是人，人是会变的，万一那天家长或者皇帝变坏了怎么办？古人的办法就是你离家出走算了！

可是我们认真想一想：皇帝变坏了，我们都离家出走就算了。那坏皇帝不是一直得坏下去呀？这个国家不就彻底完蛋了嘛？

所以说儒学最大的错误：就是无论出现多么糟糕的情况，被压迫受剥削的劳动人民群众，都不允许起来造反！古人认为，皇帝有再大的罪恶也不能被处死。这一点跟西方截然不同，西方观念认为：犯有死罪的国王可以处以绞刑。

所以，我们在上世纪初学习苏联，要求唤起工农大众起来革命的时候，不能不引进马克思主义，不得不狠狠批判儒学这个妨碍革命的封建主义卫道学说。1919 年“五四运动”中如果不反儒，革命不可能深入发展，更不可能建立人民军队。所以毛主席用“造反有理”来概括马克思主义，是抓住了问题的要害，而不是把马克思主义简单化。只有在深入学习马克思主义之后，我们才懂得：马克思主义决不是“造反有理”那么简单，唯物史观才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

第三节 系统政治与政治的阶级属性

前面我们在讨论政权政治的时候说过：现在的政权政治，在西方阵营本质上都是资本政治，连资本家本人也成为资本的奴隶。系统政治也存在类似情况：一个国家的政治体制在总体上属于系统政治，并不等于它对待整个社会的全部成员，都能按照系统

论的要求对待之。换言之：**系统政治不等于全面正确的政治。**

中国长期的封建统治时期，其政治形态的主要方面，符合系统政治的要求。中国在秦代以后，凡成功的政治家，都对《孙子兵法》学习和运用得比较好；凡失败者，都是违背了《孙子兵法》的基本要求。经过正反两方面的对比，人们才看清楚了孙武这本著作的实际价值。它也才能走向世界，成为世界各大军事院校的必读教材。不过，仅仅把它当成军事教材是远远不够的，军事是政治的集中体现，谁如果不是好的政治家，也不可能成为有出息的军事家。

但是，孙子曰“**道者，令民与上同意也**”，世界上并没有几个政治家能做到这一点。后来，也只有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才把“民心”看成是“天下”的根本。所谓“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是马克思主义革命家对于政治得失所作的科学总结。为什么是这样？因为政治，除了它的表现形态，还有它的阶级属性问题。

现代资本主义的政权政治，一开始并不表现为完全的资本政治，它经过“君主立宪”，渐渐发展到“钱主立宪”，才形成为资本政治，这是因为它的资产阶级属性。资本主义国家不同党派的竞争，代表着不同资本财团的竞争。

地主、资本家都是剥削阶级，同一阶级内部彼此不能真诚合作，是剥削阶级的共性。中国几千年封建社会的政治，阶级属性都是地主阶级，皇帝是地主阶级的总代表。他是活生生的人，或者是一个家族群体，相比于依靠资本才能维系起来的资本主义社会来说，封建皇帝执政更能体现出系统政治的要求。这种情况表现出封建社会比之资本主义社会，还有着某种特定的优越性。一些聪明的政治家，其实知道这个道理。不然，资本主义最早出现并高度发达的英国，为什么还要保留女王制度呢？日本保留天皇也是出于同样的原因。资本主义国家有些企业家，学习儒家经典，搞什么“儒家资本主义”，更是精明得很。由此可见，历史上的每个进步都伴随着退步，只有绝对化的头脑，才会不理解或者不承认这个事实。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系统论或辩证法，以及系统政治因素，是我们今天仍然要“弘扬传统文化”的真正原因，这样做决不是复古，更不是想要证明什么。如果我们事事处处强调“阶级分析”，说哪些政治经典都是封建时代的，是地主阶级思想的“遗毒”。去学习哪些陈旧的东西，你的阶级立场站到哪儿去了？如果这样想问题，就是自己封闭自己的思想。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实行拿来主义，也是毛主席的教导，我们怎么能忘记呢？

第四节 阶级合作与阶级斗争的辩证关系

讨论系统政治让我们处处碰到政治的阶级属性问题。因此，对于人类社会的阶级关系有一个辩证的

认识十分重要和必要。儒学强调阶级合作，回避阶级斗争，是一种片面性；而极左思潮，将阶级斗争绝对化，不承认阶级合作的必要性和普遍性，也是一种片面性。学会用辩证的观点和方法来看待人类阶级关系，就是为了克服这两种不同形态的片面性。

首先，阶级合作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没有农民与地主的合作，就没有封建社会的发展和进步。后来出现的手工工厂更是如此：你不去厂里打工，当然不受老板“剥削”；但你没有工资收入，怎么生存？你去厂里打工，与老板的关系不是合作又是什么呢？事实上，阶级合作才是产生阶级斗争的基础，没有合作就根本不会有斗争。农民租种地主土地，出卖劳动力，换取生活必需的微薄收入，就是受地主阶级的剥削。当这种剥削超过了农民所能够承受的限度，阶级矛盾尖锐化，就必然爆发阶级斗争。更多的阶级合作不产生斗争，例如工人和农民的合作、工农和小商小贩的合作，不同劳动阶级之间的合作，都不产生阶级斗争。这样，从社会整体上看，阶级合作的普遍性和重要性，要远远超过阶级斗争。用更通俗的话讲：共产党不是偏爱阶级斗争！我们今天向全世界宣传和推广“人类命运共同体”，就说明我们共产党人高度重视阶级合作，而且是国际范围的阶级合作。

条件哲学主张：任何真理都有其适用的条件和范围，离开特定的条件和范围，真理很可能就不再是真理。“以阶级斗争为纲”，只有在阶级斗争十分激烈，并占据主导地位的时候，才是正确的。在阶级合作正常的情况下，“以阶级斗争为纲”就是错误的。

条件哲学不否认阶级存在，更不否认政治的阶级属性。共产党是无产阶级政党，无产阶级是最无私、最有远见卓识、胸怀天下的阶级。所以，最广泛的人民性也就是党的阶级性，二者高度统一。

第五节 中国文化的精髓

中国文化的內容及其与系统政治的关系，前面已经说了很多。有必要进一步加以提炼，概括一下其与系统政治的关系。

中国人接受古典传统文化教育，决不止于学习老子的《道德经》和儒学。普通人更多的是接受古典小说、评弹、戏剧，甚至神话传说的教育。这些更具艺术色彩的文化载体，也的确比正版的经典著作更能深入人心，其教育作用更为显著。

有位外国人通过分析中国流行的神话故事，说明中国人在精神方面比西方人更有优势。例如，关于太阳，西方人把太阳当神供着呢；中国神话却有羿射九日的传说：以前天上有十个太阳，大地被烤热得要命，庄稼都枯死了，后羿就用巨大的弓箭把太阳一个一个地射下来。当只剩下最后一个太阳时，朋友把他的弓箭按住了，“再射我们就没有太阳了！”这才保留下最后一颗太阳。这是一种人定胜天的精神宣示！还

有关于火，外国人传说火是普罗米修斯从天上偷下来的，中国人却说是燧人氏钻木取火，不仅比较接近生活实际，更反映了一种自力更生的精神。在中国神话里，一只鸟被海水淹死了，它为了报仇，竟然每天都要叼一些石头块丢到海里，想把海填平（精卫填海）。还有著名的《愚公移山》故事，更是教育中国人要不怕困难，坚忍不拔。实际上正如前面所说的，中国人并没有真正相信过什么神灵，所信的就是天，即大自然对人生的决定权。这种思想实际上更接近于生态文明意识。

关于小说，有的说是六大部：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红楼梦、儒林外史、封神演义，此外还有镜花缘、聊斋志异、东周列国志等等。影响最大的恐怕是排在最前面的四部小说。由这些小说里的故事，编演出大量戏曲，对于中国人的文化影响就太大了。如果这样算起来，范围还得扩大，例如杨家将的故事、劈山救母、化蝶、天仙配等等，其故事还不在这四部小说之内。如“三言”、“两拍”等小说集，对于中华传统文化的传播，也有相当影响。

文化对中国政治的影响，深远而且很具体。所有这些故事当中，中华大一统的思想始终如一，用家庭关系演绎政治关系始终如一。比如三国的追求统一，刘、关、张的关系既是结拜兄弟又是君臣。梁山一百单八将结拜成兄弟，讲义气等等。就连《西游记》里面的神猴神猪，也要结拜成兄弟。以青年恋爱为主题的红楼男女，竟然也摆脱不了朝庭味儿十足的政治干预。

把这些封建味儿十足的东西，说成是中国文化的精髓，我老陈并没有神经错乱。到底什么是政治？人类的社会管理就是政治！既然如此，不懂得人情世故，你拿什么去管理这个社会？能把这些人情世故给读者讲清楚，不是精髓是什么？

家国情怀既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精华，也是封建社会政治统治的“真经”。而且我还直捷了当地说：这是比资本主义社会更有优越性的地方。你以为呢？

这样的文化背景，就是我们落实系统政治和进行政治改革的人文基础。不管经济如何发展，经济体制如何改变，文化背景是政治改革必须遵循的基础。政治改革如果离开这个文化基础，盲目地学习西方，必然失败！然而，如果原封不动地照搬封建社会的政治基础，那我们的政治改革就彻底“改回去了”，也是非失败不可！不能学西方，又不能保留旧的封建社会的一套，那究竟该怎么办呢？

我们政治改革的唯一参考对象，就是红军时代的苏区政府，和抗日战争时期延安的抗日民主政府。二者既有共性也有个性，都不能原封不动地搬到今天来照原样实行。但是，一些属于无产阶级政治的原则，应该提炼出来反复研究和坚决落实，丝毫含糊不得。比如红军时代真实有效的“双首长制”，不仅是反

封建的利器，更是对抗西方式假民主的有效手段。无论是封建传统，还是西方议会制度，政府都是实行单一首长制。封建时代的皇帝是“朕即天下”，一手遮天，宣称“天无二日，国无二君”。现代资本主义国家，虽然资本家在幕后操控政府，但政府行使职权，还是要遵守一定的制度：有的实行总理制，天皇或女王只是名义上的国家元首，没有实权。有的实行总统制，总统既是国家元首，也掌握实权，总理只是他手下的大管家。迄今为止，世界上只有红军实行过“双首长制”：总司令是军事首长，主管军事；总政委是政治首长，主管政治。外界称为“朱毛红军”。遇到问题二人平等商量解决。如果仍然解决不了，就召开常委会商量解决，这是实质性民主。加上士兵委员会对两位首长的监督，红军的民主，才真正成为形式完备的民主。这种优良民主传统，保留到了延安时代的党中央，但是已经出现了个人权威大于集体的所谓“最后决定权”问题。建国以后，随着军队总司令在和平时期的权威淡化，双首长制的民主传统消失于无形。总理和主席的关系实质上不是平权的，也就是说二者不是双首长关系，原则上总理只能服从主席的命令和安排。**中共领导体制中民主的渐变性消失，是一个重大的原则性历史教训，需要理论界深入研究，推陈出新，提出新的可行性建议。**

从这个事情也可以看出：传统势力有多么强大！这是一种渐变式的退化。红军时代士兵委员会对首长的监督也是真实而深刻的。现在的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对各级领导干部还有监督作用吗？人们的脑子里要打一个大大的问号！因为如果有监督作用的话，贪污腐败的官员就不会有这么多！官场大面积塌方式腐败，说明这些官员的思想反动透顶，一心只为自己谋取私利而做官。然而，**这样一批“反动派”，是怎么被“抬举”到如此有实权的高位上去的呢？这种用人机制，不是比这件事情本身更可怕吗？想仅仅依靠“思想教育”解决问题，简直是儿戏！抓也抓不完，杀他，他也不怕。很多贪官把家属子女和巨款都弄到海外去了，坦白讲，这些坏家伙，就是跟国家和广大人民群众“拼了”。现在还有不少人停留在“多杀几个”就能治理贪污腐败的认识上，实在可怜！当然，该杀者不杀，就是实际上纵容，更让人们失去信心！既要处理现在的贪官，更要铲除贪污腐败分子产生的土壤。贪污腐败最大的根源，就是党和政府失去了最宝贵的人民民主！航天员在太空“失重”，会造成骨质丢失；一个执政党如果“失众”，就会造成政权丢失。反贪污治腐败，是中华传统文化的基因；但深刻的人民民主，恰恰是中华传统文化中的“弱项”——这才是封建传统给我们遗留下来的最大难题。**

我们需要创造崭新的中国式民主！而不是单靠引进“德先生”。

第五章 需要重新认识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主义从它诞生以来，已经过了将近一百八十年。人类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的洗礼和苏联从诞生到解体的全过程。科学技术的发展更是快速得令人眼花缭乱。回过头来再看马克思主义，我们一定会有新的认识！这样做很有必要，因为我党一直把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

如果我们像某些人所想象的那样，事事处处都要翻本本，看看马克思怎么说我们就怎么做，那我们根本就没有办法工作了，因为现在的一切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到底是什么？它在今天是怎样的一种表现？我们怎样客观地、与时俱进地对待马克思主义？讨论这样一些问题，是处理与系统政治相关联的一系列重要问题的前提。如果不能实事求是地对待马克思主义，我们关于系统政治的一切讨论，都将毫无意义。

第一节 当前互联网上对马克思主义的叙述

以下从网上摘录：

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是：德国的古典哲学、英国的古典政治经济学、法国的空想社会主义。三个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

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捍卫了哲学唯物主义，用德国古典哲学的成果、特别是辩证法丰富了哲学，把唯物主义对自然界的认识推广到对人类社会的认识，创立了历史唯物主义，指明了被压迫阶级摆脱精神奴役的出路，把伟大的认识工具给了工人阶级。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马克思论证并发展了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论，创立了剩余价值理论，阐明了无产阶级在资本主义制度中的真正地位，科学地论证了资本主义灭亡和社会主义胜利的必然性。

科学社会主义：空想社会主义批评资本主义社会，幻想有比较好的制度出现，但它不能指出摆脱剥削制度的真正出路；马克思对资本主义作了科学的分析，说明无产阶级才是创立新制度的社会力量，得出了阶级斗争是划分为对抗阶级的社会发展的基础和动力这一结论。

还有以下一些说法：

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包含两部分内容，科学社会主义革命理论(即政权理论部分)，科学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

科学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包含两部分内容：第一部分内容，科学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结构设计；第二部分内容，科学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运行原理设计。后面这些说法，是早期教科书当中所没有见到过的，即上世纪我们学习马克思主义的时候未曾见过的内容。

互联网上的这些内容介绍，让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感到十分困惑。

第一，马克思主义哲学，它是什么哲学？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要点是什么？它和古典哲学是什么关系？德国古典哲学又是怎么来的？黑格尔难道真是天才吗？费尔巴哈和黑格尔的观点不同，其本质是什么？

第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180年来的社会实践对得上号吗？能够解释和说明在世界上发生过的重大事变吗？例如，怎样说明苏联解体？两次世界大战，和今天仍然停止不下来的国际战争？

第三，经过苏联的实践、中国的改革开放和其它社会主义国家的实践，所谓科学社会主义与现实是怎样一种关系？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和现实的改革开放，与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怎样对接？有什么样的经验和教训？理论本身要不要“与时俱进”？

所有这些论述，包括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教科书，给我们带来了不小的困惑。这当然有利于政治思想的发展和进步。现在民间哲学研究风起云涌，其涉及范围决不限于哲学，而是触及到了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的方方面面。

只有感到困惑，我们才不会自以为是，才会对流行的种种“说法”，那怕是教科书上的说法，提出质疑和努力去思考，不至于陷入教条主义的泥淖。

第二节 从哲学唯物主义到唯物史观

按照教科书上的说法，黑格尔唯心主义辩证法，是认为世界起源于“绝对精神”。既不是上帝，也不叫耶和华，但却不是物质，而是精神，所以叫做“唯心主义”，他认为世界上的各种物质都是绝对精神外化的产物。我们划分唯心主义与唯物主义的唯一标准，就是看哲学家是主张物质第一性还是精神第一性？此外再无别的标准。其他关于两种哲学思想的划分，都是错误的。例如说唯物主义就是认为世界上只有物质，在物质之外没有别的东西。这种说法是严重地误解。这里的“唯”字不能理解为“唯一”，只能理解为“第一性”、“起源”之意。

说费尔巴哈是唯物主义者，就是他反对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认为物质才是第一性的，意识和精神是作为高等动物的智慧人类才有的一种能力，即认识和了解物质的能力。归根到底，物质才是基础。用文字记载的精神成果，仍然属于精神，而不属于物质。当然，书本同时也是另外一种意义上的物质。

马克思和恩格斯，把黑格尔和费尔巴哈哲学观点的正确方面结合起来，形成了辩证唯物主义的哲学观念。然而，依据我们在前几章的分析，唯物辩证法的真正源头是中国的道家学说，是老子对始于夏朝，流行于殷周时期的阴阳五行学说所进行的总结。由于早期中欧文化交流的困难，黑格尔是否受到过中国早期文化的影响还很难说。根据前面所引述闾先

生介绍黑格尔批评古代中国的话，说明这位先生对于中国古代文化的内情知道的并不多。

教科书上的这种种说法，并不是错误，而是比较肤浅。马克思和恩格斯共同创立了马克思主义，只是使用了马克思的名字来命名。无论是辩证法还是唯物论，都不属于马克思主义，而只是他们两位在创造自己的学术成果时所使用的工具，或者叫“脚手架”。大家知道，没有恩格斯的帮助，马克思连日常生活都成问题。为了共同的事业，恩格斯不得不去做自己最不愿意做的事情，好获取经济收益。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只是一个供研究和写作用的初步提纲，却显示出他全方位的惊人才华。其中透露出来的唯物辩证法思想，比当时任何学者、科学家所具有的唯物辩证法观念都更深刻，更富有创造性。从对大科学家牛顿、达尔文等所进行的分析、评论，对于科学应如何进步给出了深刻而具体的指导。什么哲学才属于马克思主义呢？给出唯一准确评价的，就是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演说。也就是说：**只有唯物史观，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并没有其他内容。

很多人其实知道这个道理，只是出于一种不成文的习惯：凡是认为正确的东西，属于普遍真理的东西，都愿意往马克思主义头上套。好像在马克思主义诞生之前，世界上就没有真理似的。其实这种想法本身就违背了马克思主义！

知道唯物史观才属于马克思主义还不够，还必须明白唯物史观的基本内容到底是什么？

所谓唯物史观，就是将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应用于对人类社会历史进行考察，所引伸出来的有关社会哲学的基本观点。它是我们用马克思主义考察分析人类社会全部历史的有力思想武器，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和出发点。

唯物史观包括以下基本观点。这里的叙述只是个人的理解，如有质疑，请阅读原著。

推动人类社会历史进步的，是两对基本矛盾：

其一，**在经济基础领域，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生产力是指整个社会物质生产的能力。它的本质，决不是指一个社会在单位时间内能够生产物质产品的总数量，而是指生产这些物质财富所使用的科学技术手段的水平和含量。比如，牛拉犁的科技水平，远低于拖拉机耕作的水平，而遥控自动工作的农业机械，其科技水平又要高于普通的拖拉机，如此等等。除了机械，还包括育种、播种、田间管理、施肥等等各个方面的工作。在工矿业、交通运输业、商业和第三产业的方方面面都是一样：不是看总量，而是看其中所包含的科学技术水平。

因为生产某项物资的总量，并不是只跟它所使用的科技手段有关，还跟社会生产的总体规模等其它因素有关。例如，国家大小不同，所在地理位置不同，国土资源丰富程度不同，历史机遇不同等等，都会影

响各个国家产出该种物资的总量，无法进行客观地比较。

在经济基础领域，客观规律是：**生产力发展水平决定生产关系。**（例如牛拉犁决定了农业合作化只能搞互助组，搞人民公社显然太“超前”，如此等等。）所以，**生产关系必须适应生产力发展水平的需要。所谓生产关系，是指在社会生产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包括：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形式；由此产生的各种不同社会集团在生产中的地位以及他们的相互关系；完全以它们为转移的产品分配形式。**这三个方面相互联系，构成统一整体。

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发现的这一规律，才是整个理论大厦能够建立起来的基础。承认这一点，就是说：**凡是妨碍生产力水平提高的生产关系，都必须进行改革。**

但是事情远没有这么简单，影响人类社会发展的还有另外一对基本矛盾：

其二，是**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一个社会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该社会的经济基础。建筑在其上的人类社会关系的总和，构成该社会的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必须适应经济基础发展的需要，否则就要进行变革，甚至可能发生上层建筑领域的革命！

所以，生产关系能不能革命，能不能变革，还要看看上层建筑领域的具体情况。如果现有的上层建筑，不能保证正确而有效地解决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那么上层建筑领域的革命就不可避免。

其三，在**上层建筑领域，也存在着基本矛盾。**上层建筑内部的矛盾，马克思和恩格斯只能专门研究和讨论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矛盾，因为在当时的世界上，还没有出现社会主义国家。对于资本主义社会所进行的解剖和分析，对于我们认识未来的社会主义社会，的确有帮助。但是如果将这种类比绝对化，忽视了这两种社会制度之间存在着本质差别，就容易犯教条主义错误。

在上层建筑领域，主要的就是阶级矛盾。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可以划分两个大类：第一类是剥削阶级，包括工业、农业、商业、建筑业、运输业和银行业的资本家。第二类是劳动者阶级，包括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依靠脑力劳动为生的大知识分子。在这个问题上，必须注意的是：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是同等的：依靠工资为生的教师，和在工厂里干活的工人、技师、工程师，同样都是受剥削的劳动者。就这一点而论，在那个“史无前例”的年代，有些人为了表现自己“很革命”，故意把高级知识分子划入“另类”，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明显背叛。同时也违背了我们党在民主革命时期划成分的有关规定，当时曾明确规定：依靠工资为生的大学教授属于无产阶级。

那么，在上层建筑领域，除了阶级矛盾，还有没有别的矛盾呢？在同一类阶级，甚至在同一个阶级内部，有没有社会矛盾？所谓社会矛盾，当然不是夫妻吵架之类的日常琐事，而是具有普遍意义的矛盾。马克思主义似乎忽略了这样一个问题，这使得信奉马克思主义的一些同志们，时时处处都要“以阶级斗争为纲”。

这个问题，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创建他们的理论的时候，很容易被忽视的问题，因为在他们那个时代，还没有关注阶级矛盾之外的社会矛盾的客观条件。

但是，正因为存在这样一个薄弱环节，构成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重大不足。这是“唯阶级斗争论”能够打着马克思主义的旗号畅行无阻的真正原因。其逻辑程序是这样：提高生产力发展水平，是人类社会进步的物质基础；而提高生产力发展水平，就必须对生产关系进行变革。变革生产关系的真正阻力，来自于上层建筑当中的统治阶级，他们为着要维护自己的阶级利益，就极力阻挠生产关系的变革。所以要解决这样一个问题，只有在上层建筑领域实行革命，即发动被压迫阶级起来革命，开展武装斗争，用武力推翻统治阶级的政权，建立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政权。只要有了人民自己的国家政权，上层建筑领域的问题就能迎刃而解。结论是：不抓阶级斗争行吗？

中国七十多年社会实践向我们提出的问题是：真的是“阶级斗争一抓就灵”吗？抓住阶级斗争不放，一切问题真的就能迎刃而解吗？这个问题在以后的章节中还要详细讨论。这里的回答是：不行！因为存在于人类社会领域的矛盾，决不是只有阶级矛盾一种，实际情况要复杂得多！

第三节 剩余价值学说的价值与不足

按照网上摘录资料的说法：在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剩余价值论被认为是把“空想社会主义”变为“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突破之一。

为什么剩余价值学说如此重要？因为它回答了利润应该如何分配的问题，让无产阶级革命师出名。

请看公式： W （商品价值）= c （不变资本）+ v （可变资本）+ m （剩余价值）

其中：

c :不变资本，即由生产资料构成的资本。（土地、机器、厂房、设备）。

v :可变资本，以劳动力形态存在的资本。（以工资为报酬形式的劳动力）。

资本主义的经济学家们认为：剩余价值全部属于生产资料所有人，即垄断资本家。因为他们已经通过工资形式，购买了工人们的全部劳动。按照契约关系，雇佣双方已经两清，剩余价值的分配与劳动者无关。

但是，马克思提出新的剩余价值学说，论证提出：**剩余价值应该按劳分配。**

因为不变资本自己并不会创造价值。劳动是价值产生的唯一原因，剩余价值应该完全按劳分配。当然，经营者的管理也是一种劳动。分配是在从事两种不同形式劳动的劳动者中间进行。如果剩余价值全部或大部划归资本所有者（即资本家），那么资本家的资本，就会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造成贫富差距越来越大，金融危机即不可避免。如果反过来，剩余价值完全划归劳动者所有，资本无法增值，生产规模无法扩大，生产力就会停止发展。

到底应该怎么办呢？马克思提出的办法就是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在生产资料公有条件下，生产规模越扩大，劳动者的收益就越会增加，所以他们愿意拿出部分剩余价值，用于扩大再生产规模或者提高生产力发展水平。

在这种模式下，资本只能购买商品和服务，不能购买生产资料，生产资料不会被资本家所垄断，劳动者就不用向资本家出卖劳动力。社会不会两极分化。

可想而知，资产阶级的绝大多数成员都不会接受马克思的这种观点。资本家靠着对生产资料的垄断，通过契约的方式购买了劳动力，同时压榨了剩余价值。资本家掌握经济优势，通过操控政治可以巩固甚至加速对剩余价值的攫取。

但是，作为空想社会主义代表人物之一的欧文先生，他本人就是资本家。他通过在自己家的企业里做实验，提出了为工人阶级求解放的社会主义理想。说明对于资本家个人的分析也不能绝对化。

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让人类第一次清晰地看明白了财富如何分化、资本如何剥削，为在当时资本主义世界的劳动群众争取自身解放提供了理论依据。马克思和恩格斯是讲道理的，承认企业管理也是一种劳动。按理说：物质的东西是死的，它只是工具，工厂里的机器、厂房、动力等等，它们自己是不会进行生产的。（那时候还没有发生生产自动化或者机器人会干活之类的事情），所以，产品被生产出来完全是劳动的结果，成果一定要按劳分配！承认资本家先生的管理也是一种劳动，同工人一样参加成果分配，就已经是对先生们的认同了。

从经济学分析上，说明工人们应该和老板平起平坐，是思想意识上的重大进步。剩余价值学说，从常识上说明了争论中的“到底谁养活谁”问题，戳穿了资本家所说“我花钱雇你，是给你生活出路”的虚伪说法。唤起劳动者的主人翁意识，从精神上解放劳动人民，这就是剩余价值学说的真正价值。

但是，仅仅依靠剩余价值学说，工人阶级还不知道应该怎样解放自己。未来的理想社会，还仅仅停留在书本上和想象中。这就是说，它不能解决上层建筑领域革命的实际问题。马克思和恩格斯，还在思考阶级斗争，和怎样才能让工人阶级掌握国家政权。他们清楚地知道：依靠现有的议会制“民主”，工人阶级不

可能夺取国家政权。在这方面的不足，并不属于理论的不足，因为再正确的理论也不能包医百病，每个理论都有它自己的研究范围，和所要解决的问题。法国巴黎公社起义，让马克思、恩格斯看到了劳动阶级争取解放的斗争，有可能取得胜利的希望。

第四节 科学地对待阶级斗争学说

以后的马克思主义者，尤其是列宁同志，特别重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是有客观原因的。

落后地区容易出现理论似乎是规律，因为那里的先进分子要为国家 and 民族寻找出路。马克思主义诞生地德国，在欧洲资本主义群体中比较落后，当英法资产阶级革命风起云涌之时，德国还属于封建堡垒。同样，俄国到1905年才发生资产阶级革命，列宁等人就已经在谋划无产阶级革命了。1917年十月革命之前，俄国总共才搞了12年资本主义，在资本主义阵营中实在太落后。无产阶级革命派，对于资本主义政治不可能有任何意义上的借鉴，只能将其消灭！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列宁把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强调到了极端的地步，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他甚至认为：政治就是阶级斗争！正如前面我们分析过的，这样就把政治“包括”阶级斗争，改成了“等于”阶级斗争，犯了逻辑错误。

我党在建国后所走过的弯路，无限扩大“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适用范围，也有主观和客观两方面的原因。主观上就是对列宁同志的观点缺乏分析，没有坚持毛泽东同志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对于中国资产阶级所做的分析。客观上则是对“美苏联合压制中国”反应过度，忘记了“美苏对抗”才是当时世界的基本态势。

从理论上分析，正是阶级合作才给阶级斗争创造了条件。两个阶级之间，如果不发生合作关系，就不会在一起，还怎么斗争呢？只有在合作中出现不公平，这两个阶级才有可能发生斗争。我们这样客观地去理解阶级斗争理论，就不会将其绝对化，广泛化。阶级斗争的道理不是不要讲，而是要科学地讲，实事求是地讲。对于地主富农摘掉帽子，都叫“社员”了，很多人不理解。其实这很好理解：他们早就停止剥削了！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是我们党一贯坚持的政策。

有些人留恋阶级斗争的理论和政策，恐怕不是出于对建国后搞土改划成份的“不捨”，而是另有想法——把贪官污吏打成新的“官僚资产阶级”，在这个基础上再搞以阶级斗争为纲，搞珠连祸及。例如将贪官的子女打成“贪二代”，在参军、上学、提干、出国等等问题上加以限制。但是，正如红军的后代不一定都能重用一样，贪官的后代也不一定都不能提拔。反对血统论，是我们的一贯政策，怎么能说改就改了呢？根据历史唯物主义，人的思想是对现实社会的反映。小孩子生下来就是一张白纸，能画最好最美的图画，

关键还是在教育上。——**教育倒退，文化产品的品质低劣和内容贫乏，才是当前我国所面临的巨大危险！**

我们对人的阶级性的认识还有一个很大误区——重男轻女。我们在划阶级成份的时候，总是根据男性家长的成份来决定子女的成份。其实妈妈对子女的影响往往大于爸爸，因为孩子从小就是由妈妈带大的。我国有不少父亲常年在外地工作，逢年过节才回家与家人团聚。

现在，由于少数高干子女及其亲属腐化堕落，使得国人对于“红二代”的印象较差，有些人甚至一听到某人属于“红二代”就摇头。这能怪谁呢？怪不了任何人，因为过去对于“血统论”的宣传太过分了。甚至在“文革”当中，有一段时间专门批判“反动血统论”，都解决不了这个问题。那时候批判“血统论”，似乎只有一个实用主义的目的：号召出身不好的造反派战士起来造反，不要背思想包袱，不要有任何顾虑。并没有从根本上消除“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打地洞”在人民群众中所造成的恶劣影响。现在，有些坏人勾结贪官，也是充分利用种种亲属关系、裙带关系，搞得一人贪腐，祸殃大家，说明“血统论”在制造贪腐中也“卓有成效”。

由此可见，要完全彻底清除“血统论”并不容易！但是，“血统论”是对于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学说的完全误解和严重歪曲！如果不信，可以查看一下党的主要领导人。恩格斯本人就“出身有钱人家”。刘少奇、周恩来都是地主家庭出身。如果认真了解一下韶山毛主席旧居，毛也决不可能是贫雇农家庭出身。而毛、刘、周都是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家。

这样造成的后果是：谁要敢宣传阶级合作理论，谁就是在搞修正主义！为资本主义复辟制造舆论。而我们知道：阶级合作对于人类社会进步所起的推动作用，远远比阶级斗争大得多，重要得多。推动社会生产力高速发展的重大科技发明，多数是在阶级合作比较好的和平时期。没有阶级合作，特别是工人阶级与农民阶级的合作、工农与小资产阶级的合作、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的合作，人类社会不可能进步。从总体上看，劳动阶级与掌握生产资料的“剥削阶级”之间，也是在合作，只是这种合作极不平等，这才造成了阶级斗争的紧张局势。在不同的剥削阶级之间，也会发生特殊形式的阶级斗争，例如，在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过程中，新生的资产阶级，和愿意搞资本主义的开明绅士、工人、农民，组成所谓“第三等级”，与封建地主阶级当中的顽固势力进行斗争。“第三等级”就是各革命阶级联合体，是一种特殊形态的阶级合作。

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教育，完全不讲阶级合作，这是一种偏向。由此造成的错误认识就是：只有阶级斗争才是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动力，而阶级合作是用来欺骗麻醉劳动人民的“歪理邪说”。

阶级斗争激烈时，对于社会生产力造成极大破坏，是人人都知道的事实。那为什么还要把阶级斗争看成是推动社会进步的唯一动力呢？这是因为阶级斗争胜利后掌权的一方，会立即接受前人教训，改变原当权者那一套错误做法，有着“立竿见影”的效果。而阶级合作对于社会进步的推动作用，是渗透在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是“慢工出细活”，不大能迅速见成效，所以容易被研究者所忽视。但是，真正有出息的当权者，都明白阶级合作对于社会政治经济社会发展所具有的决定性意义。历史上有远见的政治家，即优秀的统治者，都会想尽办法缓和阶级矛盾，搞好阶级合作。利用清官打击贪官，其目的之一也是要缓和阶级矛盾。

我们党在胡锦涛总书记的领导下，提出了构建和谐社会的战略目标。这明显是针对“以阶级斗争为纲”而提出来的，因为不放弃这个“纲”，中国社会永远和谐不了！但是，无论是中央领导人，还是管理理论的中宣部领导同志，都不敢直截了当地挑明这一点。这是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有顾虑，害怕给扣上反对“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大帽子。说明尽管中央决议已经废除这一提法，社会上还是有很多人，硬要把“以阶级斗争为纲”说成是马克思主义，当然也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现在，“反马”、“反毛”的帽子满天飞，气势汹汹，说明这件事后果很严重！如果不能正确面对这件事，建设和谐社会就会成为泡影！

1965年12月，伟大的朱德委员长，可能（？）是预感到了什么事情吧，就在全国人大常委会上号召“要加强阶级团结”！这可比直接号召阶级合作，更加触动人的灵魂！可惜呀，中共中央领导层和全国民众，都没有理解朱德委员长的深意。所以，第二年跟着发生的“史无前例”就不可避免了！

不能正确对待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还会酿成巨大灾祸。我的一篇主张“以阶级合作、民族团结为纲”的文章，不能在公开刊物上发表，说明阻力很大。马克思主义的灵魂是实事求是，而要真正做到实事求是，难哪！

第五节 到底什么是社会主义？

人们把社会主义从空想到实践的发展，说成是马克思主义的伟大胜利。但是时至今日，到底什么是社会主义？这个问题并没有搞清楚。

传统观念认为，社会主义就是共产党的领导加上生产资料公有制、计划经济。苏联、中国和其它社会主义国家的实践，都证明这种观念有问题：对客观规律的认识过于简单。

国家实行何种经济制度，决不是根据主观愿望，而是根据客观经济规律的要求，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在战争年代的苏区，在南泥湾，必须实行物资生产、购买、运输、收藏、分配和消费统一管理“计划经济”，这是为了适应战争的需要，实际就是

“战时经济”。解放后，在抗美援朝战争时期，国家实行重要战略物资的“统购统销”，而不完全实行市场经济，一是战争的需要，二是渡过困难时期的需要。在上世纪60年代的“三年困难时期”，实行粮食、布匹等“计划供应”措施，亦是如此。困难时期过去以后，人们把没有用完的布票、粮票贴起来当画看，说明这根本不是什么“计划经济”，而是一种渡过困难的临时性措施。没有经过这些事的年轻人，把所谓的“计划经济”当成“社会主义优越性”，把搞市场经济说成是搞修正主义、资本主义，实在是天大的误会。

那么社会主义中国为什么要实行市场经济制度呢？这不是跟资本主义国家一样了吗？经济制度一旦改变，上层建筑为经济基础服务，不跟着改变行吗？这不就是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一块儿都姓“资”了吗？这样的质问，从逻辑上说是能成立的。如果我们的反驳是对的，能证伪这种说法，那就说明：关于市场经济属于资本主义的观念，从根本上说就是错误的！

我们为什么要搞市场经济？因为：1，消费的高度随机性，与生产的高度计划性存在尖锐矛盾，只能用市场办法解决。2，按劳分配与按需生产的矛盾也只能通过市场解决。3，世界经济是个大市场，我们要溶入世界市场，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贡献，只有在国内也搞市场经济，才能跟国际市场接轨。

如果说，世界各国都在搞市场经济，而经济体制是决定社会性质的物质基础，我们有什么理由说自己不是在搞资本主义呢？难道说社会制度的不同仅仅体现在上层建筑领域吗？

当然不是！说马克思主义需要发展，决不能停留在原地不动，也包括对这一类问题，必须站在马克思主义立场上，认真进行深入研究，做出完全新的解释。市场经济跟市场经济有本质不同。决定市场经济性质的不是市场交换这种形式，而是**市场经济的运营指导思想和决策程序、奋斗目标**！为什么要搞市场经济？要达到怎样的目标？这是市场管理者、决策者和每个市场主体，都应该经常思考的中心问题。我们的错误不在于搞市场经济，而在于决策目标和程序往往不够明确，不够坚定，容易为眼前事变所左右。

什么叫**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搞市场经济是为了社会发展的需要：提高人民生活质量和方便程度，构建和谐社会，加强阶级团结**。外卖和快递的出现，很生动地诠释了这个问题。为了全民族共同发展和进步的崇高目标而加强市场建设，严格管理各类市场，就同资本主义市场划清了界限。市场的类别，在全世界都是一样的。例如，除了商品市场，还有生产要素市场等等。但是，社会主义市场与资本主义市场的最大区别是：**劳动力不再投入市场交换**。因为劳动力是劳动者自己所拥有的一种为社会做出贡献的能力。劳动者对于自己的工作状态有高度的自主权，他（她）不再为生活所迫而选择自己并不喜欢的工作

或者生产岗位。如果一个社会连这一点都做不到，至少说明该社会还没有达到社会主义的标准。

什么叫**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就是把**市场作为资本无限扩张的一种合法手段**。在资本主义条件下，金融资本市场，是控制和领导其它类市场的最终主导者。已经过去的两次世界大战和一些主要的国际战争，都跟资本家集团对于市场的争夺有关，最主要的有资源市场、军火市场和劳动力市场，为此还要极力争夺交通干线的控制权。这种控制与反控制的斗争，成为帝国主义集团之间矛盾的主要焦点。所以说，资本主义是跟帝国主义最紧密相联系的概念。而社会主义跟保卫和平密切相关，因为没有和平就没有人民的幸福，甚至人民的一切！只有在遭受外来侵略的情况下，社会主义国家才会被迫地为保家卫国而战。对待战争与和平的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成为我们判断国家性质的重要依据。二十年代以来这些年，俄乌之间的战争和中东战争的硝烟，烧毁的是战斗地区人民的生命财产，增长的却是军火商的赚钱数额。

两种不同的市场经济，除了决策目标和经营管理理念根本不同之外，凡是市场经济还总有它的共同特性。这个共同特性就是允许买卖双方商品交换中讨价还价。如果没有这一条，它就不属于市场经济了。市场由买卖双方构成，买方总希望商品价格越便宜越好，卖方总希望商品能卖个好价钱。双方经过协商讨论达成共识，遵照执行，还要讲究信誉，互相成全。市场也存在道德问题，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违背道德和良心的市场交易绝对不能做。例如，有人提出卖淫合法化的要求，这就是反对社会主义！连劳动力都不能买卖，更何况是人的尊严和贞洁？决不是只要有钱什么都能干，这是管理和教育的责任。社会管理是什么？按中山先生的教导，这就是政治！

那么，到底什么是社会主义？

苏联解体给我们提出的深刻教训是：一定要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

现在的提法有：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如此等等。

把握社会主义的内涵，需要明确：显示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说明社会主义是从新民主主义（或者从其它前社会主义社会形态）向将来的共产主义社会过渡的社会。需要这种过渡的原因是：现实的生产力发展水平、社会管理水平和人们的文化与道德水准，在短期内还达不到实行共产主义社会制度的要求。即：暂时没有实行共产主义制度的条件。我们以前曾经实行过的“战时共产主义”，只是具有“按需分配”的某些特征，而决不是真正的共产主义。

以上三种提法，含义各有不同。

科学社会主义，说明社会主义不仅仅是一种主观愿望，而是从资本主义走向共产主义社会所必须

经过的过渡。没有这种过渡，资本主义社会不可能直接跳到共产主义社会。而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沿着整个社会被资本严格控制的路径一直走下去，资本家本人也成为资本的奴隶，人类就不可避免地要走入战争和毁灭的深渊。所以，搞社会主义，不是马克思主义者的个人意志，或者少数几个国家人民的善良愿望，而是关乎全人类前途和命运的根本举措。这样说，是根据现代资本主义制度内在的不可调和的矛盾性，所以叫做科学社会主义。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说明我们中国的社会主义还不完善，还需要进一步完善和发展。所谓“中国特色”，我理解其基本用意，就是要兄弟国家不要仿照我们的做法。特色的本意就是如此，决不是说我们独一无二，值得骄傲。朱德委员长提出的“中国式社会主义”，似乎更为妥当。

以上三种说法结合起来，才是比较完整的社会主义概念，但是我觉得还没有抓住问题的本质和要害。

根据我们对社会主义市场的分析，对于整个社会也可以这样看：**一切以整个国家的社会进步和人民福祉为决策的目标和原则，这样的社会制度就是社会主义。**以人民为中心，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只是同一原则的不同表述。

如果承认我们提出的上述原则，又承认社会主义就是向共产主义的过渡，那就必须在分配制度上进行改革，逐渐地增加按需分配的比重，减少按劳分配的比重。因为劳动不再是谋生的手段，而是有劳动能力的公民应当为社会所尽的义务。关于对老年人和少年儿童的种种关爱和优待，也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自然体现，与回报他们（指老人）过去的劳动贡献无关。由按劳分配向按需分配转变，应该是退休金制度改革的目标，这当然是个渐变过程。对历史上有特殊贡献的老人实行优待，应当被看作是一种特殊形式的奖励，不属于按劳分配范围。这个问题以后的章节还要详细讨论，因为它极端重要。

第六节 科学技术进步对于社会管理提出新的要求

以上重点讨论了在社会进步方面，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及其现代意义。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对于系统政治的冲击十分巨大，我们这些人赶上了一个激烈变动的新时代。这也需要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来加以分析，从而正确地对待新时期的政治观念。

系统思维虽然在古代就有，但是在今天，由于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人类各个系统的相关性，比以往更加密切，更复杂化了。古人说“城门失火，殃及池鱼”。今天网络上说“羊毛出在狗身上，由猪买单”，更形象地描述了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因果关系的高度复杂性。

条件哲学的一个基本观点是：单一因果关系，由原因 A 必然导致结果 B 的想法是错误的，根本不

成立！任何因果链条都是条件组合决定目标成败，正是对上述现实情况所做的哲学总结。科技进步对于社会各方面的冲击，也是这种情况。当然，绝对性条件对于目标成败拥有否决权！也是条件哲学得出的结论。这清楚地说明：高科技手段，对于某些老问题很可能仍旧“无可奈何”。

航天技术的突飞猛进，几乎冲击了我们思想意识的方方面面。敢上九天揽月，不再只是诗句，已经成为事实。中国和美国都已经实现“登月”。世界上现有四套卫星导航系统，比较先进的就是中国的北斗和美国的 GPS，俄罗斯的格罗纳斯和欧洲的伽利略比较落后。航天科技涉及的领域非常广泛，首先是军事技术因此而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无论是空天飞机，还是洲际导弹，甚至潜艇、航母、鱼雷都离不开卫星导航系统。美国航母比我们多，为什么还是怕我们？就是因为我们在航天及相关应用领域的巨大进步。不久之后，天空就只剩下中国空间站能用。事实说明：科学技术不仅是生产力，更是战斗力！

在高科技时代，不只是你军队数量多，战斗力强，更要有高科技武装，敌对势力才会怕你。有了高科技军事力量做后盾，在国际政治舞台上说话才有份量。

科技对国内政治的冲击恐怕更厉害。首先是信息技术的发展，办公模式的彻底改变，使一些旧式的政治手腕，实现不了操作者的目的。人工智能的发展和进步，让我们这些老年人，连学习都来不及。机器人的智力和逼真性已经到了以假乱真的地步。而机器人代替真人上班，又会引发新的“失业”。其实对此不必担忧，比如拖拉机解放了农民，农民不还是照样忙得不可开交吗？

但是，怎样利用信息技术和高科技手段，来防止官员的贪污腐败，及其与非法经营者的内外勾结，应该是能够想出办法来的。数字经济应该为此做出贡献。纸币的大量减少，刷卡消费普及，让小偷差不多“失业”。特别是各大银行业务的管控和信息处理，对于反对卖国分子、腐败分子，应该有实际功效。“恒大”和其它犯罪集团，都是在干坏事之前先把银行拉下水。

各级业务部门的领导者，他们有管理重要业务的权力，应该成为广大员工和人民群众可以信赖的朋友和学习的榜样。但同时，他们也确实容易成为腐败犯罪分子拉拢和腐蚀的对象，因为坏人需要利用他们手中的权力。这就是站在风口浪尖上的“关键少数”。在高科技发展条件下，这些关键少数，要站稳人民利益和国家利益的立场，确实很不容易。这就要求我们，把感人至深的思想教育，和细致入微的科技手段，巧妙地结合起来，多给他们几个可靠的抗拒腐败的手段。

高科技手段固然重要，各种财务和领导制度的改革恐怕更为重要。人民政府怎样才能真正属于人民？怎样充分发挥全体人民对于领导干部的监督作用？这种制度设计，怎样才能给好人撑腰，让坏人不敢使坏，并有可能渐渐地变好？人的思想观念是社会制度的产物。封建社会人们认为“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是因为科举制度确实可以让穷书生当上大官。否认现实教育的作用，只强调灌输革命道理，甚至现实是“联系群众的不如联系领导的”、“会干活的不如会拍马屁的”，你还非要强调“树立为人民服务的革命理想”，听的人只能当是耳旁风，甚至背地里讥笑你。根本问题是要改变落后于实际需要的政治制度，只有改革政治制度，才能从根本上减少以至消灭贪污腐败。

科技进步所影响的是整个社会。所以在社会管理，即政治的其它方面，也需要考虑科技进步所带来的影响。我看到一个视频，是讲“前三十年”如何好的，其中说到当时提倡“四大”——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是多么地民主啊！我就奇怪了：今天的网络和手机上的视频、文章一天到晚要发多少啊！甚至到了“信息爆炸”的程度。那几张大字报又算得了什么？微信里传播的文字、图片，甚至还有“小电影”（视频），比那“四大”的形式和内容要丰富得多了！可是，从反面说，每天接收到的谣言、谎信也太多了，让你本来不及分辨。

有一利者必有一弊，信息爆炸把我们的脑子都搞糊涂了。这时候更需要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来帮助我们分辨是非。其实在更多时候，是需要我们不接受不理睬它们，能不受干扰就算不错了。

科技进步是用新的取代旧的，但决不可能把旧的一扫而光。大门两侧，墙面上不是还有好多“大字报”吗？——那是一些宣传口号，如24字“核心价值观”等等。这些东西没有多少正面作用，仅仅显得形式主义还很严重，与科技进步局势格格不入。做那些无用功，还不如抓好正规刊物和网站的管理和提高。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和进步，利用高科技手段犯罪的坏人也多了起来。他们用于欺骗老百姓的手段多不胜数，我们与骗子作斗争的困难程度不断升高。这时需要的是“魔高一尺，道高一丈”，要求公安及社会管理部门，对于利用高科技手段实施犯罪的人，有更有效的打击和扼制手段。用高科技手段，制止贪污犯罪，是人民的企盼。

科技进步代表着生产力发展水平的提高。按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它必然对上层建筑领域产生巨大的推动作用，因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在以后的章节，在讨论其他问题时，还要说到科技进步对政治的影响。

第六章 建国后“前三十年”的经验教训

人们常说的“前三十年”，是指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1979年转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之前的时代。在1978年底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上，邓小平作《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标志着正式结束了“前三十年”。

前三十年，离开我们今天已经有四五十年了，所发生的各种事件的“前因后果”都展现得比较清楚，按理说在全民当中应当比较容易形成“基本共识”。但是，由于多数国人还没有养成辩证思考的习惯，更不知系统论为何物，头脑中存有不同的认知模式，对该段历史的认识竟然分歧严重。

这三十年清楚地划分为两个时段：文革前十八年和文革及其被“否定”的十二年。为叙述方便，可将它们简称为“前十八年”和“后十二年”

所谓“前十八年”，在1966年“文革”开始的时候，习惯上称为“十七年”，因为1949年十月一日中央政府成立，到1966年“五、一六”通知下达即开始“文化大革命”，其时间相隔尚不足十七年。

实际上，以后所发生的种种重大事件，追根寻源，都从这“十七年”开始。系统不仅指各相关事物在空间方面相互联系，也包括在时间方面前因后果形成系统。所以对建国后中国一些重大历史问题的考察，都应该从建国初开始。

现在网络上朋友们对“十七年”的认识，大多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我们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以后，接管过来的是混乱不堪的旧中国，经济十分落后，基础设施毁坏严重，加上抗美援朝战争和蒋介石匪帮叫嚣反攻大陆，百万土匪盘踞山头 and 密林深处，地主武装对土地改革工作的破坏和攻击，能够在在一个比较短的时间内，把国内局势稳定下来，特别是把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集团的侵略军，从鸭绿江边推回到三八线以南，帮助朝鲜人民重建家园。这种成就和贡献，实在是太了不起了！让四万万五千万同胞高呼“毛主席万岁！”、“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更让毛主席高呼“人民万岁！”这是中国乃至世界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奇迹。

二是通过土地改革，把没收地主的土地分给农民。有人不了解情况，说土地改革发生血案，这种说法不对。当时土改跟清匪反霸一块儿进行，抓捕和枪毙一些土匪恶霸，是保卫土改工作顺利进行的必要手段。没收官僚买办资本，收归国有；对私有工商业进行改造，使工人、农民成为新社会国家的主人；他们通过劳动，使自己和家庭摆脱贫困，过上幸福生活。使得工农子弟，有了读书提高自身文化水平的机会。即是把教育大权夺过来，交给劳动人民。

三是改造旧社会，传播新文化。赌博、嫖娼、吸毒、械斗、反动会道门等等，封建社会的恶习，资本主义侵略带来的毒瘤，都被彻底清除干净。崇拜洋人、

古人的旧风俗，被崇尚英雄，讲究现实的新风俗所取代。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中涌现出来的英雄们，受到人民群众的崇敬和爱戴。以致后来出现的雷锋、焦裕禄、王进喜、草原英雄小姐妹，还有南京路上好八连等等，都能够成为人民心目中的学习榜样。个别人对某些具体人，或者个别事，可能有不同看法。但这不影响人们崇尚英雄，关注现实，这已经成为全国人民的共同心态。

但是，真正的共产党人，不屑于用成绩掩盖不足；更不会拒绝承认自己所犯过的错误。十七年当中出现的最大错误，就是有几次左的思潮。

第一节 对农业合作化运动的认识

土地改革的整个过程，工作队掌握政策相当平稳，基本上不存在成份认定偏高等左的问题，更没有随意杀人。所镇压的少数坏人，都是有真凭实据的反革命分子。对于抗日和反蒋有功的剥削阶级家庭成员，该照顾的还给予适当照顾。

从地主那里没收土地，分给无地少地的贫苦农民，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积极性，国内农业形势一片大好。

但是农民单干决非长久之计：劳动力弱的家庭生活困难；农村青年参军的、参加其他革命工作的，家属得不到照顾。单靠农民一家一户，很难抵抗自然灾害。正是面对这样一些具体问题，党中央号召农民走集体化道路。这既是学习苏联，更是继承了当年抗日根据地的优良传统。当时流行的歌剧《南泥湾》、《兄妹开荒》等，就是描写抗日战争时期，后方的大生产运动。一开始是组织互助组，由临时的渐渐发展成为常年的。农民通过在劳动中的互助合作，相互传授农业生产经验和技能，增进友谊和了解，相互关心。农民对人民军队的热爱，对党组织和人民政府领导的信任，都在劳动互助中得到增强。但是，互助组不改变生产资料所有制，不属于社会主义性质，即仍然是新民主主义社会。大约到1953年，开始由互助组转为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1954年至1955年上半年，是农业合作化运动的第二阶段，初级社在全国普遍建立和发展。1955年下半年至1956年底，是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第三个阶段，由初级社而渐渐形成高级社。这是一个生产资料所有制，由个体私有渐渐变为集体所有的过程，也就是对农村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过程。

对于当年的农业合作化运动，应当进行具体分析：

这一**运动的成绩是主要的，也是巨大的**。分散的、个体经营的农户，以私有制为前提。由于生产资料（包括土地、水、肥、农具等等）全部归个人所有，私有观念逐渐加重，久而久之会出现两极分化，难免出现新的剥削！果然如此，革命先辈们的血岂不是白流了？打倒一个黄世仁，又出来一批新的张世仁、李世仁之类，我们就倒退回到旧社会去了！渐变式消灭土地私有制，保卫革命成果，是最主要的成绩。农业

生产发展，也给工商业发展和城市建设提供了强大推动力。

在承认成绩巨大的前提下，也存在一些问题，以后在党内引起了争议。

当时，党中央计划十五年完成农业合作化运动，这主要是考虑客观存在的困难：现有农村干部没有工作经验、干部文化水平很低，合作社的干部培养需要时间、农业生产水平还比较低。根据生产力发展水平决定生产组织形式，即生产关系的原理，合作化发展不宜太快。但是在中央编发的介绍农业合作化运动的书上，常常出现毛主席亲自撰写的按语。这些按语都是鼓劲的，没有一篇是告诫大家要冷静、谨慎，需要注意什么问题的。受批评的总是所谓“小脚女人”们，他们认为合作化运动搞得太快了。这些受批评的同志出于好心，生怕步子迈得太快会出问题。他们也是根据中央决定，在组织原则上并没有错。知道这些情况，有一部分同志可能会认为中央农村工作部领导（廖鲁言、陈正人等）保守，思想不够解放。而另一部分同志则认为：最高领导总是这样催促、批评，后面发生的农业合作化运动过急过快问题，就是必然的！老人家对这件事情负有责任啊！

这种不同意见的争论，很有代表性。从互助组发展到高级社，仅用了三年半时间，确实太快。但是我们对比一下解放战争，也就是三年半时间，解放了除台湾、港、澳等以外的其它全部国土，建立了新中国。快慢只是相对概念，所以说，如果不对农村工作部，还有支持他们的少数中央领导同志提出批评的话，毛主席这种临战督促就不会产生副作用。凭毛主席的个人魅力，加速了农业集体化进程，这不是坏事。因为中国广大农民对“伟大领袖”的信赖和服从，是一种团结的精神力量，是以后“继续革命”的强大推动力。

以后的人民公社化过程，情况就复杂得多了。

人民公社的特点是“政社合一”，把乡、村政府的所有职能，甚至民兵组织、妇联、贫下中农协会、学校、社办企业，各种行政和事业单位都合并到人民公社中来。人民公社不再是单纯的生产组织，而是把社员的一切方面，包括后来的计划生育，民兵训练、上学、招工、参军，办户口，甚至政治运动，都统一管起来了。——这真是前无古人，想一点纰漏也不出就实在太难了。“工农商学兵，统一好领导”，说起来好听，实际管理起来真难哪！

在农业合作化和人民公社运动中存在的问题，在前面第一章最后部分，有更详细的论述。这里为减少重复，特意少说。

第二节 反右派斗争

1957年在全国开展的“反右派斗争”，让左的思潮流向全国各部门各行业。

批评农村合作化运动“过急过快”的党内一些同志，并没有被打成右派，是因为有别的更显得“政治性强”的问题存在。反右斗争到后来按百分比下指标，实在是荒唐之极。少数单位领导打右派不狠，不积极，右派数达不到比例要求，领导就找那可打可不打的人，做思想工作，说：“为了完成上级下达的反右派任务指标，就请你当个右派吧！”这种极其荒谬的事情，是真实存在。

举一个反“右派”的例子，更能说明“左”的本质。如冯白驹同志是“红色娘子军”的上级领导，即海南“琼崖纵队”的上级负责人。正如我们在第一章说过的，他向广东省和中央大胆提出海南单独建省的建议，就因此而被打成右派，说他是搞地方主义，闹独立性，等等。如果海南建省能早三十年的话，台湾和南海形势就会完全是另外一种样子了。

南昌柴油机厂有位厂长，反右斗争开展起来以后，看到厂里很多技术干部被打成右派，他想不通，就给邓小平同志写信，提出自己的看法，认为技术人员都打成右派，柴油机厂非停产不可！他是邓小平的老部下，但万万没想到：邓小平把这封信转给了江西省分管反右斗争的省委书记白栋材，并批示说：“谁说没有右派了？写这封信的人不就是个右派吗？”白书记没有办法，只好找这位厂长商量，你就当个右派吧！他也就这样被打成了右派。

“反右”斗争中种种荒诞不经的事情，是极左思潮泛滥的必然结果。但这决不是说，所有的右派都是被冤枉的，都要平反昭雪。这和以后“文革”当中的情况有所不同。全国最主要的知名右派中，既有真右派，也有被冤枉的假右派，更多的是对待所谓有些“缺点错误”（本质上是不同的政治意见）的同志，硬要上纲上线，人为拔高，把他（她）变成了右派。刘少奇、邓小平，在反右斗争中都很积极，所以有些人对于批评毛泽东同志犯了左的错误不服，也是有原因的。但刘、邓都属于“积极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中央干部。听话，不等于正确，在反右斗争中这一点表现得非常突出。但是大多数中国人不这样看，而是认为“听毛主席的话”就是好干部！连毛主席的话都不听，你就不是好干部！学习雷锋最主要的要求是：“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做毛主席的好战士！”

第三节 反对“右倾机会主义”

反右倾实际上早就开始了，只是在1959年庐山会议上反对所谓的“彭黄张周反党集团”，才把问题突显出来。原先的“反右倾”，都是作为党内矛盾看待，跟反击“猖狂向党进攻”的“右派分子”不是一回事儿。称为“反党集团”，就是想把内部矛盾变成敌我矛盾。庐山会议上中央意见实际并不统一，多数同志对于彭总的“万言书”中的内容“深有同感”，只是对这种写信的方式有看法：怎么这样不给毛主席留面子呢？如果你是毛主席，接到这样的帖子你说怎么办？

问题的复杂性恰恰就在这些地方。这也就是所谓“中国特色”——长达数千年真正深入人心的封建主义“教育加养成”，怎么可能一朝革命成功就清除得干干净净呢？这种结果很难避免，因为中国没有经历过真正的资本主义革命洗礼。通过选举，让自己不喜欢的官老爷下台，这种事情中国人几千年就没有干过。所谓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实行的并不是资本主义政治。其主流政治仍然是极端的封建主义，我们称蒋先生是独裁统治者，说明其政权的封建主义性质。

在农业合作化运动中，站在中央农村工作部后面的中央领导，是朱德、陈云等同志，毛泽东同志就把他们说成是“老机、老右”，“右倾机会主义”。后来，毛泽东同志提出要准备打仗，朱德说世界大战几十年内打不起来，不赞成所谓“三线建设”。毛就批评朱说“你是总司令还这么右倾！”可见内心深处还是把他当作同志之间有不同意见看待。经过1958年大跃进的“瞎折腾”，破坏生产；大炼钢铁，浪费人力物力和各种资源。彭德怀同志回乡调查，看到的实际情况，触目惊心，才愤然写下“万言书”，所述事实都是真实的，仅仅是口气有点儿重。有人认为他“不合时宜”，因为毛主席已经开始反左了，你还写万言书干什么？这种看法的实质，是要求彭老总等人“保护毛主席的尊严”。在庐山，彭、黄、张、周因讲真话而挨整，开创了党内因提意见而被打成“反党集团”的先例，形成了以后在政治运动中辨别是非的唯一标准就是：“谁反对（？）毛主席谁就是反革命”。

这种“唯毛独尊”的局面，决非一时形成。早在1954年出现的所谓“高饶反党集团”，就是个突出的例子。只是其性质被确认得太晚，对人们心灵冲击不够大。当时饶漱石的父亲饶思诚在江西省当副省长，我和饶爷爷谈到他儿子的事情，老人家心中很是难受和委屈。现在所谓“高饶反党集团”案，已经彻底查清，纯属冤案。2015年，纪念开国元勋高岗同志诞辰110周年座谈会在北京举行，说明早就给他们彻底平反，恢复名誉了。2009年8月29日，赶在建国60周年庆典前，高岗铜像在陕西省榆林市横山县高家沟的高岗故居前揭幕，以纪念其诞辰104周年。

那么，这样荒唐的“反党集团”是怎么形成的呢？实际上是在1954年2月党中央四届四中全会上，周恩来按照毛泽东的指示，揭发了“高岗饶漱石反党集团”10个错误，陈毅讲了8个错误。饶漱石只承认自己批评了刘少奇，高、饶的确对刘少奇同志有些意见，说自己根本没有“反毛”。大家都说他“反毛”，他自己不承认也不行，所以后来网上的评论文章说，这就是“墙倒众人推”呀。这件事没有广泛宣传，所以不如1959年庐山会议影响那么大。不宣传也是给一些人留面子的意思，留面子即背离历史唯物主义，不那么实事求是。

林彪后来之所以会无耻地吹捧毛泽东，搞什么“天才论”，不正是从所谓的“彭黄张周反党集团”事件中吸取了“经验教训”吗？由此而产生的错误认识，可能出现两个方向：其一，所谓“右派”，提出毛主席大搞个人崇拜，一言堂，走极权主义道路，根本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其二，所谓“左派”，就会强化“任何对毛主席的批评都是不能允许的！”“因为我们的思想水平比毛主席差得太远，只有努力学习的份，没有说三道四的资格。”或者如当时人们常说的“不理解也要执行”。果然如此，一定会出大问题。出了问题又算谁的呢？后来的解释就是：“毛主席的经打得好，只是让一些歪嘴和尚给念歪了。”这是当时流行的说法：无论如何，毛主席是不会犯错误的！这不是“神化领袖”又是什么呢？尽管某些“左派人士”可以不承认这个结论，但这就是不折不扣的历史唯心主义！是反马克思主义的观点。

实际上左、右两派的意见都是错误的。可是让不懂辩证法，更不知系统论为何物的多数中国人选择立场，就太难了！所以很多人不左就右，不右就左。

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渡过了困难时期以后，经过“四清”、“五反”运动的准备，毛泽东同志才想出了用“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办法：发动和充分依靠人民群众，解决领导干部队伍中居于关键岗位的“少数走资派”的问题。

第四节 从“五反”、“四清”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所谓“五反”，是从对官僚资本主义进行斗争时的“三反”、“五反”运动延伸过来的。三反是指“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五反是指“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窃国家资财、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运动。”前者主要指管理机关的干部和工作人员，后者则是针对私营企业主。

把这些内容说成是“反对资本主义”，已经很勉强了，因为谁想靠这种办法建设起资本主义大厦，根本不可能！换言之，这些东西即使是在真正的资本主义国家，也完全违法！至于追究与不追究？则是另一回事：要看是否损害大财团利益？如果损害了掌权大财团的利益，必定会追究。现在的西方世界，对于行贿之类都是两套标准：说你犯法你就犯法，说你合法你就合法。

“三反”、“五反”也属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一部分。从时间上看，和农业合作化基本同期。

在“三反”、“五反”运动中，我们查处了大量的腐败分子，最典型的的就是刘青山和张子善。但也存在错误打击好人的反常事件：如爱国企业家卢作孚，他在抗日战争中做出过突出贡献：1938年武汉失守，他的公司贡献大量船舶转移战略物资，避免了日军轰炸造成损失。卢作孚还参加了1950年1月召开的全国政协第一届第二次会议。但是他在“三反五反”运动中也受到打击，被认定是“不法资本家”，在家中服

用过量安眠药，不幸离世。要在大轰大喻的形势下，发动群众搞“运动”，而不出现任何差错，不造成任何冤案，几乎没有可能。

1958年“大跃进”之后造成的混乱，加上天灾人祸造成的种种困难，无论在农村还是在城镇，都是一种极大的压力：有全国粮票却买不到粮食，我们跑野外的地质队员就遇到了这种情况。但是中国人民越是在困难面前，越会开动脑筋想办法。1959年底至1962年秋是所谓“三年困难时期”，在革命老区安徽金寨县发生了人民公社生产管理制度的革命，即“责任田到户”。

我在现场了解到真实情况，与后来广为流传的“包产到户”情况不同。

生产资料公有制没有改变，只是农业劳动管理的具体方式有变化。基本生产资料仍然三级所有，队为基础。从前社员出工不出力，是因为评工计分的方法不科学，集体下地劳动，只要出工都记工分，按劳动力等级而不是按实际工作情况记。都是乡里乡亲的，谁愿意得罪人去揭发那些干活不出力的人呢？这样干好干坏一个样，就压制了优秀劳动力的积极性，便宜了那些出工不出力的人。现在按家庭劳动力数、土地面积、位置和作物种类、水肥条件等等，由家庭承包作物品种、产量、产值等等，自报公议，由生产队集体公平评定以后，作为考核依据。投入成本由承包人自己掌握。超额完成任务者按比例奖励；未能完成任务者按比例处罚。剩余时间再摆弄自养家禽家畜。这样绝大多数社员增加了收入，生活得到改善，拍手叫好！详细情况可回顾第一章尾部相关内容。

1962年夏，我在金寨听到社员群众对安徽省委书记李葆华（李大钊之子）的一片赞扬声，完全出自内心。不过我问：中央有没有人支持李书记？社员的回答让我吃惊：有啊！朱总司令坚决支持李书记！然而当我回到南京以后，当时流传的则是另外一种说法：

刘少奇支持安徽农村搞包产到户，本质上就是分田单干！当时没听说刘少奇犯错误呀！？怎么能这样对待一位久经考验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呢？当时我因为在学校里介绍了金寨农村的实际情况，竟然受到上级党组织的批评。“讲真话就会犯错误”，让我这个党外“积极分子”在整个大学期间都不愿意提出入党申请。一个不准讲真话的党，还有希望和前途吗？还能领导中国人民走向幸福吗？

经过“三年困难时期”以后，农业生产恢复发展，全国农副产品供应正常以后，党中央开始在全国搞“四清”和“五反”运动。后来称为“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我有幸当了两届四清工作队员，前后跨1964和1965两个年度。

我在“四清”当中有深入地了解，才知道今天人们对“所有制”的执着是多么的肤浅和无知！公有制就

是社会主义吗？果然如此，还对农村公社大小队干部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干什么呢？苏联解体之前还不是标榜以公有制为主体吗？如果财产公有，而经营管理的权力私有，那就更可怕了！因为生产资料是公家的，浪费了不心疼。自己只管假公肥私，赚多少、赔多少都不担任何风险，真的比私营资本家要“爽”得多了！加上管理制度的“官本位”，什么事都是当大官的说了算，结果就成了“官匪一家”，社员群众还怎么过好日子？

农村干部基本上就这样，事过六十多年了，我想当时强调思想教育的重要性，也是事出有因。在农村，焦裕禄式的好干部实在太少，所以才会想到要树典型，号召基层干部向他学习。

但是，我们和安徽金寨“责任田到户”的情况比较一下，就不难发现最基本的道理：**人的思想是对现实和历史的反映**。对于现实和历史如何看，的确存在方法问题，但更多的则是直接感受。当了“官”，就可以少干活，多得好处，甚至不劳而获，你却大声嚷嚷：“我们共产党人不是要做官，而是要革命！”谁信哪！可是大队干部们要做领导工作，需要占用一定的劳动时间，不给记工分又不合理。这成为人民公社管理工作中的难题。公社干部属于国家编制的行政干部，按级别领工资比较好办。但公社干部职别以外的工作人员，也存在着跟大、小队干部一样的不方便记工分的难题。

我们四清工作队在农村的时候，对有私心的干部批评很严；对一心为社员的好干部，表扬也很认真。记得有个保管员不识字，就让老婆给缝制了几个不同颜色的布袋子，不同颜色袋子装不同的钱，决不错装。就这样当两年保管“零差错”，让我非常感动！

由此可见：**制度才是最根本**啊！具体管理制度不严格不认真，处处靠人情过日子。想当个好干部也难哪！

人民公社三级都有社员代表大会，有贫下中农协会（小组），究竟能不能真正发挥作用，完全是另外一回事！我了解到当时的情况，上述群众机构就是“摆设”——书记和大小队干部决定事情，基本上不考虑“贫协”的意见。四清工作队下乡就根本不同了，因为我们代表上级，至少是公社工作团下来的，大小队干部们就比较尊重我们的意见。那么，工作队走了以后会怎样呢？有人描述这种情况说：“工作队来了我们像老虎，工作队走了我们像老鼠”。“四清”运动结束以后，事后报复积极分子的情况并不严重，但干部作风立即恢复旧貌则是真实的。

依照我的想法，大队干部应该由国家补贴一部分收入，其余跟社员一样记工分，或者承包。生产队干部由公社公积金给予少量补贴，其余跟社员一样记工分，或者承包。把管理工作和正常田间劳动严格区

分开，干部表现好不好？好到什么程度？由他所领导的社员来评定，可能对管理科学化会有促进作用。

“四清”，或者叫“社教运动”搞了两三年时间，甚至更长。因为回到工作单位以后，正好赶上本单位“四清”——运动从农村搞到城市机关、单位来了。记得最初是由河北保定地委搞的，“四清”指“清工分、清账目、清仓库、清财物”，就是纯粹的管理问题。后来搞出来个前十条、后十条，以后合称“双十条”；再后来就出现了所谓《二十三条》。中央下文件都这么不慎重吗？为什么改了又改？我们工作队员也是学了又学，学习起来有困难，还要在晚上开会向社员传达讲解。真懂了吗？坦白说：我自己就不懂！

比如清“工分、账目、仓库、财物”被改成了清“思想、政治、组织、经济”，人在想什么你怎么知道？思想怎么清得了，只能是查某人有无反动言论和行动，是不是破坏集体经济，损公肥私？老的“地、富、反、坏”份子们，弄出来再批判斗争一番。对待“四类份子”的子女，都有政策问题，在农村情况很复杂：有表现好的，也有问题比较多的。特别是在三年困难时期，干了什么损害社员利益的事没有？违法没有？尤其是盗窃公物，投机倒把的事，公物私卖的事，一定要追究到底！

1965年1月14日中央印发《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提出的一些问题》（即“二十三条”）。这个文件是1964年12月中央工作会议上讨论制定的。它纠正了在农村社教运动中打击面过大等问题。首次提出了要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就点明了运动要向下一阶段，即“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转移。

第五节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1966年“五一六通知”下达，标志着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

现在流传出来的信息说明：在1964年底中央工作会议上，毛主席和刘少奇二人的矛盾就已经很尖锐了。当时传达“二十三条”的时候，说有人把农村严重的阶级斗争说成是“四清与四不情的矛盾”，我们工作队员也听傻了：“谁敢这么说？不讲阶级斗争了？”虽然没想到是刘少奇，总觉得这人官不小。不然，不会在中央文件里提到他。

文革一开始，就把斗争的矛头指向刘少奇，把王光美的“桃园经验”作为反面教材，更多的是批判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简称为“黑修养”。可是作为“革命群众”，我们也记得毛主席曾经说过一句话：“三天不学习，赶不上刘少奇”。这就真的是让“大人物”把像我们这样的小老百姓给搞糊涂了。

事情由姚文元攻击以彭真为代表的北京市委开始。步骤是先批判所谓“三家村”：邓拓、吴晗、廖沫沙。姚文元的《评“三家村”——〈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的反动本质》，发表于1966年5月10日

的上海《解放日报》和《文汇报》，《人民日报》等报刊都作了转载。这篇文章所以选择这个时机发表是为配合中央正在召开的五月政治局扩大会议，是为打倒彭真和中共北京市委班子而作炮火攻击用的。也是与同年5月8日发表于《解放军报》的江青写作班子署名高炬的文章《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开火》南北呼应、互相配合。

姚文硬说《三家村札记》是邓拓、廖沫沙、吴晗合股开办的一个黑店，邓拓当时担任《前线》杂志主编。姚文元紧接着从批判《海瑞罢官》开场，而戏剧《海瑞罢官》是北京市副市长吴晗的作品。姚文元的文章说“它是‘三家村’中经过精心策划的，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的一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进攻。”我记得清楚，姚文硬说《海瑞罢官》是影射1959年在庐山“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这样就把反党，反对毛主席的大帽子给这三位扣上了。批判“三家村”绝不只是要打倒邓拓、吴晗、廖沫沙，而是要摧毁以彭真为首的北京市委这个“大黑店”。文章还说：“不管是‘大师’，是‘权威’，是三家村或四家店，不管多么有名，多么有地位，是受到什么人指使，受到什么人支持，受到多少人吹捧，全都揭露出来，批判它们，踏倒它们。”

“三家村”冤案的直接后果是邓拓自杀，以死相抗。吴晗冤死狱中，他的夫人袁震被折磨而死，女儿吴小彦也被捕惨死，一家四口只剩下吴彰一个小男孩。廖沫沙在狱中受尽折磨，终于看到“四人帮”倒台，得以重见天日。至于全国因“三家村”而遭株连的各色人等，难以计数。

这三个人的后台，不用问就是当时的北京市委，而北京市委书记是彭真。加上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就成所谓“四家店”了。罗瑞卿是总参的头，陆定一代表宣传部，杨尚昆是中央办公厅主任。这四个人的总后台是谁？刘少奇不想当也不行。这些名单之所以至今还记忆清楚，是因为文革中宣传太多。杨尚昆后来说：“毛泽东认为我是教条主义者，又和彭德怀的关系密切，如果不撤掉我的中央办公厅主任职务，我将成为他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绊脚石。所以，他首先拿我开刀。”

从文化问题入手，才与文化大革命的名称相符。但毛泽东和江青、陈伯达等人的意图，是要通过文化问题进入政治，因为“要推翻任何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一方面搞三家村、四家店，一方面又在全国批“黑修养”。“修养”一书“黑”在哪里呢？说它“黑”，是因为它主张党员要做党的驯服工具，也就是“驯服工具论”。批“驯服工具论”就是要号召全国人民起来造反！造修正主义路线的反！造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反！造党内最大走资派的反！也就是把斗争矛头直接对准刘少奇！但这件事情有个很曲折的过程。

在讲起这个曲折过程的时候，原井冈山暴动大队大队长老英雄邹文楷，跟我谈心时说到：井冈山会师，毛主席只带了近一千人，而且多是农民和矿山工人，军事素养比较低，手榴弹不拉弦就扔。朱德带领了近万人，多是正规军，有南昌起义部队、湘南起义部队。由正规军在山上传授军事技术，红军才能战胜敌人哪！应当说朱德上井冈，救了井冈山，救了红军才对呀！他的这种说法与文革期间流行的说法大相径庭，但却让我明白了文革初期的反朱恶浪为什么会偃旗息鼓。

文革初期，我因为工作便利，经常路过北京。有次见到部队游行经过天安门广场，路经主席台时，军人们只向朱总司令敬礼！对于其他领导人谁也不理就走过去了！我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后来看到大街上由“人大三红”为代表的学生组织贴了不少反对朱德的大标语，用词相当恶毒。这才让我大吃一惊，因为我懂得“反军必乱”的道理。我知道了：部队的行动是针对这些学生的。

工作完了返回时，就见到红卫兵小报上披露，原来是这么回事：

毛主席南下湖南，把主持文化大革命的工作交给了留守在北京的刘少奇，由周恩来协助之。刘少奇很自然就想到毛主席关于党内走资派头子的说法：“资格最老...”，应该是指朱德吧？早就听说朱是冯白驹的后台，罗瑞卿带头搞“全军大比武”，抵制政治挂帅，朱德也是后台。庐山会议批彭德怀，朱德也反对。刘少奇没有这样讲，我是这样分析的，刘少奇就当傻瓜了。他和周恩来在北京主持“批朱大会”，把朱总司令当成了毛主席要打倒的主要对象。

会议进行到高潮时，毛主席从南方回来了。他坐在那里听他们讲，不插嘴。等到火候差不多了，有人讲朱德是“黑司令”的时候，他突然站起来说：“什么？你们说朱德是黑司令？那我不成了黑政委了吗？”这一下全场傻眼了：原来头号走资派不是指朱德呀？！不能不佩服周恩来脑子转得快，他知道风向不对，立刻大声批评人大“三红”说：“你们在大街上贴的大标语，怎么跟当年白狗子贴的大标语一模一样？”这个纲上得够高。人大“三红”的红卫兵赶快检讨，立马去把反朱大标语撕得干干净净。在毛泽东没回来之前，你难道不知道朱德是怎么回事吗？朱德入党还是你亲自介绍的呢！恩来呀！叫我们做晚辈的说什么好哇！周恩来在事实上也没能成为毛主席的“亲密战友”。1975年5月3日，毛泽东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当时周恩来已经因病住院。会上，叶剑英、陈锡联提出：“主席能否安排到医院探望一下周恩来？”毛泽东迟疑一下说：“我可不是大夫。”1975年9月28日，在医院第三次发出周恩来病危通知以后，叶剑英、李德生、朱德、李先念、许世友、陈锡联等联署上书毛泽东：“盼主席能到医院看望自己

五十年的战友。’毛泽东委托毛远新传话：‘我从不勉强别人，也不希望别人来勉强自己。’说明毛泽东对于周恩来，缺乏那种革命战友之间应有的感情。其实，黑政委一说，就是毛主席找了个理由。当年周恩来、张国焘都当过红军总政委。为什么不能反朱德？谁反朱德谁倒楣，因为老总在军队里威望极高，反朱等于反军队。这是刘少奇干的第一件大傻事。

第二件事，大家都比较熟悉，就是所谓派工作组进驻大学。

文化大革命初期，工人、农民、机关干部是不允许参加运动的。他们的任务是“抓革命，促生产”，意思是搞好本职工作来支持文化大革命。能够参加运动的主要是青年学生和老教师，再就是没有战备训练任务的军队。北大哲学系老师聂元梓，写出“全国第一张大字报”，成为北京五大红卫兵领袖之首。她的大字报就是反对派驻大学的文革工作组的。后来，派工作组成了刘少奇“镇压革命造反派”的“铁证”。刘少奇以为“反右斗争就是这么干的”，由上级党委派出工作组去控制或主持运动。没承想，文革中再搬老办法行不通了。

毛的办法就是“放手发动群众！”声称：“群众运动是天然合理的”，那怕挂牌子游街，剃阴阳头，抄家，甚至后来发展到公开的打砸抢，都屡见不鲜。后来问题严重了，中央就下文件坚决制止。造反派都那么听话吗？不！我在接受批斗的时候，中央文件不准挂牌子，造反派就立一块牌子在我胸前。造反派认为：牌子没有“挂”在被批斗对象脖子上，就不违反中央规定。

做了这两件傻事，得罪了军队，得罪了造反派，刘少奇算是“死”定了。全国各界一律要参加文革运动那是后来的事。如果刘少奇不做这两件傻事，是不是就逃得过去呢？照样逃不掉！可能过程会曲折一些，但毛、江、陈等人决心除掉刘少奇，什么方法都可以使得出来！刘少奇自己也说过，大意是：如果是我的问题，把我撤职了不就完了嘛！为什么要这样折腾呢？毛没有回答。

刘少奇作为司令，不可能只有彭、陆、罗、杨那么几个角色。最后是把“打倒刘少奇、邓小平、陶铸”的口号喊出来了。刘、邓作为正副司令，陶为“参谋长”，这个司令部就齐全了。

我是地质东方红战士。年纪比王大宾大，却成为他的部下。可是我的父亲，延安时代的党中央社会部特别交通科科长，（电视剧《潜伏》中的秦科长）就在1969年初，被当作“陶铸一伙”，在退休后住地江西省九江市被活活迫害致死了。文革中人人争当保爹保妈派，我却保不住自己的爹妈。妈妈在九江被批斗的理由是“刘少奇是叛徒，王光美就是特务”，所以“你老公是叛徒，你就是特务”。中央专案组的军官找我谈话：“作为可以教育好的子女，你一定要跟你

爸爸划清界线”。我就年年进京告状，向接待站反映情况，永远也划不清界限了！后来，我找到有关中央领导人家里反映情况，中央这才下文件给我父亲平反。

作为造反派成员，我并不后悔；也始终没有退出地质东方红，或者参加保守组织之类的举动。这又是为什么呢？难道是怕保守派看不起自己，不要自己吗？当然不是！据我了解，一个省或者大的地区，两大造反派之间的矛盾，比造反派与保守派之间的矛盾要大得多。辽宁省甚至有三大派，“辽革站”在群众心目中就是保守派，可是中央文件并没有这样定。“辽联”和“辽大八三一”，是一般认为的造反派。这样的三大派，关系更复杂而已。江西就不一样：造反派内部有涂烈派和万里浪派，两派斗争比它们跟保守派的矛盾要更尖锐些。这个原因是：在成立革委会时，只有造反派头头才能被结合，保守派无权进入革委会领导班子。文化大革命的本质是争夺政权。谁掌权了，谁就说自己代表无产阶级，被打倒的一方，就被说成是代表资产阶级。实际情况不仅极其复杂，而且在斗争过程中充满算计和谋略。所以，只要你比较傻，没有足够的谋略，就永远成不了无产阶级！

有人认为，毛泽东要选江青作为自己的接班人，这是不了解实际情况的瞎猜。毛对江青的性情狂妄，缺少谋略很了解。让江接班，就是让她破坏自己的名声和事业。但是把这种慎重，看作是毛主席无私的表现，则是另一种偏颇。

使我至今想不明白的是：毛泽东为什么要选邓小平做自己的接班人？

邓作为资产阶级司令部的“副司令”，在我们造反派心目中，是不可能成为毛主席革命事业接班人的。而且他老人家还说过，邓小平“永不翻案靠不住啊！”可是，我们敬爱的领袖毛主席一而再，再而三地做我们造反派的思想工作，说邓小平政治思想性强，是钢铁公司等等，讲了许多好话。出于对毛主席的热爱和信任，我们很不情愿地认可了主席的安排。

所以，把华国锋尊为“英明领袖”，就是个政治笑话。抓捕“四人帮”以后的反反复复，仅仅是等待邓小平出来掌握全局的一个过程而已。

要说明造反派之间的矛盾更大，还可以看看以江青为首的“四人帮”，跟以林彪为首的“军事俱乐部”之间的矛盾。1971年的“913事件”，真相至今成谜。怎么就搞不清楚呢？档案不能公开，当然搞不清楚！给江青同志的信，究竟是不是伪造的？那架飞机为什么掉下来？是被导弹打的吗？我想，所有这些谜团，都跟江、林双方的斗争有关！但是，这些都只是我的猜测，等待将来验证吧！

还有一个不清楚的事情是：1975年1月，辽宁海城地震。是世界迄今为止，唯一的一次有准确预报，并组织群众及时躲避灾难的地震。专业部门提出可

能发生地震的种种迹象，在辽宁省委讨论要不要预报的时候，只有省革委副主任毛远新一个人坚持要求马上预报。他之所以敢坚持，是因为他懂物理学，知道这些地震前兆意味着什么。所以人们说：毛远新功德无量，至少救了十万人的性命！关于地震级别和损失情况，与1976年夏天发生的唐山大地震对比一下就清楚了。二者在网上都有详细资料，这里不再重述。我提出的疑问是：

人们都说毛远新和江青集团是一伙的。但是，毛远新做出这样重大的贡献，掌握新闻大权的张春桥、姚文元一伙为什么一个字也不报导呢？网络上所有的说法都不具有说服力！唯一可能的解释就是：“四人帮”一伙惧怕毛远新的声望超过自己，他们就失去了在毛主席去世之后掌握中国党政大权的机会。

第六节 对主要争议问题的讨论

这里只讨论两个主要争议问题：其一，你说以阶级斗争为纲是错误的，怎么解释“前三十年”所取得的惊人建设成就？其二，对于“文革”中的冤假错案到底应该怎么看？

说“前三十年”是以阶级斗争为纲，包括了后十二年当中的最后两年。“以揭批‘四人帮’为纲”，本质上也是以阶级斗争为纲。华国锋等人“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而这个“道”本身并没有改变。由此造成的问题也相当难办：说林彪一伙是反革命，是因为他们一伙要谋害毛主席，要投奔苏修，自然是反革命。说江青一伙是“反革命”，有些说不通呵！江青是主席夫人哪！她怎么反革命了？她执行的一套极左路线，打击一大片，把不少人民内部矛盾当敌我矛盾处理，本质上是“过分革命”了！对两个集团不加区分，统称反革命集团，除了在逻辑上说不通，就是极其不利于对极左思潮的批判和清理。这样，也引起了对江青本人有一定同情心的一些同志的不满。在中国人民内部，产生了反对江青与同情江青的两种思潮的对立，结果极其不利于团结。

当然，我们废除传统的革命观，采用孙中山先生的革命观：**革命是追求进步的事业**，从阻碍社会进步的角度看，说江青一伙是反革命，这样就说得通了！因为极左思潮本身就是社会进步的阻力。可惜，我们至今还没有承认并接受孙中山先生革命观的指导。

对于孙中山先生的革命观，我们虽然没有公开表示接受，但在对待具体问题的认识上，我们还是将其与“马列主义”结合起来了。所谓“抓革命，促生产”，就是将“革命”所迸发出来的热情，用于追求社会进步和发展上。

既然如此，我们在建国后的“前三十年”，取得经济和国防建设的伟大成就丝毫不奇怪。1964年10月16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在新疆罗布泊爆炸成功。1967年6月17日，中国自行设计、制造的第一颗氢弹在中国西部地区上空试爆成功。从第一颗原子弹

试验成功到第一颗氢弹试验成功，我国只用了两年另8个月时间。“东方红一号”卫星，是中国发射的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于1970年4月24日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成功发射，由此开创了我国航天史的新纪元。我们在野外工作中还收听到了中国卫星播放的歌曲东方红。

至于具体的经济社会发展成就，谁也不能否认。因为建国初期的困难和在各方面的落后，是全国人民公认的。没有共产党的领导，根本不可能翻身。前三十年给后四十年经济社会发展打下了基础，提供了可能性。

我们现在逐渐积累起来的国防实力，如三艘航母逐渐下水等等。还有航天事业的高速发展，都是科技和工业实力增强的外在表现。追求某些数据还不如多看看这些具体事实。

那么这样说，以阶级斗争为纲不是更好吗？何必要废除它呢？这就是需要认真讨论的第二个问题：如何看待文革中产生冤假错案？

以阶级斗争为纲，必然产生大量冤假错案吗？我的回答是必然的！

因为在我们的政治生活中，阶级斗争只是其中一部分，不是全部。“在阶级社会里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这样一套上就完蛋了，一切都阶级斗争化了。比如说，年轻女同志打扮得漂亮一点，就成了资产阶级思想，好像无产阶级就只能穿粗布衣裳。爱美是人的天性，居然也不承认了。什么事情都往阶级斗争上套，出身不好的同志跟人吵架、打架更不得了，扣上“阶级报复”的帽子是常有的事。如果出身好的同志，羡慕国外的高水平生活，更是向资产阶级投降。就是时时处处用这样的思维方式，对待同学、同事、同伴，对待整个社会，能不让极左思潮泛滥成灾吗？把阶级斗争等同于政治的思维，让极左思潮成为常态，人们天天生活在惊恐之中，社会何以安定和谐？人民团结一心也就成了奢望。

如果接受中山先生的政治观，结果就不会这样。社会管理才是政治啊！首先看阶级关系，阶级合作乃是阶级斗争产生的前提：如果两个阶级没有合作关系，八杆子搭拉不着，它们怎么斗争？凡是斗争都是在合作过程中产生不公平导致斗争。但更多的阶级合作不产生斗争，例如工农合作，工农和知识分子的合作等等。总体上看，在人类社会，阶级合作所占据的比重、拥有的品格和机会，都远远超过阶级斗争。我们在实际政治生活中，也是把组织、宣传工作看成“政治”。宣传部、组织部就是政治部下属常设机构。总之，把阶级斗争当政治，是把个性当共性，把个别当一般，是一种思想方法上的片面性。

具体争论“文革”中一共有多少冤案，冤枉人到了什么程度？或者张三、李四是不是冤案？没有多

大意义。正如今天贪污腐败严重的情况，必须老实承认！争论个别案子的细节没有多大意义一样。

通过对这两个问题的讨论，我们应该得出什么样的经验教训呢？这里可以吸取的经验教训太多！只要敢于并善于思考，我们一定会从中得到很大的教益。

过去我们说：私有制是万恶之源。但是，从原始公社到私有制形成，是生产力发展的必然结果，是社会进步的一个不可或缺的环节。再者，私与公是相比较而存在的；没有私，就无所谓公，没有公也就无所谓私。所以，归根到底，**思维方法的片面性才是犯错误的根源**。文化大革命要求“狠斗私字一闪念”，要“大公无私”，结果呢？为“后四十年私念泛滥成灾”开了路。因为这些说法脱离实际，与现实不对号，不可能不走向反面。所以，最“革命”的口号，不一定是最好的口号，而只有最实事求是的口号，才能深入人心，教育人走正道。例如，“只有国家富强了，我们个人和家庭生活的幸福才有保障”，这样的口号就深得人心。今天中国人出国旅游的多了，到国外去的中国游客不仅受到了欢迎，更受到尊重。不久前到济洲岛一游，发现风景点和旅社的中文说明甚至比英语说明要多。韩国可是被我们看作是美国佬的“小弟”哟！

再者，如文中所说，“大轰大嗡”的所谓“群众运动”，一定不会有什好结果，今后再也不能这样去“发动群众”了。要调动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就必须向群众“交底”，不但要清清楚楚地说明事情的前因后果，更要把这件事情和群众的切身利益关系讲明白。一旦人民群众被“糊里糊涂”地发动起来了，什么样的社会灾难就都有可能发生。

具体地分析具体的情况，是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我们犯错误，恰恰是丢掉了这个“活的灵魂”，采用了简单类比的思维方式。

第七章 改革开放以来的得与失

虽然一般认为，1978年年末开始实行改革开放，但具体时间较难确定，所以有些人就说是毛泽东时代确定了改革开放的方针。例如，毛泽东与美国总统尼克松的第一次会见，是在1972年2月21日，两位领导人就中美关系和国际事务认真、坦率地交换了意见。28日，中美双方在上海发表了《联合公报》。这标志着中美两国关系开始走向正常化。尼克松在中国逗留7天，被称为“改变世界的一周”。尼克松访华被誉为中美外交史上的“破冰之旅”。7年之后，即1979年1月1日，中美两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作

为“后四十年”的开场锣鼓，也是毛泽东他老人家给打下的基础。

这样看问题，不是要把对外开放功劳算在谁身上的问题，更不是要对毛、邓两位领导人进行褒贬，而是说没有前三十年打下的基础，就很难有后四十年的成果。这种认识符合辩证法，也反映实际情况。辩证法承认事物在时间上的连续性和前后相关性。

但是，由于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我们发现和处理的贪官污吏越来越多，抓捕这些坏干部甚至达到了“空前”地步。巨大的“反腐败成绩”除了震惊国人，更让人心情十分沉重：这是为什么呢？我们的经济建设不是已经取得了很大成绩吗？有些人甚至“怀念前三十年”，对改革开放的正确性产生质疑。例如，认为随着对外开放，国外资本主义的污泥浊水都渗透进来了。我们中国不受资本主义思潮影响，保持革命本色，这可能吗？人们的思想矛盾着，斗争着，中国人对后四十年看法的分歧，可能比对前三十年的看法分歧更加严重！

从逻辑上说，否认改革开放的正确性，而又说改革开放是从毛泽东时代就开始了。在认为毛主席伟大正确的前提下，这两种说法属于“自相矛盾”。如果承认改革开放的正确性，又如何来说明当前贪污腐败的严重性呢？这是通过本章叙述想要重点说明的问题。

第一节 党的主要领导人更换的原因和过程

在邓小平出来主持全党全国工作之前，由华国锋同志担任中国党、政首要领导人。以后，中央主要领导岗位人事变动比较频繁，如果从1979年初，或者实际从1976年抓捕“四人帮”开始，人事变动情况如下页列表所示：

从表中我们发现一个突出事实：

邓小平从1977年主持中央工作以来，一直到1989年“六四事件”以后，江泽民担任总书记期间，实际上都没有离开领导岗位。华国锋1981年的辞职，赵紫阳1989年的被撤职，胡耀邦的职务变动，这背后都有邓小平所起的作用。这就是人们常说的老人干政。在这种情况下，名义上的党政“一把手”，不可能充分发挥自己的领导工作能力，贯彻自己的政策方针。这样，从粉碎“四人帮”开始，到邓小平去世的1997年，在这么长一段时间内，中国的党、政、军权，实际都掌握在邓小平手里。所谓“后四十年”的功过是非，邓小平在前十九年当中都有份。中央领导职务变动如下表：

年份（月、日）	领导人姓名	职务	变动
1976, 2	华国锋	第一副主席	10月粉碎四人帮
1976, 10	华国锋	主席、总理	
1980, 9	华国锋	辞去总理	1982年9月, 改任
1981, 6	华国锋	辞去主席	常委、副主席
1980, 2	赵紫阳	4月副总理	9月总理
1981, 6	赵紫阳	副主席	
1987, 1	赵紫阳	代总书记	11月总书记
1989, 6	赵紫阳	撤销总书记	撤军委副主席
1998, 3	朱镕基	总理	此前任副总理
2003, 3	朱镕基	离任总理	2011,9 出书
1975, 1	邓小平	主持中央工作	副职代周恩来
1977, 4	邓小平	恢复原工作	反对两个凡是
1978, 3	邓小平	全国政协主席	真理标准讨论
1978, 12	邓小平	召开三中全会	决议反映民意
1979, 1	邓小平	访问美国	
1981, 6	邓小平	六中全会	决议否定文革
1982, 9	邓小平	军委主席	兼中顾委主任
1983, 6	邓小平	国家军委主席	
1984, 12	邓小平	建国 35 年阅兵	裁军百万收回香港
1986, 11	邓小平	批准 863 计划	
1987, 1	邓小平	军委主席	反对自由化
1989, 6	邓小平	六四事件	接见戒严部队
1991, 1	邓小平	辞职 (90, 3)	南方视察
1989, 6	江泽民	总书记	
1989, 11	江泽民	军委主席	仍兼军委主席
1990, 3	江泽民	国家军委主席	军委主席,
1992, 10	江泽民	总书记	总书记, 军委副主席
1998, 3	江泽民	国家主席	
2003, 3	胡锦涛	国家主席	

所以，人们称前三十年是毛泽东时代，后四十年是邓小平时代，虽然有些不够准确，但本质上不错。邓小平去世以后，他对中国的影响还在，只是比毛泽东的影响时间短，程度轻些而已。

后来的党章、决议，更常常把“邓小平理论”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并列起来，放在后面，更说明邓小平对中国党、政府、军队和人民影响巨大。

我为什么说对于“后四十年”的看法，在中国人当中分歧更大呢？如果“后四十年”到 2018 年结束，至 2024 年，刚刚过去还不到六年，人们还来不及进行讨论、比较和深入思考，分歧不可能消除和淡化。所以，分歧就保存下来。

邓小平能主导领导成员的更换，跟毛泽东和周恩来在文革后期对邓小平极力推崇，在全国人民心目中造成的很大影响有关，但更多地还是出于民心。邓小平 1975 年 1 月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

理、中央军委副主席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他之所以会有这么高的威望，跟周恩来病重以后，他实际上主持党、国家和军队的日常工作，对“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混乱局面进行全面整顿，并取得显著成效，得到全国人民的衷心拥护有直接关系。他 18 岁就参加革命，他的革命资历，在当时仅剩的少数党政高层领导人中，也只有叶剑英、陈云、李先念等能与之相比。

在文革后期，特别是 1971 年林彪摔死在蒙古国温都尔汗的“九一三”事件以后，国人普遍质疑“文革”的正确性。1976 年 1 月 8 日，人民抱有极大敬意和希望的周恩来总理，因病逝世。11 日下午，为周恩来送行时，百万群众冒着寒风久久伫立在首都的十里长街两侧，不忍离去。15 日，党和国家领导人及首都各界群众代表 5000 余人，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周恩来追悼大会，由邓小平致悼词。是年 4 月，北

京发生悼念周恩来、反对“四人帮”的“天安门事件”，被文革的支持者称为“右倾翻案风”，邓小平因此被撤销一切职务。这又让邓小平获得很高的同情分，他在中国人民心目中的好感和威望，可以说是“四人帮”一伙大搞“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时称“批邓反右”）给抬起来的。

至于邓小平怎样对待全国人民的信任和希望，则是另一件事。

网络介绍称：他创立了邓小平理论，所倡导的“改革开放”及“一国两制”政策理念，改变了 20 世纪后期的中国，也影响了世界，因此在 1978 年和 1985 年，曾两次当选《时代》周刊“年度风云人物”。他被称为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

迄今为止，还没有看到谁公开反对“改革开放”和“一国两制”。对此二者“持不同意见者”，往往不敢张扬，只在背后嘀咕。而人们比较反感而且经常公开非议的“邓小平理论”，则是指“摸论”和“猫论”。前者指“摸着石头过河”，后者指“管它黑猫白猫，抓住耗子就是好猫”。

“邓小平理论”的特色是通俗化，不讲成篇的大道理。但也正因为如此，它缺乏严密地逻辑论证，有比较强的主观随意性。

1977 年 4 月 10 日，邓小平致信中共中央，提出必须世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中共中央批转此信，肯定了邓小平的意见。5 月 24 日，邓在同中央两位有关负责人谈话时指出，“两个凡是”（即“凡是毛主席做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不符合马克思主义；一定要在党内造成一种空气，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特别是他主导批准发展科技的“八六三计划”，对于国家科技进步极为重要。

对“两个凡是”的批评，也应属于邓小平理论的组成部分。“两个凡是”是华国锋同志提出来的，也有人说是汪东兴。汪东兴不是最高领导，不可能产生这么大影响，还公开登在报刊上。与反对“两个凡是”有关，邓小平还要求“完整地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提出“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是毛泽东倡导的作风中的最根本的东西。”这一态度立场鲜明，赢得了全国人民的尊敬和支持。

但是，正因为邓小平理论缺乏严密的逻辑论证，有相当程度的主观随意性，在理论界和人民群众中，都产生了不好的影响。

“摸论”，实际上否认了理论探索的重要性；容忍了决策的盲目性和主观随意性。毛主席早就说过，要过河，先要解决桥或船的问题。如果水太深，流动太急，或者是黑夜，你怎么摸着石头过河？争论的本质，在于“邓大人”是否轻视理论准备？从改革开放的实际过程看，的确存在着理论准备严重不足的问题。例

如：我们究竟为什么要搞市场经济？为什么要跟国际市场接轨？在这个过程中怎样才能实现独立自主，以我为主，不被别人牵着鼻子走？这些要害问题在理论上长期没有搞清楚。邓小平理论，就是不讲理论的“理论”。所以，对邓小平有意见的人，并不完全都是坚持左的路线，拥护“文革”的人。

所谓“猫论”，本质上就是一切向钱看。不管用什么办法，能赚钱的就是好办法。你策划得再好，说得再漂亮，最后赔钱，谁听你的？

这四十年，不能说全部，说基本上是坚持上述“两论”走过来的。为什么不是“全部”？因为从胡锦涛同志主政以来，对于“邓两论”坚决抵制。江泽民同志执政时，因为邓小平还健在，情况比较复杂。至于在胡、温之后，坚持文化治国，基本上摆脱了“邓两论”的束缚。

如果说邓小平强调毛泽东的实事求是和群众路线作风，是对国人如何正确学习和对待毛主席本人和毛泽东思想，提出了一个非常好的方向性的指导意见。那么，“邓两论”则反映了他本人对于理论采取了“实用主义”态度。这种态度与他的上述指导意见相抵触。怎样区别实用主义和实事求是？这是被理论界长期忽略了的重要课题。

我们可以，甚至必须，用邓小平同志思维内在的矛盾性来解释和说明，“后四十年”发展中所存在的矛盾性；即它的突出成绩和严重问题，也正是邓小平思想自身存在矛盾的外在反映。

第二节 胡锦涛同志的理论贡献和“胡温十年”

在说明这个问题之前，必须先介绍一下江泽民同志所起的特殊作用。

江泽民同志 1989 年 6 月在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委员会总书记。1997 年 9 月 19 日在中共第十五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委员、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央军委主席。1998 年 3 月 16 日在第九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邓小平逝世之前，江泽民同志在工作中必须尊重邓小平的意见，一直到邓小平因为健康原因不能表示意见为止。这种最高领导上面还有领导的情况，是那个时期中国政坛的特殊风景。江泽民要恰当地应对这种情况，又要做好日常工作，实属不易！

用大白话说，就是要在邓小平领导下纠正“邓理论”给中国政治所带来的缺点和错误，其难办和难受程度可想而知！

不想涉及更多方面，只介绍一下我自己做过的一项调查，是关于中国矿山企业对于环境的破坏和影响问题的国家课题。在调查中发现，一些部队动用自己先进的机械装备，去国营矿山采挖国家矿产资源。这是干什么呢？他们不归矿务局管，采出的矿物

物资都送到哪里去了？自己经营赚钱去了！太可怕了！他们的部队番号矿山领导都知道，但没有办法管！这样严重的情况，我在调查报告里都如实地向国务院报告了。江主席肯定管了这档子事儿。部队不抓战备训练，都下国家矿山“捞钱”去了，这还了得！把战斗队变成“赚钱队”，是“猫论”所带来的恶劣影响。长此以往，国防实力必然下降！这可不是儿戏！

让部队专心搞战备训练，不要去搞钱，是江泽民同志努力抓住并抓好的一件大事！但是，让江总书记从政治理论上全面纠正以前的错误，那就太困难了！因为有许多诸如此类的大事情要他管。1998年1月29日，江泽民同志要“办”邓小平的儿子邓质方，因为邓质方利用四方公司王府井工程行贿2000万美元。邓质方的妈妈卓琳就到江泽民哪里大吵大闹，并以自杀相威胁。这就给江总书记的工作带来不小的麻烦，他不能不认真应对。此事资料来自网络，可以质疑其可靠性，但至今未见有反驳者，可见并非空穴来风。江泽民所提出的“三个代表”思想是：中国共产党要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始终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这只能是一个过渡：提发展先进生产力，要比“猫论”好得多，有理论色彩，并且与马克思主义把生产力发展水平看作社会进步的基础相一致。文化进步和人民利益，更是执政党必须关注的焦点。这样，他确实起到了承前启后的特殊作用，为胡锦涛同志纠正党在理论上的偏差，并开创“胡温十年”创造了前提。

2003年10月，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指出：“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这是我党的文件中第一次提出“科学发展观”。这是胡锦涛同志掌握党和国家领导权之后所进行的理论建树，其针对性非常明显：间接地批评和纠正了邓小平所谓“发展是硬道理”。说明发展不是硬道理，科学才是硬道理；违背科学的发展，会对大自然造成严重破坏，宁可不要！这一观念为以后党提倡生态文明建设，奠定了理论基础。

2004年9月19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六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上正式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概念。随后，在中国，“和谐社会”便常作为这一概念的缩略语。2005年以来，中国官方提出将“和谐社会”作为执政的战略任务，“和谐”的理念要成为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价值取向。“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是和谐社会的主要内容。

提出“和谐社会”，针对性也很明显：直接批评和纠正“以阶级斗争为纲”。如果不放弃“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斗争下去，哪里会有“和谐社会”？

提出和谐社会建设问题，确实需要非凡的勇气和魄力。因为“以阶级斗争为纲”，已经被人们当作是马克思主义的经典来对待了。很多人没有认真学习过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演说，不知道阶级斗争理论不属于马克思主义，而是资产阶级革命家搞出来的。只有唯物史观才是马克思主义。当然，这就是列宁同志把“政治”等同于“阶级斗争”所造成的后果，这是把共性（政治）等同于个性（阶级斗争）的逻辑错误。因为政治的内容不止于阶级斗争，阶级斗争仅仅是政治的内容之一。而且理论的适用与否，是由社会的客观条件决定的，不可能“放之四海而皆准”！不批评“皆准论”，“凡是论”就不可能退出历史舞台，因为“皆准论”是“凡是论”的理论依据。

当中国已经建立了由无产阶级政党领导的革命政权，人民大众已经成为国家主人的时候，就再也不能以阶级斗争为纲了！把少数贪污腐败分子硬说成是资产阶级，是给这些犯罪分子“涂脂抹粉”了！因为《共产党宣言》明确地指出：“资产阶级在历史上曾经起过非常革命的作用”。

2007年10月，党的十七大把科学发展观作为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科学理论，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指导方针，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和贯彻的重大战略思想写入了党章。

那么，什么是“胡温十年”呢？2008年5月20日，“中国日报网”编辑了一批海外读者称赞胡锦涛、温家宝两位中国领导人的言论：5月12日中国四川发生30年不遇的特大地震，世界上众多关心中国的外国网民、海外华侨和留学生，通过“中国日报网”的跟踪报道，及时获悉地震灾区的信息。他们留言，认为中国幸运地拥有胡锦涛和温家宝这样的领导人，对中华民族的精神给予赞扬，并祝愿中国人民平安健康。部分译文如下：

“国家主席胡锦涛，冒着余震的危险，亲自赶赴灾区，鼓励救援人员继续努力抢救生命。”

“总理温家宝，在第一时间赶到灾区，指挥施救工作，安慰失去双亲的孩子，慰问受到地震和余震惊吓的老人。而自己跌倒受伤，却不接受治疗。”

“中国中央政府及地方各级政府为人民鞠躬尽瘁，我感到莫大的鼓舞。”

“胡锦涛和温家宝应该赢得诺贝尔和平奖”，

“中国幸运地拥有胡锦涛和温家宝这样的领导人”，

“温总理是世界都应效仿的真正的政治楷模。他做事富于同情心、无私并谦逊。中国人为他感到自豪。”

胡主席同样优秀。中国非常幸运地拥有这两位领导人。”

“每个中国人都应该为温总理自豪”，

“温总理对地震灾民表现出的同情心值得称赞。温总理为全世界国家领导在未来灾害中的表现树立了榜样。我是个西方人，已经在中国生活了六年。我认为，这场灾难毫无疑问地向世界展示了中国和中国人民对彼此的同情关怀。不久以前，这里发生过骚乱。但是当地震发生后，每个人都跟大家团结在一起，抛弃过去的成见。这是西方世界在了解中国文化前，永远都无法明白的。作为一个‘局外人’，我再次赞扬温总理在抗震一线指挥的举动。在世界每个角落的每个中国人都应该为他自豪。温总理，您的行为已经说明中国是不可分割的国家。”

回想 1998 年长江洪水，时任副总理的温家宝同志亲临九江抗洪一线指挥，说明胡、温两位领导遇到灾难冲向前线，有历史传统。家宝老弟是学地质的研究生，曾经在我的同班同学身边工作过，对他的过去多少有些了解。

锦涛老弟与家宝同年，清华水利系毕业。这两位合作，配合默契，取消农业税等大动作深得民心。他们从理论上、政策上、行动上渐渐地纠正着党和政府以前的错误，开创了内行领导的美好前程。他们的所作所为，直接纠正着“外行领导内行是客观规律”的梦呓！

但是，就是这样一对儿配合绝佳的领导组合，当时也有人造谣说他俩有矛盾。我作为比他们年纪稍长的“老百姓”，细心观察良久，也找不到他们有什么“矛盾”之处。说明有些人以关心政治为名，兴无生非之实，是多么地无聊！

胡与温的配合默契，可以与之相比的，也只有革命战争年代的毛泽东总政委与朱德总司令的“双首长制”配合。“胡温十年”用事实说明：在和平建设时期，党中央和政府领导班子也应该采用“双首长制”领导体系。这为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提供了方向性的指导案例。

但是，人无完人，金无足赤。胡、温二位领导决非无懈可击。首先，在他们二位掌握大局之时，为什么不能给政治体制改革打下个良好的基础呢？这只能令人遗憾。

特别受到舆论垢病的是：家宝老弟的夫人，发了意外之财。网络上非议虽多，却并没有说清楚是怎么回事。爆料者根本说不出有什么确凿事实，能说明钱的不正当来路。我在北京参观某珠宝商店时，跟朋友正在闲谈，突然老板走过来，态度很不友好地赶我出去！我愤怒地质问他：为什么？他说：“你是内行！你在这里，我这生意没法做了！”

啊！轮到我吃惊了：我还没说几句话，他怎么就知道我是内行？搞地质的就算内行吗？搞地质的，

特别是专业从事矿物鉴定工作者，对于珠宝业来说，当然是内行！而且有非常方便的条件。我突然醒悟：家宝夫人是地质部门室内鉴定人员，很可能是做珠宝生意发了财。但此事并没有明确的法律规定，而且地质队员在家里收藏一点宝石再正常不过。当然，我也只是一种猜想。

第三节 怎样分析和看待“后四十年”的得与失 成就及评估

充分认识“后四十年”的辉煌成绩，是我们客观评价“后四十年”存在问题的前提条件。只讲错误不讲成绩，和只讲成绩不讲错误，都是片面性，违背实事求是精神。我们在前面介绍过 60 年代革命老区金寨的情况，后来怎么样了呢？

1977 年 11 月，履新安徽省委第一书记的万里第一站就到金寨县调查。金寨，地处大别山腹地，被誉为“红军的摇篮、将军的故乡”，革命战争年代有 10 万金寨儿女为国捐躯。但当时农村延续“文革”“左”的政策，将安徽农村经济逼到了崩溃边缘。

2018 年 2 月初，《瞭望》新闻周刊记者来到万里同志 1977 年走访过的安徽省金寨县，采访中获悉一组数据，令人感慨难忘：2017 年金寨全县 GDP108 亿元，是 1978 年 0.47 亿元的 230 倍；农村常住居民可支配收入 10098 元，是 1978 年农民人均纯收入 52 元的 194 倍。

《瞭望》杂志 2018 年 8 月 10 日，以“改革开放 40 年，时代的传奇”为题，总结了“后四十年”的辉煌成就。

2 月 14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 2018 年春节团拜会上向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发出号召：“改革开放 40 年来，我们以敢闯敢干的勇气和自我革新的担当，闯出了一条新路、好路，实现了从‘赶上时代’到‘引领时代’的伟大跨越。”“40 年的改革开放使中国人民生活实现了小康，逐步富裕起来了。”

4 月 10 日，习近平主席在博鳌亚洲论坛 2018 年年会开幕式主旨演讲中说，“1978 年，在邓小平先生倡导下，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中国开启了改革开放历史征程。”“40 年众志成城，40 年砥砺奋进，40 年春风化雨，中国人民用双手书写了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壮丽史诗。”这一评价是相当正面的。

《瞭望》新闻周刊记者用数字说话：

2018 年中国的 GDP（名义 GDP）预计将达到约 13.2 万亿美元，超过 19 个欧元区国家的 12.8 万亿美元。而 2017 年整个欧元区的 GDP 只比中国多了不到 2000 亿美元。

对比国家统计局 1978 年和 2017 年两份统计公报，能感受到改革开放带给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巨变：我国 GDP 从 1978 年的 0.3645 万亿元增长到 2017 年的 82.7 万亿元；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从 1978 年的 385 元增长到 2017 年的 59660 元，年均增长约

9.5%，已经达到中等偏上收入国家水平；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从1978年的343.4元、133.6元提高到2017年的36396元、13432元；农村贫困发生率从1978年的97.5%大幅下降到2017年的3.1%，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居民受教育程度不断提高，九年义务教育全面普及，高等教育毛入学率2017年达到45.7%，高出世界平均水平近10个百分点；城乡居民健康状况显著改善，居民平均预期寿命2017年达到76.7岁，高于世界平均水平……。

建成了世界上最大的高速公路网、高铁运营网和移动宽带网，形成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中等收入群体，织就了世界上最大的社会保障网，占世界经济比重15%左右，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率超过30%，成为世界经济稳定复苏的重要引擎。

上世纪80年代前后的中国，铁路运营里程5万公里，不到9000台的火车机车中有8000台蒸汽机车，电力机车不足200台，大多数火车时速只有40公里。40年过去，2018年1月发布数据显示，中国铁路运营里程达到12.7万公里，其中高铁2.5万公里，占全球高铁总里程的60%以上。

世界银行网站的数据：2015年全球工业产值12.157万亿美元，中国以3.25万亿美元居首，占全球比重26.7%；美国位居第二，为2.142万亿美元，与中国相比，相差1万多亿美元；日本位居第三，为8924.76亿美元；德国位居第四，为7008.8亿美元。而2017年，中国制造业的增加值已近美日德三国之总和。

不仅仅是经济建设数据惊人，在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发生了深刻变革。

深刻变革一：发展理念和发展方式全面转变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果断提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加快完善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体制机制；适应我国经济发展主要矛盾变化完善宏观调控，相机抉择，开准药方，把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作为经济工作的主线，坚定不移推进“三去一降一补”；统筹推进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各项工作；坚持问题导向部署经济发展新战略，接连推出“一带一路”建设以及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创新驱动发展等重大战略，加快推进经济结构调整和新旧动能转换；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推动“三农”工作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大力推进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坚持正确工作策略和方法，稳中求进，保持战略定力、坚持底线思维，一步一个脚印向前迈进；特别是强调要坚持正确政绩观，不简单以生产总值增长率论英雄。

深刻变革二：推动体制机制全方位改革

紧紧围绕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紧紧围绕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深化政治体制改革，紧紧围绕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紧紧围绕更好地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深化社会体制改革，紧紧围绕建设美丽中国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紧紧围绕建设一支听党指挥、能打胜仗、作风优良的人民军队的强军目标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紧紧围绕提高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水平深化党的建设制度改革。

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取得突破性进展，主要领域改革主体框架基本确立。司法体制、农村土地“三权分置”、户籍制度、考试招生制度、公立医院、生态环保等关乎民生的改革举措陆续实施。全面深化改革成为中国最鲜明的特色。

深刻变革三：开创全面依法治国新境界

把全面依法治国纳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统筹推进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各环节建设，统筹推进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开展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全面推进行政体制改革、司法体制改革、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日益完善。增强了全社会法治意识，促进了社会公平正义，维护了人民群众合法权益。

就目前群众反映看，我们在这方面做的还远远不够，还有极大的改进空间。

深刻变革四：党对意识形态工作领导呈现崭新局面

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建立健全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创新工作方式方法，加强宣传舆论阵地管理，加强网络舆论监管，对错误思想敢于亮剑、敢于斗争。这些重大决策、举措和成就，指导和推动意识形态工作开创了崭新局面，大大增强了党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权和话语权，社会思想舆论环境的混乱状况得到明显改变。

当然，就思想战线的进一步要求看，不足之处也十分明显：对于创新思想的提倡和挖掘还远远不够。然而，只有创新才是今日中国能够摆脱旧的束缚，冲上发展最高端的不竭动力。自由是创新的前提，如何将思想自由和爱国爱党的基本理念辩证地结合起来？这是我党我国思想战线所面临的紧迫课题。

深刻变革五：生态文明建设成就前所未有

针对导致发展不可持续和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生态环境恶化问题，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果断决定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作为“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重要内容。

大力倡导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强调“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制定出台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搭建了生态文明制度体系的顶层设计和改革路线图。实行最严格的生态环境保护制度，全面加强生态环境整治，大气、水、土壤污染防治行动成效显著。美丽中国建设迈出重要步伐。我国还积极参与全球环境治理，成为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参与者、贡献者、引领者。

世界上可能有少数国家在环保方面做得比我们好。但是，将生态文明建设上升到政治理念的高度来认识，无论是我们党还是我国，在世界上都是独一无二的。

深刻变革六：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发生革命性重塑

习近平主席围绕国防和军队建设的一系列重要论述，确立了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把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作为强军之魂。坚持政治建军，果断做出在全军开展正风肃纪的重大政治决策，在古田召开全军政治工作会议，紧紧扭住全面从严治党 and 全面从严治军不放松，围绕永葆人民军队本色正风肃纪、厉行法治、革除积弊、反腐惩恶，严肃查处一批军队高级干部严重违纪违法案件。坚持改革强军，把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作为决定军队未来的关键一招着力推进，改革的力度、深度、广度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所没有过的。打破了长期实行的总部体制、大军区体制、大陆军体制，形成军委管总、战区主战、军种主建新格局，调整组建 5 大战区、5 大军兵种、军委机关 15 个职能部门，人民军队组织架构和力量体系实现革命性重塑。坚持战斗力这个根本标准，大抓实战化军事训练，大抓战斗精神培育，大抓联合作战和新型军事人才培养，建设联合后勤、打仗后勤。实施科技兴军战略，发展高新技术武器装备，一批关键技术实现重大突破。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两件大事，提出总体国家安全观，组建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全面加强国家安全工作。

深刻变革七：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构建新型国际关系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国际地位和影响力不断提高。同时，我们也面临着来自外部环境的严峻挑战。我党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思想，受到国际社会的高度评价和热烈响应，已被多次写入联合国文件，产生日益广泛而深远的国际影响；提出坚持正确义利观，阐明我国的发展观、合作观、安全观、全球治理观、经济全球化观等。实施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发起创办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设立丝路基金，举办首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二十国集团领导人杭州峰会、金砖国家领导人厦门会晤、亚信峰会，构建覆

盖全球的伙伴关系网络，积极参与和引领全球治理改革。

这些重大决策、举措和成就，形成全方位、多层次、立体化的外交布局，在对外工作上取得一系列新突破。进一步提高了我国国际影响力、感召力、塑造力，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了新的重大贡献。

2024 年夏天法国巴黎奥运会，投入大量中国元素，甚至连安保工作都由中国来做，彰显了中国高科技发展水平，同时突出了中国“负责任大国”形象。这是建国七十五年来，我国主动融入世界的方针在今天的继续。最近，联合国一个教育机构决定设立于中国上海，成为国际社会信任中国的一个显著象征。

深刻变革八：全面从严治党力度空前

全面从严治党从中央政治局立规矩开始，从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破题，习近平总书记以身作则，逆转了多年形成的“四风”惯性。大力加强理想信念教育，先后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和“三严三实”专题教育，推进“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加强和规范党内政治生活，严明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坚决纠正选人用人上的不正之风。全面强化党内监督，巡视利剑作用彰显，实现中央和省级党委巡视全覆盖。坚持反腐败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坚定不移“打虎”“拍蝇”“猎狐”，440 多个省军级以上党员干部及其他中管干部、8900 多个厅局级干部、6 万 3 千多个县处级干部严重违纪违法受到惩处。果断查处周永康、薄熙来、郭伯雄、徐才厚、孙政才、令计划等人的重大腐败案件，消除了党和国家内部存在的严重隐患。管党治党实现从宽松软到严紧硬的深刻转变。党内政治生活气象更新，党内政治生态明显好转，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焕发出新的强大生机活力。

但是，反腐败的力度虽然很大，人们担心的仍然是：贪污腐败如何才能“断根”？像今天这样挖掉一批，又产生一批，人民怎能放心？党政机关怎样才能不腐败？在我们党的历史上，从来没有像这样大规模地腐败过呀！

深刻变革九：全面加强党的领导统领全局

习近平总书记一直强调：“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为本质的特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

针对过去一个时期党的领导弱化问题，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果断提出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的政治要求，鲜明强调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党的领导是做好党和国家各项工作的根本保证，绝对不能有丝毫动摇；强调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强调全党必须增强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从政治建设、思想建设、

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纪律建设等方面着手，改革和完善坚持党的领导的体制机制，坚持民主集中制，严明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坚决反对个人主义、分散主义、自由主义、本位主义、好人主义、宗派主义，提高党把方向、谋大局、定政策、促改革的能力和定力，确保党始终总揽全局、协调各方。

以上九大变革，主要是根据国务院研究室林兆木研究员的意见改编而成。有些地方加上了我个人的一些批评性看法，读者自然能分辨出来。

除了这些变革之外，更令世人瞩目的是：我国航天事业有今天的惊人成就，与“前三十年”打下基础和“后四十年”的扎实推进是分不开的。登月飞行揭示月球背面的秘密，实际上已经跑到美国前面去了。我国对南海的管辖和深海探测活动，也取得巨大成功，这些都与“后四十年”打下的基础有关。

错误与疏失

那么，“后四十年”我们又失去了什么呢？为什么广大人民群众，承认我国经济、科技和国防建设取得显著成就，又对“后四十年”有那么多的负面评价呢？有的怀念“前三十年”者，竟然深情地说“毛主席啊，您快回来吧！”

第一，我们最大的损失，是让许多人失去了“公心”。

是不是经济繁荣了，人们的私心就一定加重呢？因为在旧社会，穷人心地善良；而有钱人则为富不仁。但这并非绝对，当时也有少数穷人甘当地主的帮凶，甚至当土匪；富人当中，也有不少人资助革命，甚至送子女参加革命。

有些人以为“私有观念强化，是搞市场经济的结果”，甚至把“怨气”撒在市场经济头上。这也不对！市场交换，讨价还价固然会强化人们计较个人得失的意识。但是，“市场繁荣，物价稳定”一直是我们的不懈地追求。搞市场经济一定会强化私心吗？成为全国私有企业学习榜样的华为公司，难道不介入市场交换吗？如果企业领导班子，始终依赖和信任全体职工，把他们当成企业的主人；如果企业的经营决策，一切以大局为重，即“人民生活幸福，祖国繁荣昌盛”为目标，以不断提高公司产品在世界市场占有率，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为动力，我们就会把一切努力的动因，都归之于“公心”。久而久之，我们自己也就同战争年代的前辈们一样，办一切事都“公”字当头了。生产资料所有制，不能决定企业性质。我们中国有大量私企已经姓“社”，这是铁的事实。虽然社会上贪官污吏层出不穷，而一些出于良心，扶贫济困的新时代“好人好事”也时常出现，如何让其蔚然成风？不能只靠宣传教育，更要靠科学的制度规定，因为人的思想首先是对现实的反映。**各项管理制度与先进思想脱节，这才是问题的根本所在。**

有人提出：全社会私心加重，是国有企业私有化改革造成的。企业领导“老板化”，国有企业成为他的私产；工人不再是工厂主人，而是自谋职业，成了打工者，过去的一切为工厂，变成了现在的一切为自己，他或她的私心能不加重吗？这种看法很有道理，因为思想是对现实的反映。但是，如果国有企业领导人在原来企业国有的情况下，利用职权干坏事，他更大胆！因为反正企业不是自己的，是赔是赚无所谓，只要自己捞足了好处就行。流行说法是“能捞则捞，不捞是草包”。“按劳分配”也给人改成“按捞分配”，说明这种假公济私更加可怕！

第二，政治与科学脱节，甚至对立，情况依然严重。

对于政治从来不科学的历史，我们缺乏认识，不能自觉抵制不科学的政治。

党中央提出科学发展观，实际上是推出“发展观政治”。但是多数群众，仍然停留在“政权政治”的低层次认识上，不懂得把发展观当政治对待。对于生态问题本质上是政治问题，更缺乏认识。中央理论宣传部门，没有摆脱政权政治的陈腐观念，是造成这种情况的重要原因。台湾选举，选民坚决反对政治挂帅，已经说明旧政治观的本质，而我们的政治理论界并没有认真思考这个问题。

不科学的政治，对于政权的不合理想法，是社会不稳定的重要因素。不解除“政权政治”对人们的思想束缚，具体管理制度的改革也难以进行。

第三，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认识和弘扬充满盲目性

遍布世界各地的孔子学院，似乎是对儒家学说的一种肯定。但是我们不应忘记：1919年的“五四运动”，是强烈批孔反儒的运动。两年后，中国共产党在这个基础上诞生。说得更直白一点：党的宗旨跟儒家教义是不共戴天的！儒家的根本思想是反对革命，维护封建统治。

这说明我们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缺乏分析：当年“文革”，不分青红皂白“破四旧”，以为一切旧的都不好！当然属于盲目性。今天弘扬传统文化，对传统文化不做分析，是另一种盲目性。这个缺点必须努力克服，否则不仅误中国人的子弟，更为害世界上敬仰中国之民族和国家。实际上，国内学者（如黎鸣）反儒家尊道家的观点强烈而鲜明，中宣部理论局实际上对不起道家鼻祖老子。中国古代诸子百家各有千秋，要作具体分析，不能笼统对待传统文化。

第四，形式主义泛滥成灾，求真务实作风荡然无存

文革“四大”被我们否定了，但今天各种墙体上的大字标，令人感到很无奈。

实际上没有做的事，通过大字标语宣示一下，就算是做到了吗？核心价值观怎么有哪多项？到

底那个才是核心？毛主席说“多中心即无中心论”，言犹在耳啊！一个“教育”别人不要打架的标语说：“不要打架，打赢了坐牢，打输了住医院”，怎么就不分是谁先动手了呢？自卫反击也不允许吗？难怪会发生哪些见义勇为，为救受害人而伤及罪犯者，被不分是非地当作凶手抓起来判刑。犯罪问题本来就极其复杂，如果能这样简单地判别是非，还要律师和法院干什么呢？

形式主义泛滥成灾，是因为各级官员的优劣考核就相当表面化。官员的逆向淘汰，早就引起人民群众的愤怒，就是不改。会干事的不如会来事儿的；联系群众的不如联系领导的；学历高、智商高，不如情商高；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说你不行你就不行——不服不行。少量清官被众多贪官排挤走了，更有懂专业的干部被众多外行排挤走了，你不走也发挥不了作用。

最根本的问题是：求表面不求本质。改革表面轰轰烈烈，就因为缺乏务实作风，常常适得其反。群众讽刺说：改革六大成绩：房产改革口袋掏空；教育改革父母逼疯；医疗改革提前送终；企业改革下岗停工；政府改革机构臃肿；婚姻改革同居成风。

造成上述荒谬结果的根源，在于错误的干部制度：干部是为人民服务的，人民对干部的监督、审核、任命、罢免权力却没有一丝一毫。名义上是党管干部，实际上是一切根据“官本位”——前三十年遗传下来的，后四十年有过之而无不及。某人是某某领导看中的，别人就对他一点办法也没有了。——除非有更高级别的领导说话。

王义军 2010 年 6 月 29 日在“乌有之乡”发表文章称：

“中国社会 30 年来的风云变幻更无可辩驳地证明，那四千人之中的相当一部分人如胡 X 邦、赵 X 阳、万 X、李锐等之流以及他们的总后台，正是导致曾经团结、强大、纯朴、勇敢、无畏、健康向上的中华民族变成今日的离散现状、变成了今日的道德沦丧、变成对人民特别无情，对外格外软弱、让贪官污吏们肆无忌惮，让各种颠倒黑白的不耻现象风靡、让各种丑恶与社会乱象迭起的始作俑者以及真正的罪魁祸首！”

王义军上述文章的极左观点非常突出。他似乎“忘记”了：他所抨击的那个“总后台”（注：指邓小平），恰恰是他所推崇的伟人（毛泽东），苦口婆心地给造反派做思想工作，非要让他出来主持党和国家的全面工作不可，才有了后来所发生的一切。不过，文章中对于“后四十年”的批评倒是尖锐而深刻。

第五，圣旨即真理的思想路线和官本位的组织路线

这决不是后四十年才有的现象，而是建国以来一直如此。既然推倒文革路线，这一套应该彻底改变才对。可惜，非但没有改变，反而日渐严重。

真理是什么？真理应该是事实与逻辑的高度统一。如果事实与逻辑不统一，很可能是：一，事实不真实；二，逻辑不正确。或者两方面都有问题。如果这个道理是对的，实践就不可能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如果我给出的理论是正确的，而你表面上按这个理论去做，实际上另搞一套，出了问题你又怪我的理论不正确，这能让人信服吗？所以，实践不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只能是终极标准——理论的正确性，归根到底是要依靠实践来检验的。所以在实践之前，必须有充分的理论准备。“摸着石头过河”的错误，就是轻视理论准备。

中国数千年封建社会，盛行的是：**圣旨即真理**。皇帝说什么，什么就是真理。皇帝说“鸡蛋是树上结的”，你就说“对！我看见了，上面还有把呢！”皇帝就说“这才是好干部！”真理的唯一标准，就是符合最高领袖讲话精神。很多“忠于”领袖的干部，是不是在内心深处也把毛主席当作万岁爷看待？直至今日，我们很多同志，还是把毛主席是怎么说的，当作评判干部做的对与不对的唯一标准。俗话说，上有好者，下必甚焉，既然圣旨才是真理，往下推算，就是官越大就越有理，因为离万岁爷更近。官多大理多大，不当官就没理！尽管你年轻，学历高，工作有成绩，只要你“上头”没人，就别想提拔当干部！用人方面“官本位”，作决策更是“官本位”，什么事大官同意了才好办。

第六，法制建设仍然十分落后，本质上是实行人治。

领导意图就是法律，在官本位前提下，法制不可能公正、准确、无私。

吴鹏飞讲述湖南益阳民营企业家罗树中无辜受迫害的残酷事实，听了让人心里非常难受。为什么易中天说“中国人最缺的就是底线”？连法律都没有尊严，那里还会有底线？我的一位民营企业家朋友，竟然被自己的妻子及亲属逼迫到了难以生活的地步。很多人发问：这个社会到底怎么了？一个藐视法律，崇尚官位和金钱的社会，怎么可能“和谐”？贪官污吏层出不穷的根本原因，就是事事处处都是官本位。民营企业家得罪了当官的，弄得不好，会有性命之忧。你想要成功，不跟官僚们搞好关系行吗？所以，凡是没有采用“特殊手段”就能让民营企业良好发展的地方，首先应该表彰的，就是那里的地方政府官员！

第七，党和政府失去民心的支持

讲心里话，现在普通人对党和政府的热情远远不如从前了。

记得我们年轻的时候，把入党或者进入政府部门工作，看得是极其光荣的事情。现在的年轻人，这

种观念已经相当淡薄了。因为“向前看”已经实实在在地变成了“向钱看”——如果没有钱，“光荣”又有什么用？老年人一大堆荣誉证书之类，可能会被年轻人当废品扔掉，或者当垃圾处理掉。

物质进步伴随着极大的精神退步，你能怪左派骂你“走资本主义道路”吗？

为什么会造成这样一种局面？反映出来的问题是：我们在指导思想上缺乏系统思维，总是一件事、一件事地分开抓，不注意物质与精神的内在联系。甚至可以说，常常采用的是反系统思维的形而上学思维模式。

第八，事业单位失去事业心，社会全面互补关系在不知不觉中被破坏

现代社会决不是自己顾自己，而是一个全面互补的社会。现代系统论成立有两个前提：一是整体论，二是互补论。整体论，是指做什么事都要有全局观念，一切部分，都是全局的组成部分。所谓互补，就是双方提供给对方生存所必须的条件，而不是一般的互相帮助。例如买卖互补，通俗地说：你什么都不买，我还开店干什么？商店只好关门！再如工业与农业互补、军民互补、生产与消费、运输、销售的多元互补，等等。

事业单位与企业单位的关系就是互补的：事业单位由国家财政拨款，就是不让它赚钱，能全心全意为企业服务，为社会服务。企业单位是可以靠生产、销售、运输及其它生产活动赚钱的，它们为国家和社会提供税收，积累财富。事业单位不考虑“创收”，这是原则。但是，在改革开放过程中，由“一切向钱看”思想指导，让事业单位去赚钱，破坏了企业单位和事业单位的分工，让它们之间的互补关系消失，违背系统管理原则的基本要求，所产生的负面影响非常严重。例如，由杂志社收钱才能发表文章，就造成好文章发表不了，而水平不高的文章有钱就可以发表的荒唐结果。

最突出遭受破坏的是：医疗卫生、教育、体育、文化四大事业单位。文艺演出和体育表演，原来就有要观众买票的习惯，所受到伤害相对较小，但也是触目惊心。文娱体育明星们赚钱心重了，少数人就变心，甚至不再爱国。而医疗卫生和教育事业的“向钱看”，就害苦了老百姓。医院工作成绩的衡量标准，应该是在特定时间内，治好多少病人，减轻多少患者的痛苦。衡量教育成绩应该是培养多少人才，毕业生质量如何？这二者跟赚钱一点关系也没有，怎么能用赚多少钱来衡量它们的成绩呢？

第九，造成问题的根本原因，是指导思想脱离系统理论

全党全民对系统论的伟大意义认识不足。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掀起系统热，热闹有余，效果不佳。我们时时处处都在违背系统论，思考问题，做事情，

就事论事，不顾及前因后果，不考虑对其它子系统的影响，司空见惯。

系统论是什么？系统论才是当代辩证法、历史唯物主义。学习马克思主义就背诵教科书上的条条框框，以为知道对立统一、质量互变、否定之否定就算是学会了辩证法。大错特错！以为系统论是外国自然科学界搞的，就不可能符合马克思主义。大错特错！所谓与时俱进，成了临时应付的代名词。思想观念落后才是真正的落后啊！

第十，以为社会制度绝对纯，也是形而上学；现代社会制度是由历史发展而来，是历史上各种社会制度的混合。仅仅是由占统治地位的社会制度，决定国家的性质而已。

资产阶级革命最成功老资格的英国，保留女王制度干什么？东方资本主义典型日本还保留天皇呢！他们一点也不傻，知道封建主义那一套对资本主义稳定发展有好处！“两参一改三结合”企业管理制度，是中国社会主义的法宝。可是被西方资本主义，特别是北欧资本家企业学习了去，效果还相当不错！他们不怕被“赤化”吗？当然不怕！资本主义在发展过程中，甚至还利用过奴隶制度的一些极端手段。所以，任何现实社会制度，都是历史发展的产物，也避免不了彼此交流互鉴。我们必须适应这种状况，而让社会主义原则始终处于领导地位。

中国提出“一国两制”是真诚的，是共产党领导资本主义的真实反映。因为一个国家的社会制度，绝对不可能单纯！只有居领导地位的社会制度，才决定这个国家的性质。

再强调一遍：生产资料所有制不是社会制度的决定因素，企业决策机制和理念，才决定你是什么社会性质的企业。这个原则对于判断国家性质也一样。

以上对后四十年“成绩巨大，错误严重”的分析告诉我们：客观事物极其复杂。为什么会这样？我们对客观事物的复杂性缺乏认识，新的追求和旧的习惯思维搅和在了一起；对系统思维的重要性缺乏认识，掌握不住，必然出现这样的结果。埋怨过去，不如冷静地规划未来。认识到系统论是当代辩证法，时时处处不忘系统地思考问题，犯过的错误就会成为对未来进行思考时的精神财富。

第九章 改革是更深刻的革命

前面说过，无论对建国后开始的“前三十年”，或者从1979年开始的“后四十年”，在中国人民群众当中的认识分歧都很大。所谓左派的看法，就差直捷了当地说：“这后四十年就是资本主义复辟”了；而在对于改革开放持正面看法的人群当中，具体想法也很不一致。

如果说前三十年,主要的革命发生在思想政治领域和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改造方面;那么后四十年,革命应该发生在基础理论的进步和政治体制的改革方面。但是很可惜:无论是在基础理论的进步,或者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都停滞了。

前面所说:干部的“首长提拔制”,是产生腐败的制度性根源,虽然有不少人会支持这一观点,但并不是主流认识,更不是所有人都认同,目前只能看作是作者个人观点。形成该制度基础的是“圣旨即真理”思想,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人永远正确,不可能犯错误。由他最终决定组织工作原则,高级干部的选拔和任用方法,怎么可能会让坏人上台当领导呢?一旦党和政府官员出现“塌方式腐败”,我们就无法“自圆其说”。如果把这种状况的出现,完全归咎于领袖缺乏识人之明,不仅仅是冤枉他本人,更是堵塞了政治体制改革的道路。事实已经雄辩地说明:“圣旨”决不等同于真理!再也不能沿用把“符合不符合最高领导人讲话精神”,当作判断理论和实际工作中是非的标准了!

所以在政治改革之先,首先要改革一下真理观:什么是真理?**事实和逻辑的一致才是真理!**二者不一致,有两种可能:一是事情的描述并不符合实际情况,或者说不完全真实;二是逻辑不成立,或者至少是不严密;有时候两方面都存在问题。“实践检验真理”只能是在终极意义上使用,对于当前急需解决的问题,我们不可能等待实践检验结果出来以后再进行讨论。

将改革和开放捏合在一起,似乎也不妥当。好像前三十年我们一直闭关锁国似的。是毛主席会见尼克松,打开了中美交往的大门。再则,当时国际社会对我们的封锁,责任不在我们,而是苏联搞社会帝国主义和美国实行反华政策的结果。所以,左派对于“改革开放始于邓小平”这一说法提出异议是对的。

今天我们将要进行的政治体制改革,是当年延安整风运动的深化和具体落实。我们要用这样的心态和努力来对待这次政治体制改革。

第一节 政治体制改革的方法和步骤

政治体制改革应如何进行?中国历史上没有可供借鉴的先例。前苏联提供了失败的案例;台湾选举,一颗子弹上台独分子上台执政,使台湾选举成为反面教材。我们也不能套用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体制。虽然我们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先例,然而我们有民主的先例。我们可以想好一套改革的方案和程序,供全党讨论、修改、补充、完善,再征求全国人民的意见,由领导层进行修改完善,中央全会通过,然后逐步实施,这样做符合民主程序、比较稳妥而又富于开创性。

方法一:开展全党全民大讨论:我们当前的政治体制是否完善?如果不完善,表现在哪些方面?当

前政治体制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是什么?应该怎样解决?如果认为当前政治体制需要改革,改革那些方面?具体解决什么问题?

方法二:在认真讨论的基础上,提出政治体制改革具体方案。层层上报,由中央组织部收集民意,进行研究、分析,经过归纳整理以后上报党中央。由党中央指定专人,在有关专家协助下共同分析研究,写出总结报告。说明群众要求解决的主要问题是什么?我们要如何落实?提出具体意见和建议。

方法三:在中央政治局范围内讨论这些意见和建议,在充分发表意见的基础上形成完整的政治体制改革方案,会议通过,遵照执行。

政治体制改革,决不是一两个回合就能解决问题,可能需要反复多次。

这种改革可遵从先易后难原则,分期分批进行。经过一段时间后,再换第二批单位进行改革。全国各行业各单位政改都搞完,估计至少需要三年时间。

我们曾经有过“四清”工作的经验,虽然二者本质不同,有些方式方法可以参考和借鉴。

党中央、国务院和人大、政协等中央机构的改革,要成为下属机构及其他机构改革的榜样和先锋。但因为事关大局和长远规划,不能匆忙行事,必须反复争论,多方案对比,择优采用。上面怎么改,对下面肯定有影响和示范作用,所以等候时间又不能太长,这是现实存在的矛盾。处理方法就是先务虚后务实:不同方案提出越早越好,多种意见认真进行争论。争论到后来,可能互相都会发现对方的长处和自己的不足。在这个时候,要允许和鼓励修改自己的方案,经修改完善以后再投入争论。政治改革方案经过反复争论、修改,趋向完善,这本身就是“实质性民主”锻炼和发挥作用的过程。

中央和地方的同类机构,共性大于个性,可以先在地方试点,取得成功,然后向中央推广。而不同机构如何配合?协作?这是协同论(即互补论)应当发挥作用的地方,也可以找一两个省、部级单位试点,取得经验后向全国推广。

第二节 人类社会阶级关系的观念更新

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的人们,把当前出现的贪污腐败狂潮,说成是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的猖狂进攻。这些腐败份子所犯下的罪行,不属于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进攻的政治攻势,而是属于卖国行为,经济犯罪行为。也就是说,和杀人放火的强盗、投毒犯、盗卖人口的人贩子,敌人派进来的间谍特务,属于同一类别。《共产党宣言》说过:资产阶级在历史上曾经起过非常革命的作用。而贪污腐败分子在任何社会都是一群蛀虫,对所有社会都没有任何好处!如果把他们硬说成是资产阶级,反而是在美化他们!毛泽东同志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明确地将中国资产阶级划分为民族资产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并把民族

资产阶级与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并列，作为中国四个革命阶级当中的一员。我们的五星红旗，四个小星即代表上述四个阶级，心向中间的大星，即中国共产党。这样一种全面而准确的政治观念不能动摇，政治改革决不能把毛主席的这种统一战线思想给改没了。由此可见，把各类贪污腐败官员，笼统地说成资产阶级，是原则性错误！实际上有些网友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而把这些坏人称为“官僚资产阶级”。这种说法在政治上不犯错误，但在描述事物的准确性方面却很不够。这些坏人当中既有贪污腐败官员，也有大量企业、事业单位负责人，甚至还有不少银行及其他业务部门工作人员。总之，无法将他们概括成一个特定的“阶级”，这就让那些主张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同志们失望了。

由此种意见分歧的存在可知：面对新的形势，特别是科技进步给社会发展带来的全新情况，传统的阶级分析观念应该更新了，再也不能按过去的老一套办法对待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的论述了。

由于科学技术的革命性进步，世界政治形势的迅猛发展，我们对于中国所存在的各个阶级，以及它们的彼此关系，都应该有全新的认识。这种重新认识中国社会各阶级关系的必要性，早就摆在了我们面前。然而，对待阶级问题的认识，我国绝大多数群众还是停留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即毛泽东同志在 1925 年 12 月写的那篇文章的水平。

由于智能科学的发展，机器人可以代替人类的很多劳动，你能说某某在“剥削”机器人吗？机器人可以代替子女在家里照顾老人，甚至比真人还要方便，你能说子女不孝吗？当然不能！

问题是新的科学技术成果还没有全面普及。虽然如此，今天社会劳动的状况跟一百年前相比，也大不相同！而且理论从提出到落实，需要一个相当长的时间；所以理论必须有一定的超前性和预测性。

在新时代看待阶级问题，就不能仅仅从“财产归属”和“体力劳动”这两项指标来划分阶级了。过去，把自己没有财产、完全靠出卖劳动力为生的人，称为“无产阶级”；现在中国还有这样的人吗？你以为快递小哥就穷得没有任何财产吗？也许有这样的人，但决不可能是多数！

把“坐办公桌的”跟“扛麻布袋的”对立起来，这种观念也早就过时了。当代中国，从事体力劳动更累还是从事脑力劳动更累？还真的不好说！有时候脑力劳动久了，出去干点体力活，反而是一种休息。那么新的阶级应该如何划分？这成了需要重新认识和讨论的问题，因为在经典作家的书上找不到现成答案。

阶级观念更新的首要问题，是必须高度重视社会各阶级的合作，即把阶级合作摆在首要位置，而不是相反。我们要研究社会的阶级关系，根本目的是使

阶级合作正常化、有序化和提高合作效能。什么叫新社会？**新社会的第一个标志，就是阶级合作的意义要远远大于阶级斗争。**那怕在以新民主主义为政治纲领的前三十年，也应该是这样！如果把阶级合作看作大海，阶级斗争就是海面上激起的浪花。换言之，人们思想的片面性在于：只看见海面上波涛滚滚，却看不见浪花下面从较浅到深达数千米的海水。

阶级合作是阶级斗争产生的基础。两个阶级从来就不合作就不会有斗争，只有在合作当中产生了不愉快，才发生斗争。在新的智能时代，就必须认真了解一下：这种合作中的不愉快是怎样产生的？能不能上纲上线？如果仅仅是一般性冲突，不牵涉纲领和路线问题，就不能开展阶级斗争，更不能以阶级斗争为纲。如果仅仅是工作方法上的缺陷，当事者认真接受批评，努力改正错误，一切就会回归正常合作。牵涉到所谓政治路线问题，是极其罕见的事情，才应另当别论。

人类社会的发展和进步，归根到底是阶级合作的结果。其中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合作尤为重要。传统观念认为：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而在今天，这种观念完全不合实际。现在的社会，不同类别脑力劳动者的合作，特别是文史类和理工类知识分子的合作，已经显得极为重要。

在我党的历史文献中，曾经将依靠工资为生的大学教授划为“无产阶级”。然而在那个特殊的年代，不少人无视这一规定，把不愿意跟着康生、陈伯达和“四人帮”一伙节奏起舞的教授们，都打成“臭老九”，加以打击迫害。

以前划分阶级要讲究有无财产，现在划分阶级总不能不讲财产吧？怎样与时俱进地对待这个问题？这是第二个需要彻底更新的理念：**现在划分阶级不是不讲财产，而是更要讲究他本人对待这些财产的态度。**华为公司资产相当雄厚，你能因此就把任老板划成资本家吗？当然不能！任正非同志是社会主义企业家，代表着无产阶级的阶级利益。而哪些贪污腐败的“国企领导人”，是不法资本家，代表着国外资本财团的利益。他们把资产和家属早早转移到国外去，已经说明问题。这是国际阶级斗争的组成部分，超出了国内阶级斗争的范围。

现在人们对阶级问题的认识，已经相当混乱。红兴文化公园的“老碗哥”，又自称“老胡”（胡岸）说左翼已经分化出三大阵营：一是五毛党，认为民族第一，不讲国内阶级利益；二是带路党，恰恰相反，只讲阶级矛盾，不讲国家利益，与境外势力勾连，“老胡”称其为极左；中间派既讲阶级矛盾，又讲民族利益。我引述“老胡”的这些说法决非表示赞同，只是想说明：当前政治理论的混乱，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这是我们专业理论工作者的失职和耻辱。

阶级观念的**第三个问题：是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这是当今时代中国国内划分阶级的最重要依据。因为现时代中国的一切卖国行为，都代表着世界犹太财团大资本家的利益，而不符合今天中国爱国企业家的利益。甚至可以说，因此而受到最直接伤害的，恰恰是中国的民族工商业者及其它企业家；国家和人民群众是间接受害者，是因为国内爱国的大企业受到了打击，才连带着伤害了我们。

为什么要高度重视阶级合作？因为社会各不同阶级之间的关系是互补的：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你为我的生存创造条件，我为你的生存创造条件，我们谁也离不开谁，这就是互补！买家和卖家的关系就是这样！既然如此，国内各个不同阶级就是社会大系统中的不同子系统，必须用系统论的观点来研究和处理社会阶级关系。这和对敌斗争根本不同，决不能混为一谈。所以阶级斗争观念，只适合于中国对外国资本财团所进行的斗争，不能用于处理国内各不同阶级之间的关系。

传统的阶级观念是不是一点道理也没有了，要完全退出历史舞台呢？当然不是，因为智能革命才刚刚开始，远远没有最终完成。在现实社会，传统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比重还相当大。所以，我们要对阶级关系有准确的认识和实施有效行动还有很大困难，必须谨慎从事。

第三节 系统政治的观念更新和理论创新

我们的想法，是用系统政治代替传统的“阶级斗争政治”和“等级管理政治”。观念和理论更新，实际上是政治体制改革的灵魂，也是实施改革前的重要准备工作。

用中山先生的政治观，即政治是管理众人之事，代替过去的阶级斗争政治观，是对于“左”的政治错误的一次否定。但是，社会管理如何现代化、革命化？中山先生没有也不可能给我们提供答案，我们的观点就是要走系统化道路。

应该怎样认识系统论？2024年4月出版的《智慧中国与时代人物》一书，其210页至213页刊有本人所写“系统论是唯物辩证法的高级形态”一文，说明了作者对于问题的基本观点。而本书的第一章序言和第二章，详细论述了这个问题；所以在这里没必要过多重述，只强调一下系统论的核心理念和灵魂。

系统论的核心理念有二：**整体论和互补论**。坚持这两点，才是坚持系统论。而系统论是唯物辩证法的高级形态。所谓辩证法三大规律：对立统一、质量互变、否定之否定，并没有实质性意义，这些都是黑格尔先生搞的“形式辩证法”——只描述现象，不揭示本质。

系统论从表面上看，是西方科学哲学家搞的，它的根源却在中华传统文化，即道家思想。“道生一，

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是整体论的科学表述：宇宙万物是统一的，普遍联系的，构成系统是这种联系的最基本方式。阴阳互补思想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精华，是中医理论的灵魂；中医理论也是系统论在中华传统文化中的具体表现。纪由的32字口诀，生动地诠释了阴阳理论的奥秘。阴阳互补是协同论的思想基础，这才是系统论的核心思想。

然而，用现代系统论的观点和立场对待政治，并非轻而易举。

用“分工论”代替“剥削论”，“合作论”代替“斗争论”，是新的社会阶级关系理论的核心，却不包括对外关系。但是由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提出，在对外关系中，分工论、合作论也应该处于主导地位，只是我们与所谓霸权主义国家的关系比较复杂，这个问题将在最后一章详细讨论。

人类阶级关系的本质，就是社会的不同分工与合作。工人与农民是这样，工农与为他们服务的知识分子也是这样。工农业者和商业、运输业者的关系是这样，为其服务的知识分子之间也是这样。由于文化和科学的进步和发展，知识分子分属不同的社会阶级和阶层——每个阶级和阶层都有它们自己的知识分子。这种情况有利于开展高效率的阶级合作，便于彼此间的沟通和了解。这种情况要求我们彻底放弃“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旧意识，或者只承认国际上的阶级斗争。在国内，有外敌渗透，或把变质者拉出去等情况，却不存在单纯属于国内的阶级斗争。

我们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放弃“以阶级斗争为纲”，也就是从后四十年开始的。这本来是在政治和意识形态领域的重大进步，可惜由于理论研究的过于肤浅和重大政治问题研究的缺失，没有及时向全体中国人民讲清楚有关道理和问题，客观效果很不理想，甚至给人一种“反毛”、“反马列”的错觉。

系统论本来就是讲一个系统内部各个子系统之间如何协作，科学分工互助的道理和方法。如果不讲阶级合作，或者不以阶级合作为指导思想，在社会管理方面根本无法落实系统论。上世纪八十年代在中国的系统热，热闹有余而成果不足，根本症结就在政治上——不承认阶级合作的极端重要性。

承认孙中山先生的政治观念，承认系统论对于政治体制改革的指导性地位，都要求以全面而真诚的阶级合作为前提和基础。这也是朱德委员长，于1965年12月30日，在全国人大常委扩大会议第24次会议上，高声呼唤“首先是要搞好社会各阶级、各阶层的团结。”要求加强阶级团结，更是阶级合作论的精华！这样一些最基本的政治理念，必须向全党，向全体中国人民进行教育甚至是灌输。这种政治立场的根本性转变，不是背叛无产阶级，恰恰是更好地坚持了无产阶级立场；因为在这个世界上，只有无产阶级最大公无私，最有政治远见，以天下为己任！

希望在不久的将来，就会有关于新时代全面而深入的阶级合作理论面世。它应该是一种深入浅出、入脑入心的，富有说服力的研究成果。它不仅要在国内成为广受欢迎的教材，还应该产生世界性的影响，为创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理论支撑！

第四节 政治体制改革的经济学支撑

以政治为主干的上层建筑，是为经济基础服务的。它必须建立在合适的经济基础之上。也就是说，政治体制改革必须和经济体制改革同步进行。否则，不但改革进行不下去，已经取得的成果也会丧失。

一说到经济体制改革，人们首先想到的是生产资料所有制变革。这种想法不能说错，只能说还远远不够。前苏联提供的教训是：生产资料国有，管理这些国有资料的人又很自私，带来的结果更为恐怖。因为反正生产资料是国家的，丢失、损耗我都满不在乎，只要操作过程能让自己捞到足够大的好处就可以了！如果生产资料是自己的，或者说投资下去的是自己的血本儿，那么他对于企业经营管理，或者是资本运作，反而会非常用心，生怕赢利不够，因为有自己的切身利益在内。如果没有自己切身利益与企业相关联，企业领导人常常会变成在经济领域里的“马大哈”，把自己所管理的企业弄贬值了，甚至葬送了，更坑害了企业员工和损害了国家利益。

把国家企业划归管理者私人所有，这叫做“私有化改革”，正是在后四十年的“改革开放”当中遭遇左派猛烈抨击的做法。不划归私人吧，企业领导人又缺乏应有的责任心。总之，无论公有私有，受害的总是企业员工和国家。

面对这样两头为难的情况，到底应该怎么办？只有求教于系统论，让政治体制改革和经济体制改革同步进行，配套实施。实际上，政治体制改革也必须得到经济体制改革的支持和帮助，否则难有实际效果。

经济体制改革本身还有许多需要认真研究、仔细推敲的地方。左派对问题的认识是：不顾一切地主张公有制，以为生产资料公有制就是好，就是社会主义。而马克思主义早就把问题说清楚了：生产关系必须适应生产力发展水平。生产关系作为经济基础的本质，它对上层建筑起决定作用；但它本身受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制约和推动，决不可能“想公就公，想私就私”！随心所欲地更改生产资料所有制，我们曾经吃过大亏。

但是，客观上也确实存在一些个体所有制、集体所有制和国家所有制都能行得通的行业和部门。例如，饮食业、旅游业、特种农业、手工业等等。这就要根据实际需要来选择所有制，不能一概而论。关于农业，在上个世纪就曾经发生过特别生动的所有制形式不断升级的故事。

在“后四十年”之初，大型国有企业私有化，或者解散国有企业，让数千万工人下岗，给中国经济和社会都带来了极大困难。这种巨大的伤痛甚至影响好几代人。这说明什么？我们遇到了经济困难，或者进入特殊时期，应该怎么办？中国人民是最听话的，一声令下，遵照执行。再困难，仍然相信党，相信政府。中华民族是个能忍辱负重的民族。换了人民“不那么听话”的某些国家和民族，遇到这种情况，恐怕早就大闹大乱起来了！中国人民是这样的“自觉”，党和国家领导人处理问题就更应该慎重，对改革方案设想得更全面和周到一些。

政治为经济基础服务，这个关系不能颠倒。但是贪污腐败成风的事实告诉我们：目前的政治体制已经给经济基础的健康和经济正常发展，带来了极其严重的伤害。政治体制再不改革，民族危机就会到来，如果闹到了天翻地覆的地步，后悔就晚了！国防部高官，一个接一个的贪腐、卖国，为了私欲出卖国家机密，帮助敌人祸害自己的国家，这样的卖国分子长期地就在我们最高领导人身边，随时有可能采取极端行动，想想不觉得后怕吗？

这决不是危言耸听！政治体制改革已经到了迫在眉睫，刻不容缓的地步！

好人做好事，除了爱国爱党，红色基因传承，心地善良外，恐怕还有很多别的原因。但是坏人都是为利而来，为贪心驱使，一个“私”字能概括一切！

如果承认上述道理，就必须彻底撤销“官升工资长”的长官等级工资制。将领导干部的级别、职务、资历跟个人月收入完全脱钩，将立功后的奖励跟资历、职务收入分开计算，让高官再也不能“不劳而获”。他所领导的部门为国家做出突出贡献，奖励当事人，同时也惠及领导，具体方式根据实际情况确定。他所领导的部门如果出了问题，他必须承担责任，并接受经济和政治的双重处罚。

经济学支撑的范围很广泛，决不限于对领导干部的约束和鼓励。但是，对领导干部的实际收益进行调整，影响会很大。

怎样体现出“当官不是为自己”？必须在分配制度上明确地体现出来。具体做法，第七节还要详细讨论和说明。

第五节 递阶系统的层次（阶）划分

社会管理系统，除了因负有不同任务、发挥不同功能的管理部门和分支机构横向划分的子系统之外，还有从中央到地方，再到基层的递阶系统的“阶”的划分。因为中国是一个有 14 亿多人口和近千万平方公里陆地，还有辽阔海疆和众多岛屿的世界大国。

科学、准确地划分系统的“阶”，也是落实系统政治管理的重要环节。那么从目前看，中国从上到下的“省、地、县、乡、村”五阶划分，是不是合理呢？可以认为：基本合理，因为已经“习惯成自然”。如果

要改进，只能减少层次，例如，有些地方搞过省直管县的试验。取消地区一级是有可能的，但这样做会让省会以外的某些城市，失去特定的行政地位；也会增加省一级的管理负担。随着管理智能化水平提高，脑力劳动被更巧妙的人工智能所代替，这种负担的增加就无所谓了。减少层次还可以让中央和省的决策能“一插到底”，避免中间传达时发生扭曲变化。除了地区一级，乡级管理机构也可以撤销，由县政府直接管到村。随着管理智能化的发展进步，由五级管理变为三级管理既有可能，也有必要。

除行政机构外，专业性机构设置多数已经成为三级：中央（部、委、局）、省（局）、基层单位。例如，地质矿产局，很早就取消了地区局的设置。

农村人民公社制度，土地和大型生产资料的公有制，是纯粹农业生产机构，不应该代替行政管理机构。这正如工厂，无论其本身行政级别有多高，都不能代替地方政府管理地方事务一样。曾经有过的“政社合一”、“工农兵学商，统一好领导”，都是不成功的：它不尊重事情本身特有的专业性。

在人民公社内部，对于主要生产资料实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这是一个生产单位的内部管理。你参考国营农场的做法，把农民变成“农场职工”也行，这和地方如何管理并不相干。但是，农村只要存在土地私有，就不可能把农民变成国营农场职工，因为国营农场的土地是国家的。土地国有，是公社变农场的前提条件。农民变成农业工人，既是经济地位变化，也是政治身份变化。

但是，基层行政级别是划到村好还是到乡（镇）好，不能一概而论，需要考虑实际需要确定。

第六节 彻底废除干部的“首长提拔制”

我们曾经高喊：“要废除干部终身制！”实际上只是为干部下放，为办“五、七干校”造舆论，不具有政治体制改革意义。只要实行干部的首长提拔制，就不是民主政治！能做到“彻底废除干部的首长提拔制”，才算是真的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真的实行民主政治。

自古以来，想当官就得由上级提拔，似乎是天经地义。封建社会的科举制度，用考试办法“取士”，打破了这一规则。然而，科举取士为封建统治服务的本质，让我们对之产生反感。我们把干部的能力考试更名为“测评”，就是想和封建主义划清界限。但是在实际上，我们的干部选择和任命根本不看测评结果。只要领导看中了，“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领导看不中了，“说你不行你就不行，行也不行！”对于干部的首长提拔制，人们早就深恶痛绝，此类讽刺挖苦落后的干部制度的小品太多，读者和听者实际上都到了麻木的地步。

传统观念认为，中国有 2000 多年封建专制历史，从来就缺少民主传统。所以，求取“中国式民主”，

无异于“缘木求鱼”。但是，“政治落后地区容易出理论”的历史事实，可能会给出完全不同的答案。

19 世纪的马克思主义产生在德国。德国当时是欧洲最落后的国家，俾斯麦靠铁血手段才统一全国不久，刚刚扫清发展资本主义的障碍。20 世纪初期的列宁主义产生在俄国，俄国才建立资本主义不久，资本主义力量相当薄弱。20 世纪 30 年代的毛泽东思想，产生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其落后状态大家都清楚。

这不难理解：越是落后的地方，人们追求变革的心情越是急切，越是希望后来居上，赶上世界先进水平。而越是先进地方的人们，越是自我感觉良好，固步自封，不求进取。中国正因为长期经受封建专制压迫的痛苦，更能体会到真正民主的可贵，人们不屑于引进任何花样的假民主。事物相比较而存在，有了封建专制这个参照物，中国式民主应该更深刻、更实际。

中国人没有民主传统吗？打开《毛泽东选集》第一卷，我们就发现这不是事实。在“井冈山的斗争”一文中，毛泽东强调：“红军的物质生活如此菲薄，战斗如此频繁，仍能维持不敝，除党的作用外，就是靠实行军队内的民主主义。……中国不但人民需要民主主义，军队也需要民主主义。”红军中的“士兵委员会”，对于军事首长的监督很严格。同志们想想看：连执行铁的纪律的军队（还有党）都需要民主，难道人民会不需要民主吗？红军中的民主比任何所谓“民主国家”的民主更具有实质意义。

建国之初，党的各级领导干部大多数都能跟老百姓打成一片，亲如家人。自己的警卫、秘书可以在党的组织生活会上，给自己提出尖锐的批评意见。当时的省委第一书记只是会议召集人，其他书记在分管领域负全责，重大问题集体讨论决定。遇到分歧意见少数服从多数，还可以保留自己的意见，同时向上级党组织报告。回顾历史：共产党的民主是怎样丢失的呢？民主的丢失，就像航天员在高空失重状态下的骨质丢失一样！

失重造成骨质丢失，“失众”即造成民主丢失。任何事情不考虑老百姓在想什么，还有民主吗？这些事情是渐渐发生的。最明显的民主丢失是在所谓“一月风暴”成立革命委员会的时候。一切以“造反”为标准，由造反派说了算，排斥其他成员。革委会成员好像梁山好汉排座次，“一把手”观念越来越强烈。连“副职一律平等”的领导科学原则都不遵守，副主任排位在第几也要争抢和计较一番。领导集团内部就不民主，还侈谈什么“巴黎公社原则”！以后的承包制，讲“一个能人救活一个企业”更是历史唯心主义的梦呓。遇事个人说了算，是对中国式民主的极大倒退。这当然和当时党中央的政治状态有关。

民主，不仅是信仰、理念、文化、习惯，还是一种“科学”。不科学的民主比专制还坏。民主如果不能科学化，也难以坚持下去，这是当今世界政治民主不断下滑给我们的深刻教训。进一步讨论下去，还可以说：民主也是个“技术活”。记得在学校里选班委会，一共5个名额，全班有50多人，你随便提候选人，不管你提多少，有两项规定：一是后提名的先表决，二是得票最多的5个人当选。然后由他们5人选举班长。这样一种选举方式，让那些喜欢吵吵嚷嚷造舆论的人无计可施，避免了“非正常选举”的发生。因此，民主过程的设计，需要有相当的技巧；不是随随便便发给你一张选票，你想选谁就写谁那么简单。

我们倡导“民主集中制”并非无的放矢。有些中国人一方面享受集中统一带来的好处，一方面又埋怨自己没有享受民主。其实“民主”和“集中”并不是一对矛盾；民主和专制才是对立的。因为集中本身绝对需要，人群意见分歧，不能统一意志，中国人就什么事也干不成。集中方式有很多种，如封建专制式集中，民主式集中，等等。我们需要民主式集中，更需要科学地集中，民主不科学就一切枉然。

不容忽视的问题是：现时中国的民主存在太多的问题，表现出来水平相当低。有人可能不同意我们的评价，认为协商式民主比单纯靠选票要高明。但是，无法否认的事实是：中国民主不适合现实需要。

一是官本位决策模式，极大地伤害了中国式民主。所谓“千锤打鼓，一锤定音”是实际情况。很多地方是“老大”一个人说了算。下乡找人谈工作，某干部回答笔者说：“这件事老板还没有定，等老板决定了我们再谈。”我吃了一惊：政府干部还归企业老板管？我问：“你们老板是谁？”答：“县委书记呀。”“哪县长呢？”“县长是工头，领着一帮副书记、副县长给书记打工。”哎呀，我无语了：共产党的干部竟然到了这种地步！新闻中常说“老大难，老大难，老大一抓就不难。”充分反映了基层决策没有民主的事实。

二是“自己不懂的事，不明白的事，要自己表态；自己很熟悉的人和事，却不让自己行使选择权。”比如说，本单位领导从来不实行选举制，都是由上级指派。而居民委员会的干部工作如何，除了居民了解，一般驻地机关对他（她）们并不了解。从居委会干部中选人大代表，却要驻地机关单位人员给他（她）们投票。

三是分不清楚科学技术问题还是政治问题，遇到分歧大了，就想通过投票解决。民主真的是被“利用”，而不是受“尊重”。最明显的例子是三峡工程上马，投赞成票的很多人是水利工程方面的“外行”。像这种专业性极强的事物，只适合在不同专业人员之间展开争论，不适合采用简单多数方法进行表决。问题是最终决策者必须要有清醒的头脑，有足够的专

业知识，才能准确判断争论中的意见是非，从而做出科学的决策。

民主程序的具体细节相当复杂。以前往往根据经验，或者仿照别人、别地的办法简单处理，这表明不重视民主的科学性。比如现在国际通用的“民调”，问卷题目的选择、设计不一样，所得出的结论就不一样。所谓民主的“掺假”、“作弊”都是在这些细节问题上“搞名堂”，而不是让你一眼就能看出来那是“假民主”。所以，民主是一项专业技术。

为了克服以上三大弊病，为了提高现代民主的科学化水平，我们必须集思广益，广泛收集各方人士的不同意见，综合考虑，形成较为科学的民主程序。

第二个办法是民主试点。我们先集中在县以下实行政治改革，逐步摸索中国式民主的步骤和要点。基层领导干部一定要选举，但具体如何搞法却大有讲究之必要。在不同地区不同县市，选点试行县、市委、政府领导班子选举制，是对基层党员和人民群众进行民主教育的必要环节。没有这些试验性的实际操作，不可能总结出中国式民主的要点。

中央有关部门集中政治精英对于中国式民主进行研究。希望在理论探索中，在不断地争论和辩驳中，提高我们对于中国式民主的认识水平，为基层的试验进行理论规划和指导。特别需要解决的重点和难点问题：**如何形成既有实质性民主，又能形成全民族统一意志，这样一种辩证的民主政治观和实施举措。**

只要我们的各级领导干部，都是通过彻底的民主程序产生的，不是由“首长”个人提拔使用的，他们的领导行为必须是对人民负责，对国家负责，不是只对首长个人负责。这样，就算是彻底废除了干部的“首长提拔制”。

彻底废除干部的“首长提拔制”，是“反贪治腐”的根本性举措。因为非正常谋利的企业“攻关对象”，就是各级有实权的领导干部。而群众对自己的顶头上司无可奈何的真正原因，就是无权也无力对付这种坏干部。——他有很硬的后台，老百姓惹不起。如果干部的提拔和倒台，主要依据法律并参考下属群众意见，由上级组织调查落实后再做决定，领导干部要想贪污腐败就比较困难了。

第七节 管理制度的科学设计

英国资本主义民主革命，建立的是“君主立宪”体制。以后资本主义革命建立的政治制度，本质上是“钱主立宪”，资本主义国家宪法的本质，是保护资本的利益。对于重大政治方针，资本拥有最终决定权。

参考他们的情况，现在中国要搞的是“党主立宪”，因为经过一百多年的艰苦奋斗，中国共产党证明了自己是全体中国人民利益的真正代表。“党主立宪”，本质上就是“民主立宪”。人民的要求具有天然合理性，但人民必需组织起来，才能相互协调、统一

意志、同心同德，取得政治改革的有益成果。中国共产党就是能把中国人民组织起来的中坚力量，意志核心。

社会管理就是政治。中山先生的这一观念必须由我党中央正式给予确认，所以要写入党的政治改革文献前言部分。同时，前言还要阐明“阶级合作与民族团结是党在新时期的政治纲领”。确定了这两个关键的意识形态问题，就亮明了中国共产党适应时代的政治进步。这恰恰是真正坚持了马克思主义！

这次政治体制改革最大的阻力，是在官本位体制下得到好处的贪官污吏们。他们作为西方资本家阶级在国内的代表，也一定会利用党的政治路线转变的关键时刻，搞一些阴谋破坏和阻碍活动，对此必须保持高度警惕！但是，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到“以阶级合作为纲”，毕竟是根本性的意识形态转变，有些党员和群众思想一时转不过弯来也并不奇怪，所以对于反对力量也不必草木皆兵。总的判断是：“以阶级合作和民族团结为纲”一定会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对港、澳和台湾同胞、海外华人，甚至外国友人，也有很大的吸引力和研究兴趣。

我的设想从基层开始。2024年6月28日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共八章六十七条，2025年5月1日起执行。大概需要一年多的准备工作。但内容没有涉及领导人选举问题，所以在这里还需要谈些历史上的经验教训，供相关部门参考。

手机微信里推荐南街村的文章和段子不少，其建设成就令人瞩目。他们对于老人、儿童、学生和生活困难者的照顾十分体贴周到，让人感觉好像共产主义美景就在眼前。但是，这种强大的经济实力从何而来？单靠农业生产不可能做到！他们依靠的是强大的村办企业！南街村的食品业和其它轻工业产品很多，而且销往全国各地。南街村还雇了不少外地工人，从事轻工业劳动。社办企业的赢利属于村集体经济收益，这才使他们有实力来做这些事情。那么这些有大格局的举措是谁决定的呢？是村党支部集体决定的！现在宣传者喜欢讲带头人王宏斌，不讲党支部集体领导，与宣传者的主观目的有关：讲前三十年好，就要突出宣传主要领导人。

我在参观南街村的时候，没好意思问一问：他们与外地打工者的合作当中有没有“剥削”？这是很难说清楚的问题，因为传统的政治经济学，没有讲清楚生产资料价值增长机制的高度复杂性，和定量表述的极端困难性。如果我真这样提出问题，很可能被视为“挑衅”，与“学先进”气氛不合，要犯大错误。有人说，南街村的现状很凄惨，这我就不了解了，因为我是上世纪去的南街村。

如果强调以阶级合作为纲，集体领导，民主政治，这些都不会成为问题。

党支部实行集体领导，即由支委会领导。普通党员在支部大会上可以行使民主权力。但是党内这种民主意识，在社会上却没有推广。例如，一个党员在会议上可以批评支部书记或委员；而一个中国公民，却没有机会和权力批评地方或行政领导人。这就是当前中国贪污腐败成风的深层次原因——干部失去群众监督。

这充分暴露出我国的管理制度极不科学，首长提拔制和干部失去群众监督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它们表现不同，本质一样。

有人提出：领导干部财产完全公开，就可避免贪污腐败。国外（如新加坡）就是这样做的。但是，领导有子女，有亲戚，有朋友，财产公开到那个范围为止呢？老婆孩子算，弟妹呢？弟妹还有亲戚朋友呢！这怎么办？亲戚的亲戚，朋友的朋友，这个边界无法划分。如果全国人大批准，干部收入公开，我是支持的，但是光靠这一个办法肯定还不行。领导干部优劣的主要标准，是看他用人和决策。如果人民群众对于领导干部用人和决策不能监督，民主就失去实质意义。制度的设立与改变，根本要求是便于群众对干部的监督和管理。

以村为基层举例。在18岁以上的村民中，不分性别和学历，每十位公民中选一名“村民代表”。这个“代表”完全是尽义务，当选后不愿意干可以马上换人。他（她）们的任务就是对村干部实行监督。但他们自己应该作风正派，不因为与村干部有特殊关系就放弃职责。一旦发现有循私行为，立即更换。

村干部每五年选举一次，特殊情况可以提前，但一般情况下不允许推后。所谓特殊情况，是指不改选就无法正常进行工作，比如主要干部外出、生病时间较长、正副职意见分歧严重，无法缓和沟通，如此等等。这些内容要公开写在村委会组织原则的意见书里面，在全体村民会议上讨论通过。

在基层一般不实行双首长制。“家有百口，主事一人”的情况，短期内很难改变，也没必要改变。尊重还是漠视副职的不同意见，也是对主要负责人政治修养的一种考验和锻炼。

村干部的职务补贴问题，可根据各省市具体情况采用不同的办法，没有必要全国统一标准。笔者建议：由县行政开支提供少量补贴，村长还是要靠个人劳动发家致富。作为职务补贴，跟发工资概念不同：一般情况下，不允许超过当地村民正常年份人均收入的一半。这和乡镇“脱产干部”的情况不同。村民代表和村管委会的副职及一般委员都是尽义务的，政府和村民没有义务给他们发补贴。正因为如此，才更能显示出他们为人民群众尽义务的奉献精神。

人民公社有自己的管理制度，但这跟地方行政管理是两套不同系统。在一般情况下，不允许混淆。

村以上管理单位，不属于“自治”范围，而是典型的“行政管理”。

建议中国确定为三级行政管理模式，逐步撤销地区级机构，从中央经省（省级市）直达基层。但是，这个“基层”的规模和级别可以相差很大，这就给每个基层的领导集团提供了自主管理的充分舞台

最大的基层是原来的地区级城市。一般说有几十万人口，有一定规模的工业，交通运输业，医疗、教育、文化、体育等各项事业。还管理一部分农业、渔业、林业等等。省会城市往往是其中的佼佼者。

凡属于行政管理范围，就必须实行严格地“双首长制”：党委书记和行政负责人是完全平等，相同级别的领导干部，他们当中没有谁领导谁的问题。“常委表态公开化”原则，包括行政和常委会两边都必须公开：常委在行政会议上的表态在全体公民范围内公开；书记和常委们在常委会上的表态，在全体党员范围内公开。领导意见（包括他们中间的分歧）不公开、不透明，就没有了真正的民主，没有了群众对领导的监督。至于公开所采用的具体方法可以商量，但至少要到内参一级。这样公开化，不怕泄密吗？当然不怕！我们现在如此对群众保密，对国外的泄密还少吗？既然如此，干脆公开了怕什么呢？除了真正的国防机密另当别论，其它没有什么不好公开的，特别是牵涉群众利益的大事，越公开越好！只有搞阴谋诡计的人才见不得阳光！贪污腐败分子最害怕行政公开。

行政和政治首长平等原则，常委意见公开原则，都是民主的最基本要求。如果一切重大事件都实行内部操作、闭门处理，还敢说自己是民主政治，人民的政府，那就只能是骗人！

秘密活动是战争年代流传下来的思维和处事习惯。到了和平建设年代，到了一切以民为主的年代，我们还敢借助“保密”以营私，那就只能说明党的性质变了！如果这样，无数革命先烈的血就白流了！十年“文革”的苦难就白受了！

有人提出文明国家的标配：“政治有普选，经济走市场，教育重素质，司法有公正，言论有自由。邪恶国家的特色：政治无选举，经济靠行政，教育唯分数，司法看特权，言论无自由。”

他在这里所说的并非完全正确，至少可以认为基本合理。不说照抄照搬，至少可以参考一下吧？

作为“老公民”，我都几十年没有选举过了。前面已经说过了选举的滑稽故事。行政干预经济是官员们贪污的利益来源。如果行政无权过问经济问题，也不利于地区的经济发展。面对两难处境怎么办？唯一办法就是依靠人民民主！人民没有民主，官员必

然贪污腐败！官员的贪污腐败程度，可以显示出人民民主的丧失程度，二者呈正比相关。

说到司法问题，当前的某些混乱有其客观的原因。

司法公正，并不像人们所想象的那样：对原告、被告双方“一碗水端平”。这个问题很好理解：涉案人员的品德修养差别巨大，在案件发生、发展和进行的过程中，当事人的所作所为会引起公众的同情或者愤怒。打官司靠钱支撑，律师诉讼费是一笔不小的开支。打官司要看看谁请的律师更过硬，更有本领。所有这一切，最终都会影响司法的结果。

但是，有些事件的判断已经引起了公愤：见义勇为者为救助受害者，不得已而伤害了凶手，就被好坏不分，当作“打架斗殴”处理。如果这形成惯例，以后谁还敢见义勇为，打抱不平？如果大家遇事都“各人自扫门前雪，那管他人瓦上霜”，这个社会还怎么得了？

当然，归根到底，这还是政治制度的设计问题。政治体制改革的紧迫性，由此可见一端。

第十章 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办？

上一章，在谈到现存严重问题时，已经谈到一些具体的建议和办法。在这一章，要全面系统地提出政治体制改革的方法和目标，供广大人民群众和相关部门领导参考。不足之处希望能给予补充，如有错误也希望得到批评和纠正。

第一节 运用系统政治思维，彻底改变我们的思维方式

有人（胡昌喜）提出制约党的理论建设的八大问题，我觉得讲得很对，现抄录如下：

一、理论体制问题比较突出。体制不健全，缺少整体设计与紧密联系，机构之间显得松散零乱，九龙治水，个个无力。虽然我们有项目规划和理论攻关，但是它们代替不了体制的功能。体制不健全，从根本上制约着党的理论建设生动、活泼、有力地向前、高、广、深的方向发展。

二、理论上“党不管党”问题比较严重。从省委书记到市委书记、县委书记，真正关心、热衷并善于推进理论建设的人少之又少，重视“秤杆子”，轻视“笔杆子”，几乎是一种普遍现象。省委书记像省长一样，市委书记像市长一样，县委书记像县长一样，忽视理论建设与热衷经济方面“大上项目、上大项目”的火热场面形成了强烈反差。

三、理论官僚主义严重，而且长期未引起重视，几乎成了作风建设的“世外桃源”。现在，不仅许多党员和人民群众关心的重大理论问题迟迟得不到回应，而且许多人耗心费力所取得的重要理论成果也被拒之门外，思想上升的通道几乎已被堵死，党的群众路线似乎不适用于党的理论建设。

四、理论探索、创新的精神勇气不足，缺少毛泽东、邓小平那样敢为天下先的理论豪气与勇气。具体说，就是在共产主义原理的探索上、在对资本主义的再批判上、在对社会主义思想的反思与超越上，几乎没有什么大的动作。一方面，我们要求广大党员干部坚定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另一方面又不去深化共产主义的理论研究，这种矛盾现象持续几十年而没能引起注意与反思，不能不说是一种反常的现象。

五、教条主义严重，远远没有从“六经注我、我注六经”的学术桎梏中解放出来。现在，无论是时代的发展还是人类文明的进步，都迫切需要在马克思、恩格斯奠定的基础上继续大步前进，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都具备了大发展、大繁荣、大突破的思想基础与社会条件，唯一缺少的就是思想本身的大解放。思想阻碍着思想，这种状况不能再继续下去了。

六、不能正确对待和汲取历史上的经验教训，在理论探索上忽左忽右，进、退失据。从“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到把共产主义理论束之高阁，从把计划经济批得一无是处到对市场经济的盲目崇拜，不仅导致我们在思想、理论宣传和实践上的种种被动，而且蕴含着使社会主义事业归于失败的巨大风险。对此，不能不引起全党的高度反思与重视。

七、语言、概念笼统模糊，意思表达的不简练不直接，无论是听的人还是解释的人，都挺费力。比如中国化、中国特色等等提法，不仅外国人理解上费力，即使是中国人包括许多党员干部，有多少人能言简意赅地把话说清楚？既然如此，我们为什么不能在语言表达上加以改进和完善呢？为此笔者建议，文风建设要抓就从根本上和关键处抓起，无论是说法还是提法，都要服务于实践而不要为难实践。

八、缺乏强烈的理论危机意识和自我批评的理论勇气与制度设计。痛心疾首指出问题的文章、言论少，报喜不报忧成为一种常态。往轻了说，这是理论上的不负责任；往重了说，无异于自我毁灭。本来，批评与自我批评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和克敌制胜的法宝，但却被某些人异化为表扬与自我表扬。这种误党、误国、误民的不良风气，该到了狠批狠煞狠治的时候了。

我基本上赞成胡先生的上述看法，总的结论是：我们太过于轻视理论建设。

本书第二章，已经说明了系统论就是当代辩证法。但是，要用系统论的思想来认识和讨论中国的社会管理问题，即真正接受和运用“系统政治”理念，还是非常困难的事情。这里的原因很多，在哲学上，在思想政治方面，我们至今还没有承认和接受系统思维的指导。全党全国，根本没有把万里同志的教导当一回事，这非常可悲，但这是事实。

中央和各级地方党校，是各级党政领导干部学习哲学、社会科学的地方。但是，现有党校教材存在的问题相当严重，必须彻底改变。

首先，我们对待中华传统文化的态度，不符合党中央弘扬中华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辩证法之根基，就在中华传统文化中的道家。坦白说，我们对不起辩证法的老祖宗老子，对于《道德经》不甚了了。恳请中央党校，组织古文功底深厚的专家们，学习和研究《道德经》。希望采用现代汉语深入理解和阐发老子思想的辩证法灵魂，编制成供领导干部们学习的《道德经》原文及现代汉语译本。

对于孔夫子及其后代弟子们的东西，不能全盘否定，但也不应该不恰当地抬高他们的地位。遍布全球的《孔子学院》必须改名，建议改为《中华文化学院》，不能让封建糟粕走向世界。

对于《孙子兵法》的看法，要立足于它是“古代系统政治教材”的角度进行攻关研究，编写教材，供领导干部们学习使用。

再也不要黑格尔那一套“对立统一、质量互变、否定之否定”，当成什么辩证法的“三大规律”了。要确信：所谓“三大规律”只是“形式辩证法”，没有触及辩证法的本质和灵魂，远远不如中国古代道家对问题的认识深刻。

如果我们这样做了，无论遇到什么问题，我们就会将它摆在与事物整体相关的具体位置上去思考，就会将它与别的主要相关问题联系起来思考，就会将事情的前因后果联系起来思考。这就是运用辩证法思考问题。应该得出什么结论就得出什么结论，不要硬去套所谓“三大规律”，这样就可以避免教条主义。

当然，一切规律都是在特定条件下才有效。注意条件变化对规律的影响，是辩证法最能给人智慧的地方。武松打虎是英雄，今天谁再随便打死老虎就犯法了。因为条件变了！《孙子兵法》讲的“道、天、地、将、法”，就是取得战争胜利的五大条件群。

如果我们用这样的思想，来考虑政治体制改革的具体方法和步骤，就会取得成功。但是，我们也决不会认为事情轻而易举，因为相关条件的变化比较复杂、深刻，不容易看得很清楚。有了这个思想准备，我们就不会犯大的错误。

第二节 让共产主义因素，不断地渗入我们的社会

我们党的名称虽然没有改，而共产主义的信念却已经丧失得差不多了。前面所说的大量问题，都跟共产主义信念的丧失有直接关联。在上面的引文中，胡昌喜先生其实也提到这个问题。

在第三章我们说到：只有把全球看成巨大而统一的生态系统，才能做到“世界大同”，即实现共产主义。所以，这个很难做到。

一种认识，就是以为“共产主义”是将来的事情，现在大讲共产主义有点“好高骛远”。如果对照早年革命者参加革命的时候，前辈们都是怀着“为实现共产主义伟大理想而奋斗！”的信念而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可是上世纪中期以后，我们再也很少谈及共产主义了。这七十年所发生的一切，包括左和右的不同性质的错误在内，都和我们不能正确对待和深刻认识共产主义有直接关联。

我们党所领导的革命斗争，长期以来都是有着远大目标来鼓舞和鞭策自己。可是，经过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战斗洗礼”以后，再经过两年反文革揭发批判“四人帮”，我们对于到底什么是社会主义，已经真的迷惑了。放弃以阶级斗争为纲，大力发展生产力，改善人民生活，就是“社会主义”？这不是过去早就批判过的“唯生产力论”吗？建设和谐社会，就是社会主义？新加坡等国，好像社会也很和谐。北欧某些国家，人民福利比我们还好些呢！党的领导加公有制，就是社会主义？苏联解体向我们展示了所谓社会主义的极其恶劣的先例。说不迷惑是假的！某位前中共中央领导人，公开承认自己不知道什么是社会主义。这位同志讲了真话！表现出难能可贵地坚决拒绝不懂装懂的正直品格！

究竟什么是社会主义？建国以来我们一直在争论，只要仔细对照一下历代领导人关于社会主义的谈话，就不难发现：我们对于社会主义的认识一直在变化和更改之中。这种认识的不断变化，说明了我们最初的认识距离实际太远。所谓“中国特色”，实际上根本讲不清楚。由于大家知道的原因，我们不愿意公开承认这一点。党中央政治理论研究机构和宣传部门极力回避此类问题，不敢向人民群众进行宣传和解释。这里既有不懂装懂，也有懂了装不懂。一切以所谓“跟中央保持一致”为借口，宁可无所作为，也不敢“为天下先”。把毛泽东同志“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的教导忘得一干二净。

对比资本主义社会，我们就会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有比较清醒而准确的认识。所谓资本主义，就是把“资本”当“主义”——一切唯“资本”的马首是瞻，一切政党和整个社会都要服从资本运动规律的指挥。从本质上说：连大资本家本人，也是资本的奴隶！

在资本主义社会，工人工资不被看作是社会财富的分配，而仅仅是像机器需要维修那样的生产成本。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理解华为“员工人人有股份”的革命意义，因为股份才属于成果分配范畴。

社会主义应该如何定义？我以为，把整个国家的社会进步当成“主义”，用来指导一切，衡量一切，这就是社会主义。《共产党宣言》已经对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进行了极其严厉地批判，我们还能重复前人已经犯过的错误吗？

但是，追求社会进步是向哪里进步？就是要向着共产主义进步！所以：

凡是不以共产主义为奋斗目标的社会，无论其多么先进，多么发达，多么亲民，都不属于社会主义社会！用这个观点来检查今天的中国，我们还配称为“社会主义”国家吗？请看事实：

道德的沦丧，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贪污腐败的党政官员层出不穷，像陈行甲同志这样好的领导干部反而受到孤立和排挤。官场逆向淘汰十分严重，普通群众又怎么样呢？老人跌倒了不敢扶，不是没有爱心，而是怕被讹诈。公开的宣传口号都那么不可思议：“不要打架，打赢了坐牢，打输了住医院”。难道就不要分清谁先动手打人，谁是被动还击吗？法律是干什么的？恶狗伤人，被受伤者打死，狗主人不但不安抚受伤者，反而要受伤者赔钱买狗。种种怪事真假难辨，但居民的道德水准普遍下降，是社会上谁都承认的事实。有人说：做好事不得好报，社会道德就会败坏下去，事实也正是如此！上行下效，自古亦然。上层有那么多贪污腐败官员，基层群众的道德品质，即使原来还比较好，也让哪些坏干部给带坏了！遇事不先讲道理，而是先讲送礼，办什么事都要送礼，结婚要大彩礼，物质利益第一。当干部首先要讲究跟对领导人，不是讲究如何为人民服务。

我国贪污腐败的官员从人数、级别、总金额都到了“空前”程度，能不能绝后？谁也不敢保证。甚至还有人提出“合法腐败”概念，因为腐败者捞取巨大利益的每一步，都是合法的。有人说现在是“各食其能，各谋其利”，没了社会责任心。仅仅把这些当成是耻辱，要求狠狠地打击贪污腐败分子，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追查造成这种后果的根源，就是一切按官本位办事，不是按科学本位办事。权力分配极不合理，应该有权的人没权，不该有权的人，反而有权。这种“官本位”制度为什么长期不能改变呢？

共产主义是无产阶级为之奋斗的长远目标，但长远目标决不等于现在不做。如果现在不做，目标将永远只能是目标，成不了现实。我们主张共产主义实行“各尽所能，按需分配”。实际上我们已经做了一些“按需分配”的事情，比如救灾、扶贫，对弱小国家的援助，如此等等。但是，我们国家所推崇的政治经济学理论，没有“按需分配”的合法地位——这是懂了装不懂的一个例子。

接受历史教训，对于“按需分配”也必须加上限制语：按科学和合理的需要进行分配。但这还不完善，还要把接受分配的主体讲清楚：**家庭**。

所谓社会主义，应该就是逐步向共产主义过渡。前苏联的失败，还有我国 70 多年的事实证明：没有共产主义因素的强力介入，社会主义就根本搞不好！

第三节 按劳分配为什么是“空想”？

首先必须承认：所谓社会主义的按劳分配，就是脱离实际的空想！现实中根本做不到。

原因之一：劳动的质和量难以准确计量

实行“按劳分配”的前提是：对于每位劳动者所贡献劳动的质和量有明确的度量和清楚的记载，这一点实际上根本做不到，因为客观上无法准确测量和记录每位劳动者所贡献劳动的质和量。

最容易计量的是工厂里的计件工资，人们也是根据这个设想出按劳分配的分配方案。但是，能保证机械运转效果完全一样的前提是：机械没有故障，电力供应正常，送入机床进行加工的原材料完全正常且品质一样。要做到这一点，工厂里的电工和机修工必须高度准确地发现问题和十分勤奋地工作，及时解决问题，甚至连运输工人都不能有丝毫懈怠。但是，他们这些人的劳动量，无法和加工工人的劳动进行量的比较。

最难以量化的是脑力劳动的质和量。我们给技术人员评定薪资级别，常常只是根据其学历和工作年限，与他们劳动的质量、数量没有任何联系。

在农村，实际采用的办法常常违背按劳分配原则。人民公社的普通社员比书记、队长收入明显要低，社员们对此不满。但是我们设想一下：领导工作不计工分吗？领导工作究竟该算多少工分呢，真是天知道！因为根本无法定量！

原因之二：相同的劳动可以有完全不同的结果

即是说，实行按劳分配更大的困难在于：劳动的成果量（及品质）与投入的劳动并不成正比。

我们尽量把劳动者所处的客观条件设想得相同，或者相近，但所得到的结果仍然可能根本不同。因为：**是劳动的条件组合决定劳动结果，单单劳动本身并不能决定劳动结果。**

设想有三个条件相近的山区村子，简称张村、李村、王村。在三个村子同时用三十名劳动力打井，同样的工作一个月。结果在张村打的井，涌出来的是好水，水量大且稳定。在李村打出来的是干井，一滴水也没有。而在王村打出来的是煤矿，可供自己开采。至于以后会不会发现这是比较大的矿，要由国家收回去统一开采，尚不得而知。但即使如此，王村村民也会因此而变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

人们对此怎么想呢？三个地方的地质条件完全不同，村民们不了解地质情况，就以为李村人命不好，张、王二村的人命好。有些贫困地区的人，经常会无奈地说：不能怪政府啊，只怪我们命苦！

条件决定一切！而不是简单地由劳动决定一切！

事实上我们要走的扶贫之路，主要就是改善当地发展经济、社会、文化的各项条件。“要想富，先修路”，本质上依据的就是这个思路。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首先想到的就是贫困地区和落后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条件问题。

原因之三：我们的主观认识距离实际太远

我们的政治经济学根本不管这些实际困难，从理论到理论，把前人的空想，当成自己奋斗的目标。结果怎么样呢？

因为对社会主义认识的非科学性，造成**分配制度演变的主观随意性**。

把“按劳分配”当成金科玉律，实际执行的结果却成了按“捞”分配，这是对现行分配制度不满的人对此种现象的讽刺，跟在后面的话是“能捞则捞，不捞是草包”。这说明现行分配制度有极大的主观随意性，缺少科学根据。

建国以后的和平时期，随着物资丰富程度的提高，分配的主观随意性就越来越严重。量变引起质变，这已经形成一个悖论：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社会物资越丰富，人们的思想觉悟越低，精神境界越低下。**衡量分配制度好坏的唯一标准，就是看它对于社会进步到底起什么作用？**当着一种分配制度，不再能推动社会进步，而是产生足够多的“毒副作用”时，我们仍然不检讨自己的分配理论，死抱着旧观念不放，前途堪忧啊！

前面，我们修改了关于社会主义的定义。作为一种尝试，我们也提出“按劳分配”的新含义：**按国家全体劳动人民的整体意志进行分配，就是“按劳分配”。**

如果我们真这样改了，就是放弃了原来机械理解的“按劳分配”梦想。

《共产党宣言》有个基本观点：“**共产党人强调和坚持整个无产阶级的不分民族的共同利益**”（单行本第37页）如果真这样改了，上述“按劳分配”的新定义与此完全符合。其实，这就是我们中国共产党人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观念的思想和理论基础。即使你搞的社会主义很科学，单单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也很难搞好；但是，毕竟可以起到榜样作用。我们立足现实，并不放弃未来。

以上分析也足以说明：**权力并不是价值的真正来源**。但是，权力运用失当，必然会破坏社会生产的科学性和良性互动，结果是灾难性的。所以，权力和利益必须脱钩。官员们再也不应该按级别涨工资了！

第四节 新的分配模式构想

中国语言丰富且准确。中国人把“国”称为“国家”，意思是“家是小国，国是大家”，治国如同管家。

在一个正常家庭内部的物资分配，一般是这样：父亲、母亲这一辈，是负责“赚钱”的，保证家庭正常收入。未成年子女，基本任务是在学校学习，一般不允许他们去“赚钱养家”。如果真出现“小孩子劳动养家”的事情，这个社会就极不正常。老年人，即爷爷、奶奶们，必须是安享晚年，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家里决不会要求他们像青壮年人一样去“创收”。当然，社会支付给他们养老金和提供其它特殊优待是另外一回事，子孙们决不会计较。

对比国家，社会生产成果的分配问题，必须把社会生产的全部产品以及它们的相应价值，明确地划分为本质不同的三个大的组成部分：

第一，保障社会基本需要部分（代号 A）

例如：国防开支，行政事业经费，医疗卫生费用，基础教育费用，文化事业经费，体育发展经费，育儿、养老基金。包括社会科学研究和宣传事业经费，国家批准的网站和各类信息平台、报纸刊物出版发行等等，必须实报实销，由国家和地方政府给予保障。在本质上属于事业单位者，全部经费由政府财政支付。

改革最大的失误，就是让事业单位失去事业心。不管文章好坏，水平高低，给钱就发表；不管著作政治方向是否正确，论述水平高低，给钱就出版。我将此称为“饿死鲁迅的政策”。这极大地破坏和阻碍了中国文化事业的发展 and 进步。

本来，事业单位和企业单位是互补的，它们谁也离不开对方，为对方提供生存条件。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就造成二者趋同；而趋同破坏互补：双方功能雷同，就不再互相需要。文化、教育、卫生、体育是标准的事业单位。它们都用“赚多少钱”来衡量是非成败，就和专门生产产品用于销售的企业单位的考核标准雷同。也就是一切向钱看，让事业单位失去事业心，破坏了企业和事业的互补关系。地质勘察单位也是事业单位，所受冲击较小，因为其对社会影响较小。它的性质决定了它不容易被企业化：它是地下情况的侦察兵，而侦察工作成果无法直接用来投入市场交换。矿产资源归国家所有，人们还不敢突破这一框架。

文化部门有些特殊：其奋斗目标是提高国民的文化素质和道德水准——这当然属于事业。但看戏看电影又不可能不收费，因为其兼有娱乐性质。要坚决杜绝以票房收入作为衡量文艺节目水准的任何做法。体育情况也比较复杂：促进全民健康是其目标，当然属于事业。但观看体育比赛完全免费也不现实。最让人难以接受的是教育和医疗卫生的“企业化”管理。教育改革正在进行中，而医院和医生的腐败，已经到了令人深恶痛绝的程度。必须确定在一个短时期内，实现全民教育免费和医疗免费的目标。医生和教师工资待遇，应参照公务员办理。

第二，给不同劳动者的报酬部分（代号 B）

各类干部职工的基本工资属于此类。劳动报酬本质上是合同兑现，不必考虑所谓的“按劳分配”原则。劳动者觉得“不划算”，你可以同用工者商量修改合同。干部职工请求调动工作有各种原因，其中也有认为原单位工资偏低者。在这种情况下，用工单位和干部职工个人往往可以商量着办，双方的谅解、合作比什么都重要。在“**以阶级合作和民族团结为纲**”政治思想指引下，完全有可能达成相互谅解，增进双方的

团结、合作。在特殊情况下，第三部分价值分配方式，可以帮助解决靠修改劳动合同也解决不了的问题。

第三，充足的奖励基金（代号 C）

这部分价值分配，必须是“事后兑现”。这要根据几个月甚至一年以后，或者更久以后的情况，客观准确地“论功行赏”。

比如地质找矿工作，等到一个矿区经过勘探证明为大矿之后，才能依据地质人员在找矿中的不同贡献，还有行政干部、工程人员、辅助人员对此做出的贡献，分发不同额度的资金奖励。

再如工程建设。必须经过质量检查部门验收，认为质量很好。例如：大桥通车以后，安全和通过能力都达到很高的水平，有关奖励才能按贡献大小发放。

农田改造不仅使粮食或经济作物增产，生态环境也得到很大改善，上级应当组织对相关劳动者和组织者、工程设计人员发给不同份额的资金奖励。

社会应当逐步增大第三部分价值（C）在分配中的比重。这样做将逐步提高劳动者对于今天的工作，对未来可能产生什么影响及效果的关心和认识程度。对于全体劳动者关注长远规划的意识，会有明显地增强和促进作用。久而久之，在中国人当中，有远见的人会越来越多，而只顾眼前利益的人会越来越少了。

立功奖励的科学性、公平合理性，是一个全新课题，需要结合专业部门提前进行深入地研究。领导干部参加这种研究，把握好奖励尺度，是做好管理工作的重要前提。领导必须努力学习业务，使自己成为所领导部门的内行。内行不等于专家，二者间还是会有些差距。

以上三部分价值分配，要严格区分和明确划分开。一个社会总的消费价值由三部分构成，即公式： $J=A+B+C$ 。用口语说，可以分为：基本需要、劳动报酬、立功奖励三大部分。

这里讲的三种价值分配的区分原则，必须明确，有文字依据和严格规定。通俗地讲，都是拿钱，但其社会意义本质不同。

第五节 真正实现干部的权力由人民授予

彻底废除干部的首长提拔制，可能是政治改革中最难，也是最核心的问题，所遇阻力一定很大。人们常说，当领导的主要职责，一是用人，二是做决策。这种说法，就是把首长提拔干部当成天经地义的事情。让不是他提拔的干部配合他工作，万一出什么问题还要他负责，这不是很不合理吗？

如果我们认真回顾历史就会发现：领导干部的助手，并不完全是由他自己挑选的。在长期封建社会里，是皇帝（有时是宰相）给你安排助手。你想要谁，也得经过皇上同意。现在，江山是人民的，我们就把人民看成皇上，难道不可以吗？如果不可以的话，我们还怎么好意思高呼“人民万岁！”呢？在党的二十大上，习近平总书记所做的政治报告，提出了六个“必

须坚持”，其中第一个就是“**必须坚持人民至上**”。所以，政治体制改革以后，**必须把挑选和配备干部的权力真正交还给人民！**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有一个提法：“**全面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全面推进，……人民当家作主更为扎实，……**”

（以上见党建读物出版社，《党的二十大文件汇编》第14页、第8页）

为了落实这样一种“全过程民主”的政治理念，就必须把选择干部的权力真正交还给人民。现提出以下具体建议：

一、民选干部从基层做起。长期以来，干部配备存在着奇怪的现象：我的顶头上司是谁，我根本无权过问。而居民委员会选人大代表，却要让我这根本不了解情况的公民去投票。把公民权力仅仅用在选举各级人大代表上，是收小失大，对于全过程民主来说，仅有形式意义而没有实质意义。

什么叫全过程人民民主？就是要从每位公民自主选择直接领导开始！

这里所说的基层，是指机关行政管理方面的基层。事业单位也适用同一原则。而每个企业怎么做是另外一回事。因为每个企业的领导班子都有自主权，企业管理层如何选择干部，由企业自主决定。但企业行为不能跟党和政府唱反调，因为社会是大企业，企业是小社会，即自主权在合理范围之内。

被选举人由上级人事部门确定，推荐人数应该达到至少“二选一”的要求，可以更多，但不可再少。在基层群众比较了解后备干部情况的单位，候选人也应该由群众直接提名。只有候选人数超过实际需要人数，选举者才有可能认真地进行衡量和挑选。候选人需要有认真地自我介绍，及如果当选以后的承诺性表态。

中间阶层干部的选举，可以参考基层的办法。有关的全体公民要直接参加选举，候选者的介绍和表态可利用网络进行。国家、地方的行政选举也采用相同的办法。而党内选举出于保密需要，要另外采取妥善办法。但是，原则上不能对全体有关党员保密。**中共正式党员一定要参与党内选举的全过程。**这个全过程，包括中央委员、常委和总书记的产生，都可以对正式党员保密。

二、努力建设党中央高层民主

需要重点研究的是：党中央委员会的领导如何产生。

建国以来最大的教训是：**我们没有研究，更根本谈不上执行一个好的中国式的民主接班程序。**

我们反对台湾多党制的所谓民主，也反对西方资本主义的政党轮替，但是我们自己却没有创造出的一套全新的领导班子交接班程序。最高领导人年事已

高，话都说不清楚了，却要临终指定“革命事业接班人”，由此带来的后果十分严重。

这种情况同建国后实际上废止了领导班子的“双首长制”有直接关系。没有明文规定，却实际执行着“一个人说了算”的决策模式。“英明伟大”如毛泽东者，几次选择接班人都失败了。文革中被打倒的刘少奇、林彪、王洪文，都是他亲自选择的“革命事业接班人”。难道能批评毛主席昏庸糊涂吗？谁敢这样说，“毛派”的吐沫都会把谁给淹死！造成这种荒唐结果的，只是因为党中央交接班，缺乏一个科学而有效的民主机制和程序。

民主的第一步：在全体中共正式党员范围内征求意见

每位党员可以向党外群众征询意见，也可以同其他党员商量。但最终正式提出意见，一定要是出于自己对党的忠诚。

全体党员议论的第一步，就要达到中央委员这个级别。这和按党员人数比例选举出席全会的党代表并不矛盾。换言之，在本单位反对某个人当党代表的党员达到一定比例时，上级党组织就有责任撤消这个党员的代表资格。仅有少数人反对，也要弄清楚反对的具体原因，看是否影响其代表资格。提出这个要求，是因为曾经发生过的事情，在我所在的党支部，就有人在其所在支部多数党员明确反对的情况下，硬是被上级党委“指定”为党的代表，出席了党的上级代表大会。

一般说，中央委员应在出席全体会议的党员代表之内选举产生。因故不能出席大会的少数人，需要有特殊的情况说明。

第二步，中央高层的民主设计。

全体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经选举产生以后，就进入中央高层民主程序。它不仅关系党和国家的命运，更是为中下层党组织提供民主的榜样。中央民主搞不好，全国全党的民主就都搞不好，会让民主成为空洞无聊的口号。新中国建国后的种种政治悲剧，就是这样产生的。

党中央委员会是全党最高领导机关，由它决定党中央领导人选是正确的，但它必须考虑全体党员和全国人民的意志。如果出现全国人民和全体党员要求改组中央委员会的情况，那一定是出现了较大的政治危机。简单说：它有权，但它必须忠于党，并代表人民！

这就是中央高层民主设计的政治前提。

常委会由七或九人组成，因为中共是大党，又是领政党。在正式选举之前，候选人如果是知名人物，应该征询一下各“协政党”（即原称“民主党派”）和无党派著名民主人士的意见，供中央选举委员会参考。

由中央委员会全会选举常委，再由常委会酝酿总书记及其他中央领导人选。然后，再由中央全会进行正式选举产生领导层人选。

这里所设计的程序同现在实际运行的程序并无本质区别，问题出在哪里呢？

问题就出在正式会议之前的私下磋商上。在私下商量的过程中，原来班子主要领导人的意见，你不能不尊重，所以被人称为“老人干政”。在我们所说的正式选举之前，原来的一批“核心人物”，即最主要的几位领导干部，就已经把选举结果都商量好了。正式选举，只不过走个形式或者过场而已，很少有脱离原来预计的情况发生。

照我们老百姓的想法，老领导年事已高，退休了就好好休息不好吗？

但上一届的老领导要下来了，往往对于由谁“接班”？下一届领导班子如何组成？特别地关心，很少有“不当领导一身轻松”的表现。从正面说，这是一种对革命负责的精神；而它的负面效果，就是使党内高层民主大打折扣！

思维方式的主观性和惰性，使我们的思想逐渐老化，跟不上时代前进的步伐。领导班子新陈代谢，正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退出岗位而不放心，不放手，就会妨碍党的指导思想的更新和转变、进步。

这件事情，跟我们党的“尊重老领导”、“不允许对过去的老领导评头论足”的执念有直接关系。连“批评和自我批评”是党的优良传统都不要了，不准许党员群众对过去的领导评头论足，只准歌功颂德，不准讲过去历届党中央领导所犯过的错误，这就使我们走上了固步自封、自我陶醉的封闭道路。这种情况必须根本改变，要欢迎党员群众对于过去历届中央领导班子进行批评和议论，正反两面都可以讲，温故知新，对于今后的党中央领导能够少犯错误很有好处。领袖决不能神化，神化领袖的本质就是提倡历史唯心主义，直接与马克思主义唱反调。共产党员神化领袖就是开历史倒车。

第六节 让权力和权利脱钩——改革公务员制度

有些人争当高级别的干部，是为了权势和金钱，为了名和享受。可能有的领导干部最初是为了发挥自身的工作能力，但在“官场”上混久了，也会背叛初心，走上贪污腐败的道路。改革公务员制度，让权力和利益脱钩，是保证公务员不忘初心的制度性动力。

我国现实和历史上的干部工资制度，都非常复杂，甚至可说是很繁琐。行政干部的级别甚至有 24 级，13 级及以上算是“高干”，6 级干部是正省级。也有“官升级不长”的情况，干部在更高职位上工作若干年后，遇到调级机会，“职级不配”就成为他“升级”的正当理由。

技术干部和行政干部不同，有另一套工资升级制度。一般说，17 至 14 级为助理技术员，13 级及以上是技术员，10 级以上是工程师。再上升就是高级工程师。财务和人事部门对这些都非常熟悉，但社会上并不很清楚。有次我凭工件证去住旅店，让旅店工作人员惊讶不已。“你这么年轻就是高干了？我们这里还没有高级的房间呢！”我说：“你看清楚，我是技术十三级！”他明白了，但还是给我找了一间比较好的单间。

公务员的工资制度必须彻底改革。每个月的固定收入，就只有 A 和 B 两项，即基本需要和劳动报酬。立功奖励 C，要等某项工件完成以后，由劳动评奖委员会正式评定以后再发给。

基本需要和劳动报酬，每位公务员都一样，与他（她）所担任的职务无关。

所以，全国公务员就只有“公务员”与“候补公务员”两个级别。候补公务员不能担任领导职务，公务员才可以担任。他们的基本需要并没有区别，只有劳动报酬有所不同。

同样是公务员，从乡长、县长到省长，每个月都只拿基本需要和劳动报酬两项收入，所以他们在工资单上的收入没有区别。只有候补公务员（非领导干部）的工资低于公务员的工资。

以上建议，只有举出具体例子说明，才好理解。但中国的现实工资待遇还有另外一种极不合理的情况：违反客观规律的“地区差别”。

如果从富裕地区支边到困难地区去工作，工作人员的收入增加当然可以理解。但实际情况正好相反：在京上广等富裕地区，比相对贫穷地区（如革命老区）同级别的干部工资要高很多。例如：同样是正高级职称的技术干部，在北京比在南昌收入要高一倍。调查两地物价，差别并不大，这就让人觉得不可思议。

所谓地区差，成了任性的产物：我富裕，我有钱，就可以发给干部较高工资，管你外地怎么样呢！我们的人才都集中在发达地区，收入差过大是原因之一。

要举例说明，又怕被误解，只有取消此种极不合理的“地区差”，才能给人相对准确的概念。

公务员收入 A 部分，应该和全民一样，假设为三千元。在医疗、教育、养老、幼儿抚养由国家统一负担，个人维持正常生活情况下，每月 30 天，每天百元，应该够了。

B 部分是劳动报酬，上班就有，假设也是三千元。不论你担任何种职务，都是每月六千元。省长、县长、乡长、国务院总理统统都是六千元。不管你当什么“长”，都是作决策；而且是通过高度民主的方式，在内行专家协助下进行决策。职务越高，“手下人”越多，决策反而更不容易出错；除非你就是个刚愎自用之人。果真，你就得从更高职务上下来，学会从基层做起。基层领导并不是那么轻松好当的。

分配的第三部分 C, 才是干部收入能够拉开差距的关键因素。果然, 大家就会争先恐后地为国家为人民立功。作为领导干部, 真心支持科研或技术人才建功立业, 他应该也能分得比较高的立功奖励资金, 当然不会超过主要立功人员。

立功奖励资金的合理分配, 主要依靠两个因素: 一是实事求是的评定立功人员, 以及他(她)们的贡献大小; 二是对这种评定过程的民主监督。

这就需要充分地信任和依靠基层民众。没有基层民主, 资金分配就搞不好。当然, 事后应当允许申告, 发现错误就及时纠正。

明确区分三种收益方式, 是缩小社会各阶层收入差距的重要手段, 也是向共产主义目标的过渡。

第七节 用递阶系统的观点认识和管理现代社会

目前中国这个大系统共由中央、省(部)、地(市)、县、乡、村和家 7 阶构成。上一阶领导班子, 把下一阶的成员, 都看成是“自己的家庭成员”; 下一阶则把自己所属的上级阶, 看成自己所在“家庭”的管理者和领导者。全国上下亲如一家, 这正是我们的力量所在。其负面的东西, 则是常常培养出领导干部的“家长作风”。有一利者必有一弊, 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以城市为例, 讨论的最基本单元, 不是家庭, 而是社区。为什么? 因为社区是由家庭上升至社会的第一个台阶。社区搞不好, 党中央的政策就不能落实。按此文定义的“社会主义”, 国家应该把社区干部的选拔和培养, 当成大事, 抓紧抓好。反过来说, 也唯有社区和农村的“村”, 才和每个家庭直接接触, 了解每个家庭生活的“科学合理的需要”到底是什么? 需要多少?

社区讨论结果, 要到区里、市里进行平衡、比较, 上下反复, 才能找到合适的“试验田”进行试验。根据试验结果, 总结并积累经验, 核实后推广。

省、地、县等中间阶, 主要是派出干部下基层指导, 认真地实现下情上达和上情下达, 起到穿针引线的作用。历史的教训是: 中层经常出现“肠梗阻”。所以, 我们在不违反纪律的前提下, 也同意并且提倡由下级到上级, 直至中央进行必要的上访陈情, 甚至申告。

前面我们已提出建议: 中国的阶, 应该由五阶缩成三阶。但这也是漫长的改革过程, 所以这里仍然只依据现实进行陈述。

建议: 由中国共产党中央设立: 中国公民分配制度改革委员会, 负责全盘规划和领导分配制度改革工作。

现在中央正准备对职称制度进行改革。这决不是应急措施, 而应是分配制度全面改革的先声。

分配制度改革的目标: 让新制度成为营造社会和谐和调动人民群众积极性的强大推动力量。

改革中要注意的问题:

一、要充分重视社会生活中的互补原理

协同论所讲的, 本质上就是互补。市场经济条件下最明显的互补关系是买卖互补: 没有买就没有卖; 没有卖也无所谓买。互补双方同时为对方提供生存的绝对性条件。再如城乡互补, 生产、销售企业和运输业互补, 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互补, 人工智能和人自己的劳动互补等等。这些, 在改革分配制度时都是必须考虑的问题。任何社会性劳动成果, 都不是靠单一劳动取得的。

一个遭到更严重破坏的互补关系是官民互补, 过去叫“干群关系”。分配制度改革的最直接目标, 是改善官民关系, 即恢复干部与群众真正的互补关系。

二、明确能够进入社会分配的物资和精神产品的种类和性质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 能够进入社会分配的不仅是钞票。或者说钞票不过是代替它们的表现形式。对于可分配物的社会本质, 必须有充分认识。

粗略划分, 进入社会分配范畴的东西至少有几类:

第一, 支持正常家庭生活消费的各种物资与货币, 比如住房、食品等等。人们真正关心和计较的, 是这一部分的数量和质量。

第二, 公民工作, 特别是事业单位人员工作必须的装备和工作中消耗的物资。比如随着科技的进步, 一人一台工作用电脑、一部手机; 再如医生随身配备的简单医疗器械, 针灸用的银针。地质队员的铁锤、罗盘、放大镜。凡是为工作需要而进行的物质分配, 都能得到公民的理解和支持。比如公务用车, 你办公事, 出差, 参加会议等, 用公车合理, 公民们不会计较; 而人们很反感公车私用。

第三, 属于基本生活、工作必需品之外的高档消费品及其它奢侈品。这一部分东西的来源和去向, 是反腐败中最引入关注的东西。

除了上述三者的区分, 讨论中还会涉及其它分类方法。以上三类物资分配中, 都有可能产生不公平、不合理的情况。公民对此感觉不合理到底对不对? 如果承认其不合理, 又如何进行整改?

除以上三者外, 奖励得当与否, 有时更会引发社会舆论关注。物资奖励带有分配属性, 精神奖励则多与干部前途有关。奖励主要是针对个人, 以家庭为单位受奖者情况不多。贪污腐败官员能步步高升, 也同奖励的来源和授予极不合理有关。提拔干部总要有个理由, 干部的逆向淘汰, 会干的不如会来事儿的, 亲民的不如亲大官的, 这些弊端都是官本位制度造成的。这些问题的实质是权力分配, 也应在此次分配制度改革中提出整改办法, 实现痛改前非。

企盼全新的分配制度出笼。但更为亲民的办法是：为此经常征求群众意见。有不妥之处，随时改正。特别是当领导干部的，应不计较个人及家庭得失。

调查以家庭为基本单位，不以单个人为单位，是考虑到正常消费总是全家共同进行。个人独立生活，尚未成家者，情况虽有些特殊，也与家庭紧密关联。

经过研究、讨论、试验和推广四个步骤，逐渐拿出切实可行的权力和物资分配方案。

附：给党中央的陈情信

敬爱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尊敬的领导同志：

作为烈士后人和红二代，一个因为“文革”而“二次入党”的仅有四十余年党龄的“老”党员，对于我党历史上违背系统政治原则所带来的可怕后果，有着刻骨铭心的痛苦认识。其两大精神肿瘤是：**1，圣旨即真理；2，官本位**。根除两大肿瘤非常不容易，但是如果真的完成了，其意义却十分重大。

本书如果出版，就算是对两大肿瘤开的第一刀吧！

如果有争论意见，欢迎提出，并直截了当地批评和争论。如果认为本书中的想法基本合理，有某些不足，则更希望给予补充和修正。

作者陈建国敬上

第十一章 关于世界政治系统化的理想

前面十章基本上可以自成体系。但是共产党人应该是世界公民，我们必须运用系统政治的观点和方法，来研究世界的历史和现实。由于政治不能输出，必需靠各国公民自己清楚地认识本国的政治，现实是什么状态？应该向那个方向努力？中国的经验可以供外国朋友参考，但不能将中国经验在他们那里照原样复制。照搬照抄外国的东西，我们吃过大亏。所以，在这里用了“理想”一词。

但是，如果中国真的照我们提出的方案，让拿钱少的干部管理和领导拿钱多的干部，彻底推翻“官本位”管理体制，实现“人民本位”和“科学本位”，那么对于世界政治的进步，将是一股强大的推动力量。因为当今中国，无论是经济实力还是军事实力，都在世界上名列前茅，举足轻重。中国在政治上的进步和变化必然引起世界瞩目。

《共产党宣言》明确指出：“共产党人为工人阶级的最近的目的和利益而斗争，但是他们在当前的运动中同时代表运动的未来”。这种对未来的代表决不是一种愿望、一个口号，而是需要从理论与实践两个方面同时展开。为了共产主义目标，也必须探索未来的世界。

第一节 如何认识人类社会政治的现状

探索未来，需要从正确认识现在开始。然而历史是一面镜子，讨论现在也离不开对历史的回顾与评

议。对于全球性问题，特别需要采用古今中外相结合的办法。这是认识和论述问题必需采用的办法。

我们一直坚持的基本观点，是不科学的政治是人类社会灾难的总根源。现在中东和乌克兰的战争硝烟，是现代政治不科学，反科学的铁证。

有人说：“社会因理性而生，感性而亡。义胜欲则昌，欲胜义则亡。”这话说得有道理，有史以来的大规模战争都证明了这一点。

古代中国人对于战争的正义和非正义十分敏感和重视，大凡农民起义，都要求高举“义”旗，出“义”兵。诸侯争战，也要分清楚正义与非正义，例如武王伐纣，无论当时的老百姓还是后来的史学家，都认为周武王代表正义一方。所谓正义，就是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但是，2023年以来的俄罗斯与乌克兰之间的战争，在中国人群当中，竟然有着截然不同的两种，甚至许多种看法。有的人认为，乌克兰当局欺压东部俄罗斯族人，又要投入“北约”怀抱，投靠美帝国主义，俄罗斯当然要揍它！反对者则认为，无论有什么理由，军队进入别国领土就是侵略！这没什么好说的。有人认为，俄罗斯让乌克兰军队进入库尔斯克地区，就是故意造成“你也占领了我的领土”的事实。与二者都不相同的，则认为战争是美国和西方各国共同拱火造成的结果，交战双方都上当受骗了。兄弟之间自己打起来，让外人捡便宜。赚钱的是军火商，死伤的是两国军队和老百姓。从总体上看，人民支持我国政府的不介入政策。

从古代到近现代，人们对战争的态度有什么变化吗？最大的变化，就是人们很难一眼就看出战争的正义和非正义了，这是现代资本主义文化和思想意识发展，即资本及其意识无孔不入长期渗透的结果。人的大脑一旦被资本运动规律所控制，什么正义、非正义就不会去考虑，甚至会得出颠倒是非的结论。

前面说过：人类社会不可能那么纯，因为发展即伴随着倒退。资本决定论深入人的灵魂，就是社会最大的倒退。资本主义世界，甚至复辟了奴隶社会的某些特征，例如被雇工人失去人身自由等等。甚至资本家本人，也成为资本的奴隶。就全世界而论，自己承认建立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毕竟只有中、朝、越、古等少数几个国家。所以，在这个资本统治的世界里，战争灾难几乎无法避免。

世界主要国家和地区，仍然处于资本主义世界，这一现实短期内无法改变。我国的外交方针，一切重要的国际活动，不是急着要去改变世界，而是首先要适应世界。要运用自己的经验和事实，渐渐地影响世界，让更多的人类成员认识到资本控制世界所产生的罪恶。社会主义制度有其特殊的优越性，这一点要让别的国家居民都承认和理解，并不是那么简单和容易的事情。发展国际旅游业，对于增强人类的相互了解和信任，是极其重要而有效的举措。

要不要准备打仗？当然要准备！不是我们好战，而是资本帝国主义就意味着战争！我们不做准备，等到战争来临就会手足无措，大败亏输，给国家和人民的生命财产，造成巨大损失。

还有另外一种可能：帝国主义认为你中国比较强大，暂时不动你，甚至表面上跟你友好，让你放松警惕。它好“雷公打豆腐，专检软的欺”，把别的国家都收拾得差不多了，再向你进攻。前苏联的历史上，就曾经发生过此类事情，斯大林中了希特勒的缓兵之计，事前跟德国签订互不侵犯条约，结果却遭受德国法西斯的突然袭击，使苏军一开始损失惨重。我们决不能犯此类错误！

坚持系统政治观念，我们会把全球爱好和平国家的人民，都看成是自己的朋友和亲戚。中国是负责任的大国，所以我们的一切外交活动和策划，都是为着保卫世界和平，促进全球人民的普遍联系和发展；不包含任何民族私利在里边。

第二节 文化交流与政治进步

说中国人有世界情怀，有充足的根据。有一位叫张树斌的先生（绰号张道子）2025年元旦就提出一份《拯救人类倡议书》，全文近四千字。倡议书以给联合国秘书长和各国首脑之信的形式公开发出。他说：

人类幻想星球移民是由于地球越来越不适合人类居住。人类急于逃离地球主要原因有二：

一、战争危机：因为战争正在毁灭地球。战争已经成为地球人类的第一大杀手。有核国家现存核弹头，可以把地球人类消灭几十次。某一早晨起来，人类有可能不存在，这并不是危言耸听，而是实实在在摆在人类面前的现实危机。

二、生态危机：如果说战争危机是地球人类所患的急性癌症，那么，生态危机就是地球人类所患的慢性癌症。宇宙是一个巨大的多系统电磁场，这个大系统中的星球分为两种：一种是死星球；另一种是活星球。也就是说，一种是能够发电的星球，另一种是不能发电的星球。在太阳系中，多数星球是死星球，目前只有地球还有一颗活星球，也就是可以发电的星球。而星球能不能发电，主要取决于星球自身储存的能量。如果星球自身储存的能量可以与自身的磁场相匹配，它就可以正常发电，从而养活整个星球的水、植被、氧气层和动物。否则，整个星球的水、植被、氧气层和动物就会灭绝。星球电场的能量是由煤、石油、天然气等组成的。如果这些能源都没有了，星球电磁场就不能正常运转。这才是宗教所说的世界末日。那时候，水被太阳蒸发干，植被全部灭绝，动物全部死光，人类也就灭绝，像当年的恐龙灭绝一样。

他说：**人类星球移民是不可能的。**

面对日益恶化的生态环境，人类首先想到的是逃离地球，去寻找一个没有战争，没有生态危机，可以

安身立命的地方去躲避灾难。于是，星球移民就成了人类最期望的选择。一些大国盲目地宣布一些什么月球移民计划，火星移民计划，一些企业家从吸收资金的角度出发而宣布的星球移民计划等，使得星球移民话题甚嚣尘上。太阳系一共有八大行星，而八大行星除地球外，没有一颗是活的，都是死星球。月球是地球的卫星，但它根本没有自转，始终一面朝着我们。月球是一颗死星球，它没有水、氧气、植被，更没有动物，不具备生存的条件，那我们移民月球的可行性在那里呢？

其实，判断一个星球是死星球还是活星球有一个重要标准，那就是看它的自转周期。凡是与公转同步，或者是低于公转周期的，都是死星球，或者是将要死的星球。反之，凡是自转周期大于公转周期的星球都是新型成长的星球。（抄者注：张先生所说的“周期大小”，应是指单位时间内星球自转或公转的次数）从目前得到的数据来看，太阳系中的大部分星球是死星球，包括火星。就是说，火星原来储存的能源足以与磁场相匹配，能够推动火星电磁场的正常运转。那时候，火星也有水、氧气、植被、动物，也有火星，而且，火星文明发展到很高的程度。科学考察证明，我们地球人就是火星人的移民后裔。当时，火星人与我们现在的地球人一样，贪得无厌，乱挖乱采，最终将火星的资源一直采到带不动火星磁场的程度。水被太阳蒸发干了，植被完全枯死，氧气没有了，动物全部死亡，火星不得不逃到地球上。那时候，有现成的地球可逃。现在，放眼太阳系已经没有现成的星球可逃。既然如此，人类已经从不能居住的火星逃了出来，现在人类再返回火星，这不是自己去找死吗？

太阳系中，也有自转比公转快的星球，从现在掌握的数据来看，木星、土星、天王星、海王星与水星的自转都比公转快。但是，水星离太阳太近，温度太高，当然不会有水，也不会有氧气，自然也不会有植被，更不可能有动物，这样的环境，不适合人类居住。

至于木星，土星，天王星，海王星，它们都是形成中的星球，几十亿年后，有可能形成如地球一样完备的星球，但现在还不行。因为，现在它们还只是气体星球，正处于吸收宇宙尘埃的过程，确切地说，它们还不是实体星球，这样的星球自然谈不上移民了。

由此，我们发现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我们地球人类不仅仅是地球人类，也是太阳系唯一人类。因为，整个太阳系，再没有别的高级动物。有人说，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人类不会去太阳系以外的星球移民吗？但是，对于远宇宙飞行的技术要求无法得到满足，因为其距离是用光年计算的。

他接着说：**与其幻想星球移民，不如奋起保护地球家园。**

为节省篇幅，不再引用原文。下面介绍一下张先生的建议：

- 1, 全面、彻底、毫无保留地销毁核武器。
- 2, 裁撤所有国家的军队，各个国家只设警察，不设军队。
- 3, 建立世界政府，也可以将联合国改造为世界政府。
- 4, 出台世界大宪章，组建联合国军队。规定联合国领导人的任职办法，任职期限。
- 5, 世界政府主席，出任要有一套严格的程序，实行任期制。
- 6, 只有建立世界政府，才能真正挽救地球人类不被灭绝。

7, 对一切开采，运输，使用不可再生资源的企业要课以重税，用一切经济和政策手段来限制其发展，直至全部关闭和销毁。

8, 鼓励可再生资源的开发利用，包括水能、风能、光能。鼓励一切电动设施的开发、生产、使用。

现在，全世界的人都在互相指责，几乎都认为，自己是这个世界的受害者。是别人把地球人类推到了毁灭的边缘。可见，拯救地球人类不仅要从制度上变革，也要从提升人们的灵魂入手，更需要联合国的推动和各国领导人从转变自身的人文素养做起。否则，拯救地球人类就是一句空话！

张先生的意见引述到此为止。他所说的“如果说战争危机是地球人类所患的急性癌症，那么，生态危机就是地球人类所患的慢性癌症。”我相信大家都有同感。2025年1月16日，美国马斯兰出版社网站（<http://www.sciencepub.net>）报导了一件宇宙之谜的奇事。说奇怪的X射线脉冲暗示着一颗寿命惊人的长白矮星，岌岌可危地靠近超大质量黑洞，形成复杂的宇宙之谜，这个谜团潜伏在距离地球约2.7亿光年的遥远星系的黑暗中心。它的分辨率可能会彻底改变我们对黑洞如何在整个宇宙中以物质为食的理解。这个遥远的星岛位于天龙座，其核心隐藏着一个重达100多万倍太阳的超大质量黑洞。这个黑洞非常奇怪：这个天体突然爆发的辐射震惊了观测者，辐射强度如此之大，以至于它显然在2018年将黑洞的日冕——一团由旋转的十亿度等离子体包围的云——持续了三个月。如果黑洞的奇异行为背后不是普通的恒星毁灭行为，那是什么呢？人类对于宇宙知识的不足，由此可见一斑。世界各国胸怀天下的生态环保人士，大家应该交流互鉴，形成声势，影响政府决策。文化交流将有力推动政治进步，由单纯的政权政治、资本政治，走向生态政治、系统政治。相信有远见的资本家也懂得：“生态破坏了，资本最终也就完蛋了！”的道理。你连生产者和消费者都找不到了，还能赚什么钱哪！在今天，有远见的企业家，都应该是政治

家。这一点国内外并无差别，但是，他们面对的政治，本质上却大不相同！

第三节 如何消除战争危险

当今世界，不是存在战争危险的问题，而是实实在在地进行着会死很多人的战争。我们生活在强大的祖国，有解放军保卫国家，是一种难得的幸福。

现在讨论世界和平问题，我们的眼光必须投向全世界。正如第一章所说：错误政治是战争的根源。现在世界上占主导地位的政治是资本政治，它是政权政治的一种畸变态。战争的本质是军火商在推销军火，将军们把自己的士兵送上战场，是为军火资本家赚钱卖命。当这样的观点广泛宣传，深入人心的时候，战争的爆发几率会明显降低。

但是战争确实有正义与非正义之分，不分青红皂白地反对战争，会造成是非不分的结果。这怎么办呢？那么我们首先要搞清楚：什么是正义战争？什么是非正义战争？好坏不分笼统提消灭战争，可能会适得其反。

另外一个问题是：“春秋无义战！”如果大家都是非正义的。该怎么办？

两个问题有着同样的意识分歧，需要认真讨论解决。说理的规则是这样：说不是我的是事。懂了不说出来，出了问题是我的责任；说出来你不听也不信，硬要不回头，那就是你自己的责任了。

所谓正义与非正义，判断的标准在哪里呢？唯一标准就是看广大人民群众的幸福生活是被破坏了？还是被促进了、更有保障了？战争结果是前者，就是非正义战争；是后者，就是正义战争。战争双方的目的正好相反，那正义与非正义就一目了然。

现在的战争双方，往往各说各的理，都说自己是正义的一方。但旁观者清，就是采用上述标准一分析，一判断，谁是谁非，一目了然。

如果双方都是非正义的，怎么办？劝和促谈是唯一正确的态度。中国人只支持正义战争，例如朝鲜战争，以金日成成为领袖的北朝鲜，是正义的一方，是被所谓联合国军欺侮的一方，所以我们派出志愿军出国作战。南北朝鲜本是一个国家，金日成要求统一，解放全朝鲜，是人家的内政。正如我解放大军要过长江统一全中国一样。美国佬凭什么要纠集“联合国军”，干涉朝鲜内政？当然是为了资本帝国主义在全世界的扩张。韩国至今还保存有“统一部”，说明南北双方都想统一，问题仅仅在于按那种模式统一而已。

如果世界各国人民大众，都能掌握对于战争正义与否的判别标准，对政府施加影响和压力，战争的危险性就会大大减少。但是要彻底消灭战争决非易事，因为资本政治的逐利本质难以改变。

把资本政治变成以世界为单位的系统政治，就是只承认资本主义的生产标准，否定它的政治标准，这该是多么艰难的事情！难道非要发动革命战争不可

吗？让资本家自觉自愿地搞社会主义不行吗？空想社会主义的老祖宗欧文先生，不就是一个资本家吗？这是个让人十分困惑的事情！所以只能讲理想，不能说必然性。

如果欧文式的资本家不断增多，数量达到一定程度，也许这个世界能够不通过战争而发生改变！前提是：社会主义国家有强大的政治、军事、经济、科技和金融实力，使当代帝国主义轻易不敢发动战争！2024年年底，日本制铁要收购美国钢铁企业，美国总统极力阻止，说明美国已经露出了衰败的迹象。

从根源上讲，帝国主义就意味着战争。如果非要用战争手段才能消灭帝国主义，那就形成一个悖论：为消灭战争，必须利用战争。这是违背常理和正常逻辑的事情。采用纯政治手段，主张改变帝国主义好战本性，又可能成为“修正主义”。那到底应该怎么办呢？只有通过思想碰撞和文化影响的手段，让帝国主义国家内部的人民大众真正觉悟起来，反对战争。如果反战力量取得胜利，战火就可能熄灭在萌芽状态。寄希望于帝国主义国家的人民大众，站起来反对战争，是完全有可能的。外在条件则是：站在正义一方的军事力量和经济力量都充分强大，使得战争贩子们害怕自己灭亡，不敢轻易发动战争。对军火商的限制和取缔，是更进一步的设想。无论如何，让军火商根本赚不到钱，例如，国家没收高价武器，是第一步就应该做的事情。即使是帝国主义国家，其国策被军火商牵着鼻子走，也是让人头痛的事情。所以，如果能商量出这样的办法，联合国有可能获得通过。无论我们用什么方法阻止战争的爆发，都不能保证一定成功。所以，强大的国防力量，先进的战略武器，才是保证我们不受战争之害的根本。

第四节 从联合国到世界政府

联合国是二战后的产物，曾经发挥过正面作用，也干过些坏事。例如美国出兵朝鲜就是打着联合国的旗号。但无论如何，联合国处理事情还是缺少权威性，有些决议做出来，当事国就是不执行，联合国也没有办法。五个常任理事国都有一票否决权，美、英、法、中、俄五国有一个投反对票，决议就无法通过。所以，人们更多地是把联合国看成一个国际论坛。

张先生提出世界政府的设想，我表示支持。地球人类是一个大系统，其它生物也是大系统，非生物是另一大系统。地球三大系统紧密关联，互相渗透，人类才是唯一具有高等智慧的生态系统。所以人类就有责任将地球上的三大系统统一管理好，处理好它们的相互关系。这才是真正重大的全球政治课题。中国改造沙漠获得巨大成功，除了党和政府先进生态理念的领导，还因为这个大沙漠就在中国一个国家的领土范围之内。这种重大工程，一旦涉及国际问题就很难处理；所以我们迫切需要世界政府。

现在，人类大系统内部的关系都处理不好，怎样才能科学地统领全球生命和非生命系统呢？战争问题和生态问题，都说明人类没有将地球上的生命和非生命系统统帅好。之所以需要全球统一政府，因为这是实现全球系统政治的组织基础。

世界政府的宗旨和形成办法，行政规则，都不是那个国家自己的事情，而是全球最大的政治问题。所以，要成立世界政府，又非得利用联合国不可。

作为世界公民，我们都应该为此发表自己的意见。

世界政府要办些什么事？又能办些什么事？这是首先要讨论的事情。职责不明，政府就很难操作。目前来看，世界政府主要是解决国际纠纷，主持公道。未来的发展方向是全球规划，统一管理地球的生态环境保护和科学开发。第三是负责与外星生物的联系和交涉。从逻辑上讲，高级生物既然是物质发展形式的一种，地球人就不可能是世界上唯一的高等生物。因为如果这样，地球人自己就成了上帝，我们反对和批判唯心主义就白费力气了。在这一点上，我跟张先生的观点不同。网传，外星人向我们发出警报，目前看可能是谣言，长久看就很难说了。

世界政府的人员组成和职责分工，需要全球公民认真深入地进行讨论，不要轻易做结论。

建议世界政府首脑也要实行“双首长制”，由代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各一人组成。称呼则可以再商量，如世界政府主席、世界政府总理，或干脆起两个完全新的名字。

办事机构如何设置？要与它的任务相匹配。具体情况就不讨论了，最重要的还是世界政府工作的指导思想。这就是系统政治和生态政治的有机结合。离开了这样的指导思想，世界政府的成立就没有意义。系统政治是一种思考问题的思想方法，生态系统则是政府工作所面临的实际对象。生态政治就是世界政治的本质。

世界政府的工作要以全球生态平衡为原则，统一调度和指挥世界各国。如果到了这样一个程度和境界，那里还会有什么国与国之间的战争呢？这才是真正消除战争的可靠手段！

中国有56个民族，也曾经经历过许多小国之间不断混战，战争连绵不断的局面，最后不还是统一了吗？世界统一不应采用战争模式，但统一毕竟是大势所趋。

第五节 人类大系统的未来

统一的世界政府是我们的理想。到了全球统一的那一天，地球会是什么样子呢？我想，太具体的设想可能脱离实际，但粗线条的，大致的设想还是应该有的。

第一，国际国内的战争彻底终结。所谓联合国或世界政府的军队，就是暂时保留下来，对付有可能破坏全球统一的势力。时间久了，世界人民都适应了新

的生活模式，它就渐渐地演变成为维护社会治安的警察组织。

第二，能够更科学地、全面地规划全球生态保护和改造工程，逐一实现沙漠变良田计划，保证有更高的森林覆盖率和木材蓄积量。对于河流湖泊的利用、保护、改造更加科学、合理。甚至运河维护、道路畅通都有了更有效的保障。

第三，全球科学技术突飞猛进，新技术不再被封锁，不再互设壁垒，而是迅速推广应用到全球，取得成效。

第四，全球经济大循环，成为统一整体。所谓贸易壁垒再也不存在了。这样，无论是那个环节，那个地域，出现了经济上的困难问题，立刻能得到全球的帮助和迅速有效地得到解决。

第五，全球语言大畅通，逐渐形成具有方言特色的“世界语”。各国文化，历史和神话传说，相互碰撞。

通过电影、电视、视频和传统书刊形式，相互交流，增进了人与人之间的深入了解。跨国婚姻更为普遍。各国习俗交相辉映，跨国旅游形成风气。学校教育加入更多外国元素，就不像现在这样光学习外语就算了。

第六，全球政治统一实现生态政治和系统政治，把所谓政权政治和资本政治扫进历史垃圾堆。世界政府主席和高级管理者，都应该是系统理论和生态理论方面的高手。换言之，不懂系统论和现代生态理论者，无权进入世界政府，更不可能担任领导职务。

由所谓的政治挂帅变成为科学挂帅和生态文明挂帅，应该是我们终生为之奋斗的目标和理想。如果实现这一目标，共产主义将成为现实。反动派把共产主义宣传得像是青面獠牙的野兽，公布我们这种关于世界政府的愿望，宣传我们的理想，有助于揭穿反动派的阴谋和谎言。

2025年2月11日定初稿于北京